

一九九七年九月
第二期(总四期)

广东省文化厅
主办

目 录

· 文物工作 ·

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把革命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推上新的台阶…………… 广东省文化厅(3)
以保护促弘扬 搞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8)

· 综合研究 ·

见证·启迪·借鉴
——为广州城庆举办《羊城文物珍藏展》而作…………… 麦英豪(11)

· 考古发现与研究 ·

浮滨文化…………… 曾骐、邱立诚(16)
试论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 史红蔚(18)
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环境及稳定性…………… 史红蔚(22)
大埔明墓清理简报…………… 邱立诚、邓宏文(26)

· 博物馆研究 ·

博物馆教育能使博物馆走出困境吗…………… 刘金宏(29)
“库房日志”在藏品管理中的作用…………… 黄虹、张雪莲(33)
市场经济与讲解员职业道德建设…………… 张建雄(34)
关山月美术馆思考…………… 卢禹光(39)

· 文物鉴赏 ·

略论“麻姑壶”的定名问题…………… 黄伟中(40)
从出土文物谈广东唐宋时期青釉瓷的演变…………… 任卫和(41)

编辑部：
广州东山培正一横路八号

电话：八七一八五七一〇
邮编：510080

·名人述评·

- 作为政治家的赵佗
——兼谈史学评论的误区…………… 吴凌云(45)
- 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缅怀革命英烈李硕勋…………… 何锦洲(51)

·海交史研究·

- 市舶管理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
——从宋代广州泉州的海外贸易谈起…………… 王国梅(55)

·国外文博·

- 美国的古迹……………(59)

·文博信息·

- 国家文物局长张文彬视察深圳文物工作(60) 连平县博物馆新馆落成(61) 展览不断 回归情浓(61) 青春献羊城——广州青年英杰事迹展(61) 罗定市举办庆回归百蝶藏品展(62) 高州市博物馆举办展览(62) 梅州市举办文物考古培训班(63) 杨仲健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学术年会在京举行(63)

·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材料选登·

- 李鹏总理给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的贺信…………… (64)
- 高度重视 加强管理 充分利用 努力开创革命文物工作的新局面
——在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铁映(65)
- 增强使命感 弘扬主旋律 努力开创革命文物工作新局面
——在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张文彬(68)
- 在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董保华(78)

主编：

薛连山

副主编

邹佩阳

苏桂芬

本期编辑：

龙家有

封面设计：

广州市美术馆

正确处理文物保护 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把革命文物工作推上新台阶

广东省文化厅

一

广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鸦片战争开始,经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广东一直站在全国革命斗争的前列,许多杰出人物,如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湃、邓中夏、苏兆征、阮啸仙、叶剑英等都在广东从事过革命活动,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在近现代100多年的斗争中,留下许多重要的文物。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三元里平英团旧址、洪秀全故居、冯云山故居和“拜上帝会”旧址、遂溪人民抗法斗争旧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广州大元帅府旧址、中共“三大”旧址、国民党“一大”旧址、黄埔军校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海丰红宫红场旧址、广州公社旧址、十九路军抗日阵亡烈士陵园、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司令部旧址、闽粤赣边纵队司令部旧址和粤桂边纵队司令部旧址等,都是广东人民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光荣传统的历史见证,勾画出了广东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前赴后继进行斗争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广东的近现代史就是中国

近现代史的缩影。

丰厚的革命文物是广东文物的显著特点和优势。目前广东境

内的3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就有16处为近现代文物。最近,中宣部公布的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广东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鸦片战争博物馆(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名列其中;收录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的近现代重要文物就达1088处、近现代典型建筑136处。

广东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基本建设项目的增多,对文物保护和利用,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切实做好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对推动全省文物事业的发展,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些方面,

编者按: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于1997年8月3日至8月8日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李鹏总理给会议发来了贺信,国务委员李铁映发表了书面讲话,国家文物局张文彬长和董保华副局长分别作了工作报告和会议总结(详见本刊“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材料选登”栏目)。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我省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和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以保护促弘扬 搞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两篇文章,就是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的经验材料。广东是一个革命文物大省,革命文物的保护任务十分繁重,一些革命文物濒临灭绝的危险,因此,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特别是文物部门,都应当高度重视近现代革命文物的调查、征集、保护和利用工作,共同把全省革命文物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文物工作●

近年来我们作出了努力,取得一些成绩。

二

近年来,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是广东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矛盾之一。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文物受到破坏或影响的事件屡有发生。在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下,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促进了对文物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虎门炮台是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卫设施,设置 12 座炮台 300 多门大炮,雄踞于珠江出海口东西两岸今属东莞、番禺两市管辖的二、三十平方公里的地面和海岛,有“南海长城”之称,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见证,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虎门大桥公司在大桥施工初期,文物保护观念淡薄,为赶工程进度,于 1993 年 1 月 9 日用推土机推毁了靖远炮台的几间清兵营房遗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虎门大桥是我国有史以来最雄伟的高速公路悬索桥,是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炮台旧址要保护,虎门大桥要建设,两者都有其各自的重要作用。如何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大桥建设的关系,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党中央、国务院、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和省政协的领导同志都先后到炮台旧址现场视察,召开多次会议,下大决心全面修复虎门炮台旧址。国务院作出了“既要建设好大桥,又要保护好文物”和“要把虎门大桥建设同保护虎门炮台旧址、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统一起来”的指示(国阅[1994]70号)。遵照国务院的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府下大决心,决定由虎门大桥公司出资 4000 万元,省财政拨款 3000 万元,东莞、番禺市财政各拨款 1500 万元,合计 1 亿元用于虎门炮台旧址修复和鸦片战争海战博物馆的建设。由于海战博物馆建设标准高,耗资大,东莞、番禺两市都加大投入,使虎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示范点的建设总投资增加到近 2 亿元。这是修筑虎门炮台以来最

大规模的一次维修工程,其耗资之巨大,工程面之广阔,工程量之庞大,均为历史之最。首期文物维修工程计维修炮台范围内的古道近 4 公里,维修文物建筑 9.5 万平方米,修复暗道、暗室 6000 多平方米,清除淤泥 3 万多立方米,修复炮台山体填土近 7 万立方米,绿化面积 3.4 万平方米。这些维修工程的完成,完整地展示了当年虎门炮台群中被称为“金锁铜关”的第二道军事防卫设施的严密布局和立体火力网的阵势,再现了这座“南海长城”的雄姿。

广州地铁工程是广州市政建设的一项特大工程。地铁一号线全长 18.5 公里,沿线涉及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陈氏书院,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万木草堂、清末旧当铺等地面文物建筑以及一些地下文物埋藏地带,文物保护抢救任务相当繁重和艰巨。文物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地铁建设所涉及的文物。例如,有关单位为了施工的需要,决定拆卸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石牌坊,打开围墙开辟人行通道,砍掉农讲所门前的木棉树。文物保护专家获悉后,连夜上书市政府领导,要求完整保护农讲所旧址。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开枝、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姚蓉宾亲赴现场召开办公会议,协调各方面意见,提出一定要完整地保护农讲所旧址,不能损毁一草一木,要求地铁施工部门修改了设计方案,将这一段地铁轨道和车站尽量往南移,使本来笔直的铁路在这里向南作了偏斜,并在农讲所门前车道上铺上厚钢板,减少车辆行驶中产生的震动对农讲所石牌坊、西门楼的损害,很好地保护了这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我们正确处理了虎门大桥和广州地铁两项大型基本建设工程所涉及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文物的保护问题,并及时抓住这两个典型事例,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经济建设中的文物保护问

题成了一段时期公众议论的热门话题,人人都来关心文物保护,建设单位在基本建设中也注意了文物的保护问题,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全省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我们在正确处理好大型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的同时,把解决好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有效地做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作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省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为此,广东省文化厅在制定“九五”工作规划时,明确提出:“要以抓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保护、管理为龙头,将我省文物保护从单位点状保护转变为区域网状保护,使文物古迹的保护监控有机地与城市的建设发展结合起来。”佛山、潮州、肇庆等市,通过发动群众参与、政府组织建设、职能部门制定规划和落实保护措施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保护了一大批文物古迹、革命旧址、传统街区和古民居。

在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工作中,我们有这样几点体会:

(一)提高认识是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的前提。

过去,文物往往被理解为古代文物,革命文物的保护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近年来,特别是李铁映同志1995年9月8日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要求“加强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以来,革命文物的调查、征集、保护和利用工作,引起了我省各级政府和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李兰芳副省长多次强调了近现代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指出“近现代革命文物的丰厚是广东文物的特点,如何根据这些特点拓宽我们文物保护工作的思路,或者说,将这些特点变成优势,我想这应该是一篇大”文章。“各级文博单位应当深刻认识和充分利用广东文物的自身特点和优势,加强对近现代革命文物的调查、征集、保护和利用,建设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革命史迹陈

列、旅游网络,发挥我省近现代文物史迹的群体优势,把各类革命旧址、革命纪念馆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使我省成为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利用文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省份。”李副省长的讲话,为我省各地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做好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依法管理文物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保证。

首先,大张旗鼓地宣传《文物保护法》,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文物保护法》公布以来,广东进行过两次全省规模的宣传《文物保护法》的活动,采用印发海报,在报刊上连载系列文章,在电台、电视台上播发普及文物法的讲话等多种形式,使全省人民群众认识到了文物是祖国的珍贵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民族文化瑰宝,树立了“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文物保护意识,文物保护逐步成为全民、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其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坚决依法办事。我们非常重视对文物执法人员的培训,“二五”普法以来,全省各市都举办了普法学习班,组织广大文博干部学习《文物保护法》及相关的法规,聘请文物保护和法律专家授课,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做到执法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程序化。在文物遭到经济建设破坏时,我们的文物干部敢于拿起法律武器,坚决依法办事,坚决顶住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理直气壮地与破坏文物的行为作斗争。广州市某单位运用了超越常规的办事程序和手段,拟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入口左侧园内建一座高12米、三层的建筑物。为了制止这项违反文物法的建筑施工,文物干部敢于顶住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坚决依法办事,终于制止了这起破坏文物的行为发生。

(三)完善文物保护内部管理工作规程,做好文保单位的“四有”工作。

文物保护单位如果没有标志说明,建设单位就不知道它是不是文物,在进行经济建设

●文物工作●

时,便会造成无意识的破坏。文物部门在追究建设单位破坏文物的责任时,便会输理,有些建设单位还会说文物部门失职。广州市内控文物保护单位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没有树立标志说明,建设单位和使用单位都不知道它是不是文物,把它误拆了,便是一个深刻教训。

文物保护单位周围如果不划出一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就不能有效地制止和控制在其附近的工程建设,必然会破坏文物周围的环境风貌,甚至直接威胁文物本身的安全。广州市自1987年以来,由省、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规划局划定了市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按法定程序公布后,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两线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实施了有效的管理,使广东省基本建设的热点、全省用地矛盾最为尖锐的广州市范围内的文物古迹及其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虎门炮台旧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是省政府于1987年划定的,在1992年开始的虎门大桥和虎门炮台旧址保护发生矛盾时,所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对保护炮台旧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为省政府和国务院对解决文物保护与大桥建设的问题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我省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1990年以来,举办了二期古建筑测量培训班,召开了4次文物“四有”工作会议。1994年,我省文物“四有”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全省所有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已全部划定并经省政府公布,对做好经济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四)建立和健全文物保护网络,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做到“耳聪目明”。

近几年来,广东着力建立和健全文物保护网络的工作,反复推广博罗县建立县、镇、村(文物点)三级群众性的文物保护网络的经验,以及一些地方建立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或保护人员的经验,做到“快速反映”重要文物遭受破坏的情况,及时发现,及时查处。广州、佛山、肇

庆、潮州、湛江等市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使每一处文物保护单位都有保护小组或保护责任人看管和保护,形成了以广大人民群众,文物保护小组和保护责任人为特色的文物保护网络,有效地保护了文物。

此外,我们积极争取各级人大、政协就文物保护工作提出议案,主动要求计委、建委、规划、国土、交通等部门支持文物保护工作,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广泛进行宣传,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发动专家提出保护文物的呼吁等,这些都是我们制止建设单位破坏文物的有效方法和手段。

三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有着相互对立的一面,但两者又是相互促进的。我省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文物的保护维修和利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如果没有虎门大桥的建设,虎门炮台旧址的维修和虎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可能有近2亿元的投入。由于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文物保护利用提供了资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革命文物工作的发展,使我省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我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一批与孙中山革命活动有关的革命旧址、纪念性建筑进行了维修和保养。广州市政府通过与海军部队协调,收回了黄埔军校旧址3万平方米的用地,修复了俱乐部、孙中山故居、孙中山纪念像和东征烈士墓,并拨款2000余万元,修复了建筑面积达10600平方米的校本部,重现了黄埔军校往日的风采。经过省、市政协多次提出提案,省政府决定通过政府拨款、企业自筹、减免各种税费等途径筹资3410万元,将省农机公司分期迁离广州大元帅府旧址,把它交还给广州市文物部门修复并对外开放。省政府投入资金80万元,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民党“一大”旧址进行了全面维修,复原了国民党“一大”会场,布置了《中国国民党“一大”与国

共合作》展览。广州市政府拨款400万元,对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礼堂——广东咨议局旧址进行了大规模维修。此外,还对广州“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广州市中山纪念堂、中山市孙中山故居、中山纪念公园、中山纪念堂和惠州市中山纪念堂等与孙中山革命活动有关的史迹和纪念建筑进行了环境整治。

在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100周年前夕,广州市拨出900万元搬迁了使用邓氏宗祠的市结核病防治所,另址建医院,并拨出210万元维修邓氏宗祠、设立了邓世昌纪念馆。

为纪念彭湃同志诞辰100周年,我省拨出50万元专款,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丰红宫红场旧址进行了维修。海丰红宫红场纪念馆还通过多种渠道,集资近100万元,修复了一些文物建筑和改善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环境。

粤北红军标语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95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批拨专款80万元,国家文物局拨款20万元,由广东省文化厅与韶关市文化局共同对粤北红军标语保存的现状进行了复查,并在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前夕,成功地试揭了首批14条(幅)标语、漫画和歌谣,安全运抵南雄市博物馆展出。

此外,深圳市和龙岗区政府共同出资240万元,对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进行维修,还将斥资维修东江纵队北撤纪念亭和纪念碑。汕头市政协迁出了长期占用的国民革命东征军总指挥部旧址,交由汕头市文化局开辟为东征军革命史迹陈列馆对外开放。

总之,自1995年以来,我省通过政府拨款、群众集资、华侨捐资等多种渠道,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对林则徐硝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黄埔军校旧址、国民党“一大”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农讲所旧址东路建筑、邓氏宗祠、十九路军陵园、广东咨议

局旧址、小画舫斋船厅、深圳市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中山市陆皓东墓和陆皓东故居、云浮市邓发故居、海丰红宫红场旧址、韶关的双峰寨、湛江人民抗法斗争旧址等一大批革命文物进行了保养和维修,搬迁了占用广州大元帅府旧址和汕头市国民革命东征军总指挥部旧址的单位。目前,我省正在制定维修计划的近现代文物还有广州中山纪念堂、外国人墓地、新一军纪念碑、粤一师纪念碑、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等。此外,广州市政府拟拨巨资兴建广州市近代史博物馆,加紧进行革命文物调查、征集和保护工作;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准备自筹资金,重建纪念馆陈列大楼,完善保护和充实展览;徐闻县准备筹建渡海作战纪念馆,纪念为解放海南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以来,我省用于近现代文物的保养、维修、搬迁、调查、征集、展览等保护和利用工作的经费约4亿元。

有效保护文物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合理利用文物。广东在发挥近现代文物群体优势,把各类革命旧址和纪念地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东莞的鸦片战争博物馆、虎门炮台旧址、广州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黄埔军校旧址、国民党“一大”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十九路军烈士陵园、中山纪念堂、孙中山大元帅府旧址、洪秀全故居纪念馆、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均已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实践证明,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处理得好,可以互相促进。我们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极探索,在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做好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积累了一点经验,但也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困难。我们今后将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困难,把广东全省革命文物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以保护促弘扬

搞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作为一个伟人故居纪念馆,我们以保护文物及其环境为工作基点,以弘扬孙中山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为己任,在高质量地完成各项业务工作的同时,始终把建设一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作一项基本任务,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绩。1996年10月,国家教委、文化部等中央六部委公布我馆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最近,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我馆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一、保护文物是我馆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中山市翠亨村。在九十年代新的社会环境下,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许多重要的文物古迹沦为孤岛。翠亨因地近港澳,广珠公路东线经馆门而过,中山故居周围环境变化很大。当有关部门查处一些违章建筑时,违章者还振振有辞,说自己是在“建设”翠亨,满腹“冤枉”。

过去,我们把主要的工作放在孙中山故居以及有关孙中山文物藏品的保护方面。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迅猛发展促使我们去考虑和正视文物环境的保护问题,保护好孙中山有关文物和孙中山故居等文物景点及其环境,是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由此而引发了我们在文物保护、环境保护以及本馆发展定位等方面的深层次的思考。我们意识到,保护好文物环境也是寻求发展的重要手段。从而确定了这样的思路——保护和开发利用文物环境及其有关的文物景点,由此寻求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以适应社

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在保护孙中山故居及保证馆藏文物的绝对安全的同时,开始了新的实践。

我们首先尝试做的是“翠亨民居展览”。利用我们收购的在孙中山故居周围的部分旧民房,举办“翠亨民居展览”。该展览紧紧围绕清末翠亨村这一主题,以保护孙中山故居的环境风貌,再现孙中山诞生与成长的社会背景为目的,丰富了陈列馆有限空间所不能表达的内容,扩大了陈列阵地,在陈列思路上突破了一般名人故居纪念馆传统的旧居复原加史迹陈列的二元模式,突破了展品——展柜——展墙的框子,形成了以孙中山故居复原陈列、孙中山生平史迹陈列、翠亨民居展览等立体化的陈列体系,是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巧妙结合。它在中山故居与村民住宅之间建起了防护带,保证了中山故居的安全;恢复了中山故居周边的历史风貌;抢救了一大批民俗文物。由此增加的门票收入还可用于文物保护,形成“保护——利用——创收——再保护——再利用——再创收”的良性循环。

翠亨民居展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好评,它的成功使我们意识到:纪念馆的运营不仅仅意味着维护文物环境、最大限度地利用文物环境去寻求自身发展、实现纪念馆的社会职能,而且要求注重两个效益的结合,在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互为补充,互为支持。这对于我们过去只注重商业经营来说是一种进步。尝到了甜头之后,我们进一步把经营所得投入到文物环境的保护之中。

翠亨村只有 200 人、70 户人家,村中却有 不少近、现代革命活动遗迹,留存着一些与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有关的遗址、遗迹,许多建筑仍保留着清代的建筑风格与形制,我们拟把它们与孙中山故居联为一体,进而保护整个翠亨村。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在保护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中山故居的同时,我们积极做好两处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殷(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长、著名工运领袖)故居和陆皓东(孙中山誉其为民主革命牺牲之第一人)故居的保护工作。帮助翠亨村搞好村中的公益事业,做好文物的保护和维修工作,取得了产权人的信任,使村中的文物点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并由此征集了一批革命文物和民俗文物。我们还通过赎买、租赁、借用、代管、接受捐赠等各种灵活的办法,控制和保护了一些翠亨村的民居,使我馆目前管理的范围从原来单纯管理孙中山故居发展到基本实现了对翠亨村有关文物景点及其环境风貌的有效管理。

管理的文物景点及其环境风貌保护任务的增加,我们没看成是负担,反而看成是我馆的一笔巨大的财富(除了有形价值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其中的无形价值)。它增强了我馆今后发展的后劲。我们把以文补文盈利所得,逐渐投入到这方面的建设之中。我们把这种投入视为一种长线投资,这比我们投资其他的商业项目和娱乐项目要好得多,而且还不存在投资风险。这样的投入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同时也实实在在“务正业”、高唱了主旋律、发展了自身事业。

对待文物及其环境,我们在顽固“守旧”。我们认为,这种守旧比任何新形式的游乐设施、人工景观更有意义。但是,这种“守旧”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积极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翠亨村镇政府和翠亨村村民的帮助和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我馆在前几年抓紧业务能力、基础设施、

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建设,为今日扩大保护和管理业务范围、寻求新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业务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弘扬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精神 发挥教育基地的作用

自 1996 年我馆被国家教委、文化部等六部委公布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后,我们认为,应该建设和管理好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发挥教育基地作用,不辜负中央各领导部门对我馆的期望。我馆近年年观众量保持在 60 至 80 万人次之间,95 年和 96 年学生所占比例约在 12% 以上。1997 年上半年,已接待中、小学生 4 万多人次。广东省和北京一些大学都把孙中山故居作为历史教学和社会调查的场所。每年,中山市委、市政府都以正式文件下发当年的省内大专院校学生到本市和本馆社会调查和参观安排的计划清单。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把我馆作为其教学的课外活动基地。中山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邻近的市、县许多中小学都把我馆做为课外活动的首选场所。开展对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是我们重要的社会教育职能,弘扬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本馆工作的宗旨,我们要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由于有了前段的控制和保护文物环境及其有关文物景点的工作,为本馆弘扬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开展教育基地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良好的阵地。

我馆还把弘扬孙中山爱国主义精神、对青少年学生的社会教育工作做到馆外,派员到附近的中、小学向学生讲解孙中山的生平,宣传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精神;与翠亨小学签订合同,每年由我馆派人到学校举办两次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讲座;我们还积极配合了位于翠亨村的广东省重点中学——中山纪念中学的德育教育工作。

为弘扬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还积极参与其它社会宣传工作:与《香山报》社联合举办征文活动;与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共青团市委、市教委等单位联合举办征文比赛、中学生演讲比赛活动;与中山纪念中学的老师编写《孙

●文物工作●

中山》教材。先后印制了《孙中山故居》简介、《孙中山与翠亨》图片集等一批宣传品；孙中山研究小组出版《酸豆》，作为研究与宣传的阵地。我馆还与全国许多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本馆人员的文章不断发表在海内外各种报刊上。我馆与其他单位合作编辑出版的图片集《纪念孙中山先生》及资料汇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还同时获得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成果的资料汇编二等奖。最近，在有关专家的支持下，我馆策划编辑了《璀璨的双子星座——孙中山与宋庆龄》大型图片集；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联合编辑出版了《孙中山与近代社会》论文集。我馆还经常协助新闻单位和影视部门摄制有关孙中山和孙中山故居的电影、录像片等，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活动。电视剧《少年孙中山》录像片制成后，我们主动发信给附近各中、小学组织学生观看，前后组织数十个场次，深受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喜爱。

我们还举办、引进各种临时性展览，增加社会教育内容。最近，我馆又利用翠亨村杨鹤龄亲属的房屋举办与孙中山志同道合的好友——杨鹤龄的纪念展览，扩大了翠亨民居展览的范围，进一步丰富了陈列内容，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三、继续努力做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工作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是指导我们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贯彻文件精神，以保护促弘扬，建设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我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山市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九五”计划中把重建孙中山故居陈列馆作为市重点工程。也可以认为，孙中山故居陈列馆和文物库房的建设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是一项重要的硬件建设工程，除解决了本馆的业务用房困难外，在陈列水平、管理水平方面也必将会取得

新的进步。

孙中山及其父辈耕种过的名为“龙田”的土地，与我馆一墙之隔，其环境风貌的保护直接影响孙中山故居和翠亨村的文物环境。经过多方工作，我馆征收了这块土地，在各方面的支持下，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拆除了该地块旁边的违章建筑，并明确开发的指导思想：配合翠亨民居展览，结合当地的历史和民俗，把它开辟为具有当地农业和农村色彩的、也是孙中山故居辅助陈列性质的田园，成为青少年教育的良好场所，不断扩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规模和影响，真正发挥其基地的作用。

近年来，我馆注意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环境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果。今后我们将争取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陈列水平等方面有进一步的提高。本馆将在原有的电脑网络和较高的办公自动化水平的基础上，下一步准备把电脑网络面向观众，使观众能够查询导游系统、陈列系统和有关学术资料，尽快在电脑公众互连网络建立本馆的网页和电子信箱。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准备再建设 1300 千瓦的变电站及备用电源，以解决本馆进一步前进和发展的“动力”，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完善基础设施。

我们还试图进行讲解队伍结构上的改革。进行了由研究室负责接待讲解工作的尝试，使接待讲解人员与研究工作挂钩。这样做有利于提高讲解员的素质，从而提高讲解水平，更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的发挥。为了适应本馆当前业务的发展，我们还准备适当地调整本馆的一些行政架构。

上述做法，是我馆在工作实践中的一些探讨。我们将继续本着以保护促弘扬，从充分发挥基层纪念馆的社会教育职能这一出发点去工作，建设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抓住特色作文章，在保护文物、建设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一特色题目上，把文章继续作下去，并且要做得更好。

见证·启迪·借鉴

为广州城庆举办《羊城文物珍藏展》而作

麦英豪

1996年夏，广州市属文物单位联合在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举办《羊城文物珍藏》展览，作为向广州建城2210年的庆贺；这次展览汇集了各单位几十年积聚的藏品中的精华，奉献给广州市600多万人民和广大的文物爱好者，共同鉴赏。

广州城的始建年代，既有信史可证，又有近年考古新发现可据。史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推行郡县制。随后又发兵北却匈奴，南平百越，于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今两广的岭南大地，于此设置桂林、象、南海3郡，南海郡的郡治在番禺（今广州市），这是见诸《史记》和《汉书》的纪述。有郡治当有城邑，所以前214年实为广州城建的始年。秦的国祚甚短，只有15年，秦始皇死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原秦将南海尉赵佗乘中原战乱之机，据有岭南三郡，建立南越国，以番禺为都城。《史记》、《汉书》称之为番禺城，这也是广州城最早的名字了。

近年，广州考古工作对番禺城的问题又

有突破性的新发现。1983年在象岗发现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的陵墓，墓主身上随葬9枚印玺，其中1枚为龙钮“文帝行玺”金印，这枚金印对广州城建历史来说有其特别重要含义。因为自秦始皇的玉玺为刘邦所得，成为传国玺，以后历代帝王的印玺成了封建王朝中最高权力的象征。在西汉初年，南越王国定都广州，长达93年，这枚“文帝行玺”金印正是这段历史的物证。1995年下半年在今广州市区中心的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城隍庙西边，发掘出南越国宫署的部分遗迹，在遗址的一块大石板上凿刻有一个斗大的秦隶“蕃”字（番禺的简称），真是“一字千金”。这个“蕃”字既是岭南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石刻文字；更为重要的是，宫署是南越王国最高层统治者的居处地，为当日番禺城的核心区。《史记》、《汉书》的南越传均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越，火烧番禺城。考古发现南越国宫署走道有毁于大火的遗迹，正与文献记载相符，番禺城的坐落位置得到确认了。一枚“文帝行玺”金印，一块“蕃”字石刻，成为广州建城2210年最具权威性的历史物证，可说是广州

这座二千年历史文化名城的两件重宝。

二

现代田野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在广州的出现都比较早。1931年，一个民间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在广州成立，它编辑出版的《考古学杂志》(创刊号)也同时面世，这期间还发掘过几座汉晋古墓，开创了广州地区有现代田野考古的历史。到本世纪50年代，在配合市区和郊区的各项经济建设工程的施工，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广州与西安、洛阳、南京、长沙等地成了当时全国的“考古发掘的重要据点”(《新中国考古的收获·序言》，文物出版社1961年)。回溯四十年来，广州地区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除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停顿外)，持续不断，先后发现多处古文化遗址和自秦汉至明代的大批古墓葬，其中两汉墓逾千座，汉墓的出土文物亦最为丰富。还发现了唐代建筑遗址、南汉城的排水涵洞遗迹、宋代城基遗址，还有北宋年间专烧外销瓷品的西村窑等。至于被誉为广州秦汉考古三宝的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和象岗南越王墓，同属70年代以后的考古新发现。

广州博物馆的前身——广州博物院成立于1929年。本世纪50年代初，广州市人民政府着手建立文物保护的专门机构，随后又分别筹建包括广东革命历史方面的、广州城市历史的、工艺美术方面的专业博物馆和一批纪念馆和文物保管所(设在文物保护单位内)。为了收集、保护流散于社会上的文物，为博物馆提供有人藏价值的文物，于1960年成立广州市文物店。自此，这些文物单位负起广州市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文物建筑的维修保养、各种历史文化艺术珍品的收集、保存、研究、宣传展览的重任。

文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它具有教育，可供借鉴、为科学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

重要作用。博物馆由于拥有多(入藏品愈多愈好)、精(珍品以及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全(包含各门类的、自成系列的)的收藏，让参观者从中获得各种历史信息，所以被视为学校的第二课堂，成人的终身学校。事实上，一个博物馆拥有藏品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直接关系到这个博物馆的社会声誉和实际的业务开展的。比如，中国的故宫博物院、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罗浮宫博物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等都因其收藏的多、精、全而享誉世界。广州的博物馆在国内来说，其藏品的数量与质量虽然都无可与几个大城市的博物馆相比拟，但作为地方性质的博物馆，它收藏有丰富的地方文物、文献，因而显出它的特色。广州的几个博物馆其藏品来源不尽相同：例如广州博物馆是以本地区的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为其主要收藏，同时又注重城市历史发展和民俗文化实物的征集。广州美术馆的藏品则以广东地区书画家的名作为重点而又面向全国，建馆初期有赖前广州市长朱光的关怀支持，从各方面为其搜罗、征购书画而奠定了藏品基础，其后又得杨铨先生、李凡夫先生等的大批捐赠，还有著名学者容庚教授所藏的近千幅字画，通过价赠的方式，全部交由美术馆选藏。经过近三十年的致力搜罗，该馆藏画盈仓，已跻身入全国美术博物馆藏画的前列。又如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它以广东古代至近现代的各种优秀民间工艺珍品为其入藏重点，但面向全国各地。该馆拥有逾千件明清以来的石湾艺术陶瓷，成为国内外博物馆中收藏该窑制品最丰厚的单位，深受陶瓷爱好者的赞许，又因得到香港杨铨先生把毕生所藏陶瓷、铜器、竹木雕刻品等5000多件无偿捐赠，使该馆的藏品倍增，跃居广州各博物馆拥有藏品数的首席。至于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逾千件(组)的文物，成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的重要典藏。这座遗址博物馆建成未到十年已是遐迩闻名，主要是该墓出土文物中有不少是全国首

见的精品和珍稀品；加上又有香港杨永德伉俪把多年来搜集得来的二百余件唐宋至元代的陶瓷枕慷慨捐赠，遂令该馆的入藏别开生面，倍添异彩。广州文物店建店以来，向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广州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文物研究单位提供数以千计的文物珍品。展品 150 号元代青花船形水注和 155 号清雍正青花赏瓶两件珍稀品，就是该店从民间收购得来，前者已交给广州博物馆入藏。而今该店已跃上全国仅次于北京、上海而具有一定影响的文物专营店。

三

博物馆藏品必然是文物或自然的标本，但不是所有的文物或自然标本都可成为博物馆的入藏。文物藏品必须具有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这是入藏的基本条件。判定年代，辩明真伪，则是确认文物藏品价值的前提。一般来说，对传世的文物，首要的是鉴定年代和判明真伪，这是决定它所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前提。本展览特意选出两件战国式铜镜的贗品，其仿制之精，几可乱真；同时又指出它的破绽所在，以供鉴研。至于考古发掘品，需要断代而不存在真伪问题。广州各博物馆的藏品，从 60 年代开始，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和我省市的文物鉴研专家先后多次进行鉴定，确认其年代与级别，是次展出的藏品侧重在古代史和工艺美术方面的，尚未包含革命历史方面的收藏。展品系由广州博物馆等 6 个单位选送，共 262 件(组)，概纳为铜铁器、玉石印玺、陶瓷器、其他工艺以及书画，书画因要避免长时间的照射受损，分批轮换展出。名之曰珍藏，会否有点儿“敝帚自珍”哩？愚以为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了。因为事物是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既曰珍藏，自有其可珍处。例如，展出的商周青铜器中，展品 1 号的刺鼎，器内壁有铭文 51 字，已确认为西周穆王(约前 1001 年)

时，可视作西周铜器断代的标准器。展品 8 号与 9 号同为秦戈，其状虽然一般，但历史价值重要。前者出自广州东郊区庄一座秦墓中，戈的内部刻有(秦始皇)“十四年属邦”等铭文；后者出自象岗西汉南越王墓，戈内处刻有(秦惠王后元)“王四年相邦张义”等铭文。张义即张仪，与苏秦同为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这是岭南地区考古发现唯一有秦代纪年的两件青铜兵器。联系到 1976 年江西遂川出土的一把戈，内上刻有(秦始皇)“廿二年临汾守日潭”的铭文，可以认为这是《淮南子·人间训》所载的，秦始皇派遣统一岭南的五路大军中，“一军守南野之界”(遂川在秦时属南野境)和“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遗物，弥足珍贵。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首推象岗南越王墓，该墓随葬铜器 400 余件(套)，数量大，品类多，有不少属珍稀品。其中 3 套青铜编钟，3 件铜烤炉(展品 12 号)，多件越式铜提筒和铜熏炉(展品 13 号)，最具地方特色。其中 8 件一套的铜勾铎(展品 18 号)，所刻铭文说明系由南越国乐府的工师监制，可见当日广州地区的铸铜手工业已较具规模。9 件刻有“蕃禺”或“蕃”字铭文的汉式与越式铜鼎(展品 11 号)，是最能说明“蕃”即为“蕃禺”简称的物证。铜镜既是实用器，又是工艺美术制品。南越王墓出土的 39 面铜镜，有带托镜(展品 30 号)、漆画镜、秦式镜、楚式镜等珍品，其中一面六山纹镜(展品 26 号)是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得见的出土品，极为珍稀。至于五山纹镜，在岭南至今未有出土，湖南长沙偶见战国墓中。展品 27 号的一面五山纹镜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所藏，亦属难得。至于三国吴的纪年镜、晋的纪年镜、唐代金银平脱镜和唐贞观七年(633 年)铁镜等都填补了广州藏镜的空缺。根据文献记载，过去一直认为东晋咸康年间邓岳任广州刺史，大开鼓铸，广州始有冶铁业。南越王墓出土一件重 26.5 公斤越式大铁鼎(展品 38 号)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一件

●综合研究●

铁门枢轴，虽然已是锈层斑斑，状貌不扬，但却是作为南越国都城的广州早在二千年前，已有冶铁手工业存在的“铁证”，因而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还要特别提到的是，1994年黄埔区姬堂晋墓群的重要发现。已发掘3座砖室墓，保存完好，第2号墓有“永嘉元年”的纪年砖文，所出的陶瓷器物类同，可能是同一家族墓地。出土一批青釉器，多施有褐色点彩，还有多子木鬲、耳杯盘、虎子等(126、127、131号)，与江淮及中原地区晋墓所见相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还有滑石谒牌(相当今之名片)和类似墓志作用的铭牌(72号)与“关内侯印”石印(明器)、银质龟钮“牙门将印章”官印(71号)至为难得。它既可说明墓主梁盖的身份，对于研究当日番禺(今广州)与增城县的史地关系和梁氏族望都很有价值。还有陶马厩、牛栏、猪羊圈、鸡屋以及贮粮的囷和井、灶(116~122号)等模型明器，是广州晋墓中所罕见的。墓主随身陪葬的2把环首铁刀一长一短，短的一把身长60厘米，前段的11厘米做为两刃有中脊的剑身，把劈杀与刺杀的功能合而为一，成为独特的刀剑合璧，在中国古代的铁兵器中尚属首见。更为精彩的是，第2、3号两座墓出土了3块陶制水田模型，水田上塑有农夫在犁田的，在耙田的，在修治农具的，在开挖排水沟的，还有已蒔秧完毕扛起农具正欲离开各种人物与耕畜的形象。家鸡带到田头放养，田埂上放有一个覆盖严实的大竹萝，表示连午饭亦已带备田间。每块水田的田埂边处都安装1个捕鱼的竹笱，鱼儿是跟潮水到来的，显示这些水田属于珠江三角洲近海有潮水到达的连片沙田。真是好一派早春开耕的农忙情景。当然，这些随葬物是用来显耀墓主人的富有，为一方的豪家大族；同时，也是西晋后期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北方战争频仍，经济凋敝，中土人士大批南迁，而南方地区相对稳定繁荣的一种反映。在广州的晋墓常见“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砖

文。广西梧州的晋墓也有“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等砖文发现，这些吉语砖文连同上述姬堂晋墓出土的陶制水田，粮囷和各种禽畜的圈舍，十分形象地展示出誉为岭南粮仓和鱼米之乡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当日如何丰盛康平的一幅历史图象。

陶瓷器是广州各博物馆藏品中的大项。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入藏的古瓷，除了唐宋时期南方浙江越窑和龙泉窑的青瓷，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北方耀州窑和河南临汝窑的青瓷，河北邢窑、定窑的白瓷，磁州窑的黑白瓷和钧窑的变釉等六大窑系的产品外，还有宋元以后的釉下彩青花，釉里红、青花加彩、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和广州的织金彩等名瓷产品，都拥有一定数量或珍稀品。广州博物馆所藏则以广州汉陶最具特色。这批汉陶都是建国以来广州地区考古发掘的出土品。其胎质、火候、制作、施釉以及器形纹饰等方面都有浓烈的地方色彩，是上承先秦时期本地区的印纹陶工艺传统而来。纹饰方面则以几何图形戳印为特点的拍印纹和精细的刻划纹为主要；器形中以各式瓮、罐、联罐、联盒、熏炉、匏壶以及屋、仓、囷、井、灶的成套模型明器最有地方特点。就目前所见，广州汉陶除了遍布两广地区外，在邻近的福建、江西和湖南的衡阳、长沙等地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所藏明清以来广东石湾窑的艺术陶瓷，不仅数量大，而且精品多。明代的吴南石堂、昇明、杨昇、可松、祖唐居等名家之作尽有；清代的有“仿钧蓝釉而胜于钧”，擅仿历代名窑的制品；还有备受称誉的动物、人物作品，其塑形大胆夸张，粗放简练，刻划传神，散发出浓烈的民间生活气息。

玉器则以南越王墓所出200余件(套)为重要。这批玉器不仅数量大，品类多，雕镂也极为精美，被誉为汉玉之大观。其中有71块玉璧、11套组玉珮饰、58件玉剑具和5件玉容器皿至为精彩。由于墓葬保存完整，未

受盗扰破坏，因而对研究各种玉器的使用功能方面有了可靠的依据。墓主身穿的“丝缕玉衣”，由 2291 片玉片组成，这是汉代考古发现完整的玉衣中年代最早的，又是仅见的一袭。

广东石雕以潮州地区的作品为精，展品 188 号的花岗石镂雕加彩雀替，在坚而脆的石质上雕镂出玲珑剔透的型体，真的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神奇。位居中国四大名砚之首的端砚，以石质优良，雕工奇巧闻名于世。今次选展的 6 方端砚，分属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制品，从中已多少可看出年代早晚在砚型与雕工上的不同。其中展品 192 号是 1956 年 12 月从广州动物园麻鹰岗一座初唐的残墓中出土的（该墓打破 56 东麻 M2 东汉建初元年砖室墓的墓道）。唐李肇的《国史补》说：“内丘白瓷瓿（即唐代邢州内丘县的白瓷碗），端州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这件唐代端砚和展品 137 号邢窑白瓷碗（共 2 件同为 1954 年广州建设新村唐大中十一年墓出土）是广州已发现众多的唐墓中仅见的孤品。这就表明所谓“天下无贵贱通用”，或许只是文人的夸张之词，事实上，端砚与邢瓷在唐代同属珍贵的物品。

金银器属于贵重金属制品，无论是考古发现或传世的馆藏都颇为珍罕。目前中国境内已出土有 4 枚西汉年间的金印，其中的 3 枚出自象岗南越王墓。一为“文帝行玺”、一为“泰子”、一为“右夫人玺”，这 3 枚金印除了可与《史记》、《汉书》的南越（粤）传相印证外，就从印玺学的角度来说，也增添了最新的资料。同墓出土的一个蒜瓣纹银盒，还有焊珠金饰件，展品 68 号串珠饰品中的十二面焊珠金球和西汉的蓝色玻璃碗等，同是来自西亚等地的舶来品，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来。广州的牙雕、广钟、广彩在清代颇有盛名，亦与海路对外通商贸易有关。

清代的金漆木雕神亭（展品 193 号），是一件较能代表广东潮州木雕风格与技艺水平之

作。明朝时期的竹雕则以江苏为著。本展览展出的明代朱缨祖孙三代和清代吴之璠、封锡禄、周颢、潘西凤四大名家的作品（展品 202—206 号），亦为全国所藏明清竹雕品中较为珍贵的。

书画藏品中选展 35 件。其中北宋文同《墨竹图》和元代李衍《纤竹图》，二者均为清代广东著名书画鉴藏家吴荣光旧藏。《墨竹图》入藏后 1980 年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展览。容庚价赠的明代戴进《山高水长卷》，为戴画罕见的巨构。清初著名画僧弘仁《黄山始信峰图》，为其黄山图景系列中最精美的作品。广东名画家作品，明林良的《秋树聚禽图》美术界公认为林画传世精真新代表作。清初张穆《七十龙媒图卷》，画各种性情体态的马数十匹，形神兼具，该卷为香港杨铨捐赠。清中晚期苏六朋《东山报捷图》、苏仁山《五羊仙图》，所画人物意气风发，各具特色。书法作品，清初陈献章茅笔行草书和彭睿壻的竹本派草书都极见功力。本展览展出的全国各地书画作品各有其代表意义，而明清广东书画家作品，则显示有拓新创意精神。

四

文物所具有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文物本身所固有的，它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但人们对它们所具价值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只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深化。我们深知，上述的一些介绍和评议，也许是很肤浅的，甚至有不当之论，冀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再者，广州的博物馆虽然出现较早，但先天不足，后天欠调，在藏品方面与多、精、全的要求距离很远，在馆舍与设备上更显得落后和管理欠善等等。这些除了要求我们文物、博物馆工作者必须努力再努力外，更有望于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俾广州的文物保护与博物馆事业得到扎实的较快的发展。

1996 年 12 月完稿于羊城寓所

浮 滨 文 化

曾 骐 邱 立 诚

在先秦时期的粤东、闽南大地,有一种特征鲜明,风格独特,覆盖区域广阔的考古学文化——浮滨文化。这类文化遗存通过近二十多年的考古发现的研究,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从先秦开始,粤东地区受到中原文化强烈影响的“潮汕文化”,正在酝酿、孕育之中,浮滨文化的被发现,对研究“潮汕文化”的源流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个文化的露头可以追溯到本世纪的四十年代,当时在粤东传教的意大利神父麦兆良曾在海丰、蕉岭等地发现一类含釉陶大口尊、石戈的考古遗存,但因未能弄清其内涵而把它归入所谓的“菝仔园文化”。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五、六十年代的粤东地区考古调查中,也偶有零星的发现。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饶平县浮滨区塔仔金山、联饶区顶大埔山两个地点清理发掘了21座竖穴土坑墓。第一次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来研究,此后,又在揭阳、大埔、普宁和福建省的南靖、平和、南安、云霄等地发掘了同类遗存。通过一系列的科学发掘和研究,特别是对1974年福建南安大盈出土的一组青铜器的重新认识,使我们比较完整地了解到浮滨文化共同体的组合、内涵,并进而认识它的性质、时代。

饶平浮滨、联饶等两个墓地的21座土坑墓,共清理出土随葬品近200件,连同发掘前早先出土的器物,总数达300多件。从考古报告开列的遗物清单看,有石器、陶器两大项。石器有戈、矛、斧、凿、砺石等工具、兵器及环、璜等饰物。陶器类有大口尊、尊、壶、豆、杯、盆、孟、罐、纺轮等。陶器的质料有夹砂红陶、黑陶,泥质灰陶等,有部分陶器施酱色釉。在几种陶器的腹部或肩部刻有符号或文字,计13种17个形体。

在作为后来浮滨文化命名的小地点是浮

滨区的一个山岗类型的墓地。被清理的残存古墓有16座。从中已可看出有贫富、贵贱的差别,例如最大的一座墓——浮滨一号墓,位于山顶部中央,墓坑巨大,长4.2、宽2.9、深3.6米,竖穴设置二层台,出土器物36件,多放置在二层台上。随葬品组合为石器、陶器、装饰品。仅大口陶尊和陶尊两种陶器便有16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釉陶大口尊高度有67厘米,大敞口、宽肩、长颈、折腹、斜肩,肩部饰有三枚铆钉式泥饼,肩和腹印直条纹,并施厚薄不均的酱色釉。小墓则坑浅,长1.2、宽0.6米,只有一、二件随葬品。

在顶大埔山墓地,除了清理5座墓外,还收集到一件青铜戈,长17.5、援长13.3厘米,援狭窄,隆脊有棱,两侧带刃。无胡,援与内上各有一圆穿。这件戈与江西吴城二期商代铜戈相似。青铜戈发现在墓地,也与墓中出土的石戈很接近,应为同一考古文化的遗物。

就在浮滨文化发现的当年,在福建省南安县大盈村寨山发现了一批出自墓葬的青铜器、玉器。出土的青铜器有铜戈5件、铜戚1件、铜匕首2件、铜矛1件、有段铜镞2件和8件小铜铃共20件。该地点的寨山贝丘遗址,经调查属浮滨文化遗址,因此,大盈铜器群可作为浮滨文化的青铜器来考察。

浮滨类型文化遗物的发现与广布在潮汕平原含云雷纹、夔纹等几何形印纹陶的山岗遗址的遗物截然不同,它带有若干黄河流域商文化的色彩而引起考古学界的注视,当时把它称为“浮滨类型”。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浮滨类型陆续在广东的潮阳、潮安、普宁、揭阳、大埔、丰顺、南澳等地发现。另外,在相邻的福建省的漳州、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南靖、南安、华安、龙海、泉州、莆田等地也有发现。目前发现的地点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处,已经形成

一支地跨闽粤两省,分布在榕江、韩江、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内,文化面貌基本相同的考古学文化。

综合有关考古材料,可以确认,浮滨文化是指分布在粤东、闽南区域内的一种以长颈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釉陶器、直内无栏石戈、三角形石矛、凹刃石铤组合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浮滨人拥有少量的青铜兵器、青铜生产工具,使用刻划于陶器上的简单文字。浮滨人已有发达的制陶业,掌握轮制技术,制造广东境内最早的釉陶。浮滨人处在一个战争频繁的时代,除了使用部分青铜兵器之外,还使用大批制作精美的仿铜石兵器,如直内无栏石戈、三角形石矛等。饶平县的21座墓出土石戈33件,石矛7件,占石器总数29%,南靖县三凤岭的一座墓便出土石戈10件,包括好几种式样,显示了浮滨人的尚武精神。浮滨时代相当于中原的商代中晚期,其下限可能到达西周。

近年来,我们先后在粤东韩江、榕江流域进行人类学考察,对浮滨文化又有许多发现和新认识。

一、1991年在南澳县的考古调查中确认了该县隆东乡东坑仔是一处浮滨文化类型的早期聚落遗址。在遗址中除了采集有浮滨文化的大口尊、梯格纹陶片、釉陶片外,还发现有石斧、石铤、网坠、纺轮,凹石和7件方块体陶拍等生产工具,并在遗址西北面的山坡地发现有夹杂陶片、石器的贝壳层堆积。

二、榕江流域的揭阳是浮滨文化遗存发现较多的地区,在114处先秦时代遗存中,含浮滨文化的遗存有33处,基本上可分属于白塔群、玉湖群、黄岐山群、仙桥群、桑浦山群等五个遗址聚落群。其中黄岐山群的浮滨文化遗存即多达12处,榕江平原很可能是“浮滨王国”的中心区。

三、在榕江流域的考察中,丰顺、揭阳、揭西、普宁、潮阳等市县都发现有浮滨文化的遗存,在揭阳境内如上所述,遗存极为丰富。在榕江南河东侧的仙桥镇,也是浮滨文化的分布密集区。在仙桥山前村的出土遗物中有两件石质牙璋,这是榕江流域浮滨文化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它与石戈、三角形石矛、石铤、釉陶、折腹豆、方格纹凹底罐、带流凹底陶壶共存。石质璋

来源于中原的玉质牙璋,是众所周知的商文化的重要礼器和祭祀中的宗教神器之一。这种礼器随着中原文化向四周的扩展、传播,在浮滨文化时期已进入岭南。因此,石璋也成为浮滨文化的重要断代器物。

四、199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普宁下架山镇的牛伯公山遗址,除了获得一批浮滨文化的遗物之外,还发现了浮滨人的居住遗迹、地窖、蓄水设施等。以往有关浮滨文化的发掘多属墓葬材料,此次发掘第一次揭示了这个文化的聚落形态,意义十分重大。同时,还通过地层采样,测定了一批标本的 C^{14} 年代数据。六个标本的年代范围在距今2870—3390年之内。绝对年代的测定,证实了前面把浮滨文化定在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前期的看法是基本可信的。

关于浮滨文化的性质、来源,尚存在多种不同的看法,我们透过日益积累的考古现象去观察历史,不难看出,在商周之际,为了掠夺南方的铜矿、食盐和作为流通货币出产在南中国海的宝贝,中原的奴隶主王朝对长江以南及闽粤进行扩张。经济的开发、财富的掠夺,同时也带来文化的交流,有一支中原文化以江西清江吴城为基地,溯赣江而上,经闽南而影响漳潮。这支商文化的南渐,一方面既融合了本地的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也接受土著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异,也许那些渗杂中原语音的闽南方言已开始滥觞,这样,便产生了粤东和闽南境内不同于诸越文化的浮滨文化。在《周礼·职方氏》中隐约提到的西周或更早些时候存在于东南沿海的“七闽”,正是这种中原人在殖民过程中获得的知识,浮滨文化在铜器、陶器、石器以及埋葬习俗上与商周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凹石、印纹陶、条纹褐釉灰硬陶系、有段铜铤等方面则反映出浮滨人所具有的土著特征,华夏文化与土著文化的第一次融合的时间由此而被大大的提早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粤东这片土地上第一次闪耀出中原商周文化光彩的“浮滨文化”,应该是“潮汕文化”积淀的底层及其渊源。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项目研究得到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的资助)

试论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

史红蔚

华南沿海包括广东、港澳、海南岛和广西沿海等地区,新石器时代从距今 6000 多年前到距今约 3000 年前。长期以来,这一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一般认为整个华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在各地虽有差异,但基本面貌一致,与我国其他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较,存在着明显的独特性。该区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以珠江三角洲、环珠江口沿岸和岛屿最为集中,时间上比较连续,遗址和遗物的面貌较为清晰。所以在讨论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以该区的材料为主。

一、关于整体的文化面貌问题

从整体上看,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反映了社会发展迟缓而稳定的、原始经济落后的面貌。

第一,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小、密度小、堆积薄、内涵简单,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水平不高,社会变迁和发展比较缓慢以及人口数量较少,增长率低。

华南沿海地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都比较小。根据报道,有些经过调查的遗址有上万平方米,但由于未勘探也未发掘,实际情况无法确定。从发掘的遗址来看一般在数百到 1000 平方米左右,在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偶有上万平方米的,如东莞虎门村头遗址①,但是数量很少。

遗址的密度小,没有发现遗址群。例如,深圳的大黄沙遗址②和咸头岭遗址③是华南沿海区域两处很重要的遗址,两者年代和文化内涵比较一致,但两者相距达七、八公里,其他地方发现的年代相当的遗址相距也比较远。一种可能是史前人类遗址在后代被毁或仍未被发现,另一种可能恐怕是该区域经济

发展缓慢,人口稀少所致。

地层堆积比较薄,不少遗址的堆积在 20~50 厘米之间,比较厚的在 1 米左右。有时在上下两个文化层之间还存在着不含任何文化遗物的间歇层,如珠海后沙湾的第五层④和草堂湾遗址第四层⑤。间歇层在沙丘堆积中常有发现,反映出了当时部分人类居住的非连续性或暂时性。

在地层堆积方面有一点还应加以分析。该区域发现的遗址大多数属于贝丘和沙丘遗址,这两类遗址的堆积速度与其它土质的遗址的堆积速度是不同的,前者的堆积可能比后者快。首先就沙丘遗址而言,沙质的密度小,相对于台地、山岗和土质来说堆积起来的速度就快。时间长了,遗物也会逐渐向生土层下沉,给人以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印象。其次,贝丘作为人类吃完之后的废弃堆积,其堆积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试假设,有 40 个成年人组成的聚落,每人每天的贝类消费量为 7~8 斤,该聚落每天的贝类垃圾就是 300 多斤,如果每年中有半年食用贝类,不含泥土,其净堆积就达到 6 万斤左右。广东潮安的陈桥贝丘遗址曾在 54×18 米的范围内发现了数十万斤的贝壳,以及石器、骨器、陶器、兽骨、人骨等遗物和遗骸。该遗址 3A 与 3B 层为当时的文化层,厚达 1.4 米左右⑥。如采用以上假设类推,则 1 米多厚的贝丘遗址堆积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这个分析试图说明贝丘遗址堆积虽厚,但是延续的时间并不长。海外学者对当代东南亚食用贝的海边居民的观察研究中,同样发现贝丘堆积的速度比较快,居民常常只需几年的时间就因垃圾堆塞而迁徙,另觅居所⑦。

该区域发现墓葬不多,墓葬集中在贝丘遗址

中发现。需要一提的是,墓葬发现的随葬品很少,在较早的粤西遂溪江洪鲤鱼地贝丘遗址一号墓中,发现的随葬品是1件小石斧,1把蚝壳刀,4件穿孔蚶壳和40多个海蚶^⑧。一直到了较晚的时期,许多墓葬仍然无随葬品,有的也是1-3件石器或纺轮或者加上一两件骨石制装饰品^⑨。这些情况也说明了社会经济不发达。

相比之下,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发达的大型聚落形态,发明了黍、粟和稻作农业,饲养狗、猪、牛、羊、鸡,彩陶艺术相当成熟,出现了各种玉器^⑩。黄河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品丰富,晚期还出现了一些大型墓。到了距今4000千年前后,他们已经迈进了文明的门槛,而华南沿海区域的文化就远远未能达到这个程度。

此外,遗址面积小、堆积薄还说明群体的流动性比较大,居住不够稳定。这种流动不但是区域内的流动,而且也可能包括了向南太平洋的流动。学者们在探讨南岛语系的起源时,认为该语系的源头与华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关^⑪,这一观点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二,作为主要文化遗物的陶器,器形种类少,长期变化不大,主要为手制,纹饰简单,同样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迟缓的状况。

陶器以质地火候不高的夹砂陶为大宗,手制,器形主要是圜底釜(罐)、钵、盆、器座、支脚等,陶色斑杂,壁厚,表现出发展缓慢的特点。

夹砂陶在较早时期遗址中占有绝对多数,到较晚时期虽然某些贝丘遗址发现泥质陶有所增加,但从整体上看以夹砂陶居多^⑫。

釜为常见的代表性器物,夹砂陶、敞口、鼓腹、圜底、饰绳纹。釜的延续时间很长,数量也很多,器形和纹饰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圜底釜作为一种文化物质,比起其他的要素在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中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三足器

器,特别是鼎普遍存在,而华南沿海新石器罕见三足器,炊具以圜底釜和支脚的组合为主,构成鲜明的文化特点,很耐人寻味。对此,笔

者将另文论述。

彩陶的情况也说明了社会发展迟缓的特点。在珠江三角洲一些遗址中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彩陶,它包含某些外来的文化因素。笔者根据珠海草堂湾第一期文化遗存和后沙湾第一、二期文化遗存^⑬三者的关系推测,彩陶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延续了500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彩陶比起其它的陶器来说可以算是精美,但仍然是手制,纹饰前后无甚变化,表达的题材基本是水波之类。虽然浮舟与航海在该区域居民的生活、生产中不可缺少,但在彩陶上没有发现与此有关的题材,彩陶艺术的水平不高。

实际上,夹砂陶、手制陶器、流行圜底器、配以器座和支脚等是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共同特征。如湖北的城背溪遗址^⑭、湖南彭头山遗址^⑮,但是这些新石器早期的共同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快便消失了,手制陶器也很快进步为轮制陶器,圜底器均被三足器,特别是被鼎所替代。黄河、长江流域的彩陶则发展更快,基本轮制,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进入了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段^⑯。但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很小,表现出的是一种缓慢而稳定的、不发达的文化面貌。

二、关于农业问题

从出土的打制石器看,华南沿海可能存在自身的农业经济

在华南沿海新石器遗址中,打制石器的传统很强烈,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如香港南丫岛深湾遗址晚期的C层中,出土的打制石器多于磨制石器^⑰。稍大一点的石器,即约10多厘米以上的石器,常常是打制或略加磨光即使用。而小石器多见磨光。打制石器的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大型的用于农业生产的磨光石器比较少见。

虽然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没有发现大型磨制农业工具,但不能据此认为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无农业。在当代没有农业的狩猎-采集群体中,基本上没有陶器。而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不但有陶器而且有定居生活等其它与农业有关的证据,其经济发展已经远远高于无农业的社会。只是如何分析这里的农业。

从打制石器的情况分析,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可能处在一个粗放耕作的生产阶段,种植一些薯芋类根茎作物。从民族志资料看,当代的一些原始民族最早学会种植的也是薯芋作物^⑮。也有学者指出,在亚热带沿海地区,可能根茎类和水果类作物比禾谷类作物更加适合种植^⑯。

薯芋类植物比起谷物类植物容易生长,耕作方式粗放,对石器的加工要求自然不高,所以多见大型的打制石器。而黄河流域的黍类作物和长江流域的稻类作物要求精耕细作,所以多见大型的磨制石器。很可能,打制的农业工具和磨制农业工具适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耕作对象,种植薯芋类作物使用的是打制石器,种植黍粟、水稻类作物使用的是磨制石器。

据研究,原始社会先后经历过“生荒耕作制”(火耕)和“熟荒耕作制”(耜耕)两种耕作方式的发展阶段。生荒耕作制时,由于地力衰退,人们要经常丢荒,“其所居之地力竭,乃迁居他处,再若干,另筑新屋”^⑰。华南沿海新石器的农业可能处在火耕阶段,因为对于砍倒烧光的耕作方式来说,打制石器是可以胜任的;同时结合遗址小、地层薄,表现出群体的流动性大这一点来考察,华南沿海这时也可能是生荒耕作制,所以,常见打制的农业生产工具。

华南沿海区域为何是长时期的粗放农业而不是像其他区域一样发展到精耕农业?可能因为该区域的自然条件与其它区域的不同,造成人们的食物结构及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不同等因素所致。当代原始民族的资料也证明,如果生态环境能够向人类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那么人们的生活就较有保障,也比较稳定,整个食物内容和食物结构以致生产方式就保持着对自然界的极大依赖,发展变化的速度相对较慢。例如生活在棉兰老岛的塔桑代人由于所居环境处于原始丛林和洞穴中,各种可食用的动植物丰富,生活变化极其缓慢,在70年代,仍然处于采集狩猎的经济状态^⑱。华南沿海的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如何,仍有待于研究,但从其水系资源来推测,其生产和海产类资源应非常丰富,水产海产类食物在人们生活中应占有主要地位,人们的生活内容与河流海洋关系密切,捕捞滩涂业可能比农业发达。

三、关于造船等手工业问题

从华南沿海所处的环境来看,该区域的原始先民们应存在造船和建造房子等手工业活动,小石器可能就是从事这类活动的木工工具。

华南沿海新石器遗址中常发现数量丰富的磨光小石器,这一点与粗糙的大型打制石器形成鲜明的对比。小石器以有肩和有段形式为主,除了个别砂岩制作的质地松软,可能作为象征性器物外,大多都是实用器,器形常见铤、斧和长条形的凿之类,以石铤占多数。从器形判断,这类小石器主要是作为木工工具。在现代一些偏僻落后的山区农村,人们将园木加工成板木时曾经使用一种类似小铤状的金属制的小楔子,依次将几个楔子一排打入园木中,使木头按一条直线裂开。人们在断开石条或石板时也有使用这种方法的。当然小石铤或斧也可以用来对木头进行凿眼和刨光等。

华南沿海河湖多,海岸线长,海岛星罗棋布,在此环境中生存的居民必然较早地掌握与水打交道的本领。捕捞业是人们的主要食物,人们的生活生产与水密不可分,造船是这类民族必需掌握的一门技术,所见的大量磨制小石器应该可以解释为造船用的工具之一。珠海高栏岛宝镜湾的石刻岩画发现有船形图案,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所见的船似乎已经比较成熟^⑳。还有论者认为,华南沿海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掌握了航海技术^㉑。航海必需要造船,造船是一项比较精制的技术,其要求比种植高许多,所以石器的制作也较之精致。

同时,这类石器还可能用于建造房屋。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些房屋的遗迹,有地面和干阑建筑两种形式。在深圳的一些遗址中曾发现一些排列零乱而无规则的柱洞^㉒,这与台湾兰屿雅美族的干阑建筑有些相似,雅美族称干阑的柱子为“椿”,椿的排列也不整齐,甚至有些零乱^㉓,遗址中零乱的柱洞遗迹可以推断为干阑建筑。广东高要的茅岗遗址曾发现大面积的干阑建筑残迹^㉔,遗址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晚期。造房子同样是比种植更精制的技术,干阑建筑的榫卯更加精制,对木工工具的要求更高,所以也要使用磨光小石器。

四、关于该文化群体的体质特征问题

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存在着自身的独特性,体质上的独特性与该区域文化上的独特性有着必然的

联系。

文化与人群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地认为,特定的人类群体创造出特定的文化,所以,研究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时,不可忽略人类体质特征的要素。体质人类学家在研究了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晚期出土的人类头骨后指出,“河宕头骨和太平洋尼格罗人种头骨之间的相似程度大于它们同典型蒙古人种头骨的相似程度,它们应该属于蒙古人种特征弱的古代南部边缘类型”^⑦。尽管这一研究结果的精确度仍然有待更多的资料和进一步的研究来加以完善,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即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在族属方面可能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的居民。还有学者通过对新石时代到现代两广地区人类牙齿的测量及其与其它地区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两广地区是小牙区”,表现出“牙较细、牙列短、磨耗轻”等特点^⑧。文化与族属是相互联系的,是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创造了华南沿海的史前文化。对华南沿海史前居民体质特征的认识,目前这方面的资料依然薄弱,有待于今后的工作。

上述对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作了一些粗浅的分析,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我们认为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考古遗迹和遗物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相互有机的联系,这些文化特质的联系,使华南沿海新石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构成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

(作者单位:深圳市博物馆)

参考文献:

- 1、朱非素:《广东考古新发现的几点思考》,《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3月。
- 2、深圳博物馆等:《广东深圳市大黄沙沙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
- 3、深圳博物馆等:《深圳市大鹏咸头岭沙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
- 4、珠海博物馆等:《淇澳岛后沙湾遗址发掘》,《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 5、珠海博物馆等:《三灶岛草堂湾遗址发掘》,《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 6、广东省文管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 7、Richard A. Engelhardt & Pamela R. Rogers: “Traits” or “Treats”? Units of Archaeological Study:

The Example of Maritime - adapted Cultures in Southeast Asia, 刊载于《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3月。

- 8、朱非素:《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的探讨》,《广东出土先秦文物》,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
- 9、杨式挺、陈志杰:《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第三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 10、任式楠:《公元前五千年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几项主要成就》,《考古》,1995年第1期。
- 11、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
- 12、甌燕:《试论史前南海地区沙丘和贝丘遗址》,《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
- 13、朱非素;《珠海考古研究新成果》,《珠海考古新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 14、《宜都城背溪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
- 15、湖南省考古所:《湖南省澧县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第10期。
- 16、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7、蔡维廉:《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第221页,香港考古学会专刊第三本,1978年。
- 18、黄崇岳:《华南新石器时代的领先性与滞后性初探》,《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3月。
- 19、乔晓勤:《古越族向海洋的拓展及考古证据》,《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1993年11月。
- 20、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133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3月。
- 21、刘达成等编译:《当代原始部落漫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 22、徐恒彬等:《高栏岛宝镜湾石刻岩画与古遗址的发现和与研究》,《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 23、邓聪等:《大湾文化试论》,《南中国及邻近地区的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 24、深圳博物馆等:《深圳市大鹏咸头岭沙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
- 25、刘其伟:《台湾土著文化艺术》,台湾雄狮图书公司,1983年。
- 26、杨豪、杨耀林:《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12期。
- 27、韩康信:《中国新石时代种族人类学研究》,《中国原始社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 28、冯家骏:《岭南百越族群体质特征分析之一:牙齿的观察与测量》,《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1993年。

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系统环境及稳定性

史红蔚

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在地域上包括广东内陆及其沿海,港澳地区,海南岛和广西沿海等地区,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的几千年中基本上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现在这一地区的考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许多方面都比过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了从多个角度来认清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问题,本文将以系统的方法论述该文化的系统环境以及其稳定性问题。

一、系统的环境

系统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与系统发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与之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外部状况就是系统的环境。对于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系统来讲,系统环境有自然地理构成的硬环境,也有由相邻的文化系统构成的软环境。系统的形成和变化往往有赖于环境的作用和变化。这里我们探讨的是系统的硬环境。

华南沿海在地理环境方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北面被高山峻岭所阻隔,海拔在500—1000米以上。与福建沿海连接则相对平坦,海拔高度在200米以下^①。据海洋地质学家的研究,在距今8000年前后,华南沿海地区的海平面比现在平均低24米。距今5200年开始,这里的海平面又经历了1000年的波动,有时海平面降低,使江河和沿海水域面积减少^②。海平面低则意味着陆地面积曾经变宽。福建沿海与华南沿海的通道,在距今8000—4000年的时间里,曾经变得宽阔而平坦。此后,海平面与今天无太大的变化,粤闽沿海的连接通道便由宽变窄。

近年来生态环境广泛受到各个学科的关

注。目前广东还没有有关新石器遗址的生态环境方面的详细报道。从福建闽侯的溪头和坛石山遗址的研究中可知,当时福建沿海地区可能是海洋亚热带气候,湿润多雨,当时的山岗有茂密的森林,贝丘遗址附近的缓坡山岗植被茂盛,有松栎属乔木和大量的蕨类草木植物,常见生活于现在的南方森林中的大型动物,如虎、象、犀牛、鹿、水牛和熊等。溪头遗址和坛石山遗址之间时间延续有两千多年,也就是说这样的生态存在了两千多年以上^③。但期间有无波动和变化仍未知道。福建与广东地理位置和遗址的特征类似,两地都有大量的贝丘遗址存在,华南沿海当时的生态环境可能与此相去不远,都属于海洋亚热带气候。

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南北文化的交往就比较困难,交流的速度也会因此而缓慢。我们在考古遗物上看到的交流现象并不多,强度也不大,常见到的有彩陶、有段石器和某些几何印纹陶纹饰的传入,流行的时间比较长,变化小;同时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与外文化系统的交流是双向的,产生于华南沿海地区的双肩石器在新石器时代也不断地向其它文化系统传播^④。

粤闽沿海的文化交流显然也与这一地理环境有关。比较而言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与福建沿海,特别是闽江以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交流相对频繁和容易一些。这一点得到了考古遗物的证明。福建海坛岛壳丘头、东昆南厝场和金门富国墩等遗址发现的遗物从陶器纹饰、器形、陶质到石器都与华南沿海有着很大的一致性,这种相似性基本上反应在较早时

期的文化地层中⑤。

华南沿海居民在以上所述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下生活可能是比较稳定的,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冲击相对就比较小,这就使得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文化长时间保持了独特而稳定的面貌。

二、系统的稳定性

系统的稳定性不但与系统的环境有关,而且同时也与系统的稳定机制有关。每个系统都有自身的稳定机制,稳定机制使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考察考古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系统的稳定机制是通过文化的选择进行的。笔者在对陶器的考察中发现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系统对自身的陶器、石器文化特质有一种稳定选择⑥。这种选择说明了系统对自身文化的认同。那么,在对外来文化特质的选择中情况又是怎样呢?下面我们选择几项文化特质来分析考察。

1、鼎

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一直流行圜底器而不见三足器,鼎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在系统的要素中几乎不存在,从地下发现的材料来看已是事实。然而,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器物,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黄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是鼎的起源地之一。在早期老官台文化的北刘类型中发现了三足罐和三足钵,早期的三足器大都形似钵和罐,这也许是鼎的前身。该类型文化约距今 7300—8000年⑦。到了仰韶文化、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时期鼎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此后鼎便蓬勃发展,愈发辉煌。新石器时代除了华南沿海之外,鼎几乎遍布全国各个文化之中,只是时间上有早有晚。就现在所知,新石器时代的鼎主要是作为炊具使用。到了阶级社会早期,鼎成了礼器,成了制度和文明的化身。也许可以说,鼎是中华文明中的一种重要器物。

在考古文化方面,我们看到鼎有着很强的整合作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各地文明的起源呈现多元化的现象,地方特点也比较浓厚。黄河流域出现鼎的时候,在其他文化遗址中,往往发

现支脚加炊具的用法。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各地文化的交流,鼎很快传入各个无鼎的文化中,代替原来的炊具。河姆渡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座灯塔,釜在这个文化中非常发达,是代表性器物,但是到了该文化的后期,鼎传进来了⑧。福建闽江下游以南沿海和台湾西海岸地区在距今 5000—6000 年前的壳丘头文化时期也同样没有鼎。如上所述,该区域的其他文化特质也与华南沿海大体相似。但是到了这一文化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该区域的文化发生了较大变化,闽台新石器文化中都出现了鼎,整体的文化面貌也逐渐远离华南沿海而趋同于长江下流文化。壳丘头文化之后已经转为坛石山文化⑨。这时文化遗物的特征受马家浜文化的影响较大。

随着鼎的发展,各地文化遗址的各项文化特质也随之表现出了趋同的现象。在阶级社会中鼎作为最重要的礼器,它在华夏文化系统的统一和文明的进步中更是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不可低估鼎表现出来的能量和对文化发展的整合作用。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如此整合力量的器物,在这么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基本没有传入华南沿海地区,或者说基本上不被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居民所接受。

其实鼎在新石器时代曾有几度进入华南沿海范围,到达了珠江三角洲的外围。银洲坝遗址的资料就是一例。该遗址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西北端,遗址文化层约距今 4000 多年,遗物中常见火候低的夹砂陶釜、罐等,还发现了一件含石峡文化因素的鼎,盘口、扁圆腹、圜底、瓦形足⑩。该遗址的其他文化遗物与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系统一致。石峡文化在广东的北部,位于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北部边缘⑪。它可能与长江流域晚期的新石器文化有关,所以鼎很发达。在粤东揭阳县的埔田宝山崇遗址也发现了夹砂釜鼎、子口折腹鼎,该遗址的文化特征还是以华南新石器文化特征为主⑫。可见,鼎在华南沿海的周围,也就是珠江三角洲的西北东几个方面都曾经出现。但是除了石峡文化外,鼎都只是偶尔出现,影响微弱。石峡文化有自身的体系,鼎是该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华南沿海出现的鼎,

●考古发现与研究●

都是含有石峡文化或江西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因素^⑬而不见其他文化的因系。

鼎在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中没有得到传播和发展,说明该文化系统在对外来文化的选择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一种稳定的性质,这种性质是与系统居民对自身的文化认同相关的。为何存在这种现象,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由于华南沿海相对隔绝的地理单元,使得外部发达的文化不能够强烈影响进来;另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还是系统自身的文化因素使然,例如该系统可能有自身的传统、语言、人种、生活和生产方式、行为模式等等,而且这些自身的因素由于历史原因而已经达到了比较牢固的程度,非一般外部力量能轻易改变。

还有,鼎作为炊具,与人们的生活关系非常紧密。民以食为天。在生活水平还很低下的原始社会,饮食对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群体来说更是视如生命。这里的人们坚持用釜而不用鼎作为炊器可能还与其饮食结构有关。

2、与石峡文化的关系

石峡文化位于广东北部,有一定的分布范围,以石峡遗址的下层为代表。它有自身的一套陶器、石器生产工具、玉器装饰品和氏族墓地,种植水稻,时代距约今 4500 年,前后延续的时间达六七百年,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其文化渊源与长江下游文化有关。专家认为这一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⑭。1985 年在石峡遗址下层之下发现了以夹砂绳纹圜底罐为特征的华南沿海系统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距今 6000—5500 年,遗物较少^⑮。在石峡文化的中层,即叠压在石峡文化之上的层位又属于华南沿海系统的新石器文化,大约距今 3500—4000 年,文化内涵又是夹砂陶圜底罐之类的器物,并已经出现了几何印纹软陶。这时华南沿海系统的文化,在粤北分布更加广泛^⑯。可见,在石峡文化前、后面都是华南沿海系统的文化,石峡文化被夹在中间,它们之间在时间有一定的缺环。

在石峡遗址中,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与石

峡文化似乎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这也是系统的稳定机制在起作用。系统在描述稳定机制时,是用负反馈的概念来说明稳定机制是如何抗拒干扰,纠正系统偏离目标而使系统稳定的。笔者认为,在研究文化时,使用“稳定选择”的概念更为合适一些。实际上二者的原理是一样的。它们所揭示的都是系统如何保持稳定。石峡遗址三个阶段的发展,很有力地说明了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稳定选择和这种选择给系统带来的稳定性。

3、彩陶和白陶

华南沿海地区经常发一些彩陶。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贝丘和沙丘遗址比早期的地层中。器形主要是圈足盘。彩绘颜色为赭红色,花纹常见表现水的各种水波纹。有些遗址发现彩陶的数量比较大。时间在距今约 5500—6000 年前左右。与此同时,白陶也与彩陶一起传播进华南沿海地区。后沙湾遗址发现一件簋形器,纹饰被称为“浅浮雕式繁缛纹饰”^⑰,可见其艺术性。这种彩陶和白陶普遍地被认为是外来产物,并且其渊源来自洞庭湖区域的大溪文化^⑱。洞庭湖区域是白陶的发源地,7000 多年前这里就产生白陶,这里也是彩陶的起源地之一。这种比较高的制陶工艺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是相互协调的。洞庭湖区域的大溪文化是典型的稻作农业文化,社会经济水平很高。

湖南与华南地域上相邻,它的白陶和彩陶向华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传播是很有可能。大溪文化的彩陶传进了华南沿海地区后,在这里继续延续,但没有看到将彩陶发扬光大的迹象。因为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珠江三角洲腹地的河宕和螺岗的贝丘遗址中还发现有彩陶,器形还是圈足盘或豆,但纹饰简化^⑲,预示着彩陶这时已经衰亡。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溪文化的彩陶和白陶传进了华南沿海地区,并且彩陶还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与彩陶和白陶相伴的稻作农业却没有传播到华南地区来。在这个文化现象方面,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文化又一次表现了文化上的稳定选择。或许彩陶和白陶在华南沿海地区有其功能,在

这个文化系统中找到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如作为精神祭祀方面的器物而存在,而水稻农业在这里并不需要,所以就难以传播进来。或许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4、有段石铤

有段石铤在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系统中也是属于外来的器物。它最早产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然后通过江西等地传入华南沿海。有段石铤在稻作农耕文化中是一种装柄使用的农耕工具,体形比较大。在河姆渡文化中就发现了装柄的有段石铤^⑩。在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系统中发现的有段石铤,器形小,多数在六七厘米左右,有的小到三四厘米长,通体磨光,多数为实用器,也有少部分的石质很软,疑是作为某种象征性的器物。根据其重量,六七厘米左右的有段石铤是不能装柄的。有段石铤在该文化中比较多的是作为木工工具,无需大型,如果是装柄也应与农业工具不同。

由于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中没有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所以有段石铤传播到该文化后,根据其功能需要,进行了改造,使其变小。这说明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对外来文化因素的选择过程中是有目的性的,这是符合系统原理的,而功能方面的需要很可能是文化进行选择时首先考虑的因素。

以上的论述说明,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在与外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有相当稳定倾向性。这种稳定选择机制使得华南沿海新石器的文化保持了长期的稳定性。

此外,我们还看到,远古时代的人类与现代社会的人类在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方面有很多不同之处。我们一般认为,先进文化比落后文化有很大的生命力,落后的文化会被先进的文化所征服。但一旦一个文化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系统,在系统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之后,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先进与落后之间就会交替存在,反反复复。因此研究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文化要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对文化的系统作整体性的分析。当

然,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真实情况还要比笔者分析的复杂得多,系统所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笔者这里只看到冰山的一角,如系统的产生,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结构与关系,子系统更次一级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等等依然是很大的课题,仍然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做更加深入的研究。(作者单位:深圳市博物馆)

参考文献:

- ①、《中国地图册》,地图出版社,1983年。
- ②、李平日等:《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的演变》,海洋出版社,1991年。
- ③、林钊:《福建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考古》1994年第5期。
- ④、曾骥:《珠江文明的灯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
- ⑤、福建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⑥、史红蔚:《从系统的观点看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各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待刊。
- ⑦、陕西考古所:《十年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1978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⑧、刘军:《河姆渡文化的再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 ⑨、福建博物馆等:《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⑩、朱非素:《广东考古新发现的几点思考》,《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
- ⑪、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
- ⑫、朱非素:《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的探讨》,《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
- ⑬、同⑫。
- ⑭、朱非素:《石峡文化墓葬所反映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 ⑮、《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5年。
- ⑯、广东省文管会等:《广东曲江鲶鱼转、马蹄坪和韶关走马岗遗址》,《考古》1964年第7期。
- ⑰、任式楠:《论华南史前印纹白陶遗存》,《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
- ⑱、何介均:《环珠江口史前彩陶与大文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
- ⑲、甄燕:《试论史前南海地区沙丘和贝丘遗址》,《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
- ⑳、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大埔明墓清理简报

邱立诚 邓宏文

1997年7月28日，大埔县双溪电厂移民办工程队在湖寮镇(县城)岭下管理区下院坑建筑工地施工中发现一座古墓，随即报告县博物馆。此事经报梅州市文化局后，又转报至省文化厅文物处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所接报告后与大埔县联系，得知古墓现场已停工等候处理，即于29日派出邱立诚等3人赶赴梅州，并于30日汇同梅州市文化局、梅县博物馆的同志到现场考察。经与大埔县文化局、双溪电厂移民办研究后，于31日对该墓进行清理。大埔县公安局、移民办、湖寮镇府、文化站也派员到场协助工作。

一、墓葬概况

该墓位于一座山岗的山麓，距山下地面高约8米，是一座长方形灰砂结构的双棺合葬墓。清理时，墓圻大都已毁，棺移位至距原墓圻约2米处，灰砂部分剥落。从灰砂残存情况判断，整个墓穴长2.55、宽1.52米。灰砂从四周将棺木包装，密封较好。前后及两侧灰砂

分两层，外层厚15厘米，内层厚11厘米。两棺之间灰砂厚约8厘米。覆盖棺木之上的灰砂厚13-15厘米。墓向65度，头向245度。棺为楠木制作，髹黑漆，棺内尚存一些棕红色液体。

男棺位于北侧，即女棺之左面。棺盖板长1.95、宽0.64米，底板长2.05、宽0.43、高0.45米。棺板厚6-7厘米。底板修成弧形，侧板较盖板短2厘米，盖板与棺身是子母口接合。装敛方式是尸体上面用棉被芯覆盖，头部两侧用一些棉、麻织品填充。尸体为仰身直肢，高约157厘米，肉体已腐烂，尸骨亦朽，仅头骨及部分躯干肢骨保存稍好。头发尚有少许。头上戴有束发的冠饰。后脑有一束发器。头下垫一枕头，身上穿着三重衣，均白色麻布，腰间用布条束腰并系一布袋，布袋内装有4枚牙齿。由于尸体口腔内没有发现牙齿，这4枚牙齿应是死者生前因年老而牙齿脱落，死后再装入袋中随葬，4枚牙齿中，3枚为前

白齿，磨损严重，据此判断年龄为 60—70 岁。下身穿 4 件裙，其中 2 件蓝色，2 件白色。脚穿 1 对布袜，再穿鞞靴一双。右手执一纸质折叠纸。左肩处发现 2 件木梳和 1 件竹篋，用纸包裹后再用绳捆绑。棺内底有三长二短の木条构成木垫，以承托尸体。女棺位于南侧，即在男棺之右。棺盖板长 2.02、宽 0.47 米，底板长 2.06、宽 0.44、高 0.48 米。棺板厚 6—7 厘米，盖板四边切角，底板修成弧形，侧板较盖板短 10 厘米，盖板与棺身是子母口接合，并用铜棺加封。装敛方式是尸体用纸及绢覆盖，均腐朽。全尸用麻布包裹，扎结 7 个，尸体亦作仰身直肢，高约 152 厘米。头略侧向男棺，头上似扎双璧，一触即朽。肉体腐烂不存，肢骨亦较朽。肩上有麻布披肩，上身穿二重衣，下身着膝裤 2 件，裙 2 件。腰间系小布袋 1 个。脚穿二重袜，再穿鞋一双，衣、裙、裤、袜均系白色麻布，鞋亦布质，有绣花，左肩处发现一白色麻布袋，内装 2 件木梳，包裹后用绳捆绑。女尸的牙齿保存尚好，从牙齿磨损情况判断其年龄为 20 岁以下，棺内底用竹条 7 长 9 短编织成竹垫，以承托尸体。

二、遗物

随葬遗物，包括有墓主人身穿的衣服、梳、篋、扇、布袋、束发冠饰等。

(一)衣服鞋袜

衣 5 件。白色麻布。其中 3 件出于男棺，2 件出于女棺，袖长而宽大。

裙 6 件。均麻布，其中 4 件出于男棺，有 2 件为蓝色，2 件为白色，另 2 件出于女棺，白色，男裙较长，而女裙略短。

膝裤 2 件。白色麻布，出于女棺。

披肩 完好者 1 件，白色麻布，出于

女棺。

袜 3 对。白色棉布，较厚。其中 2 对出于女棺，1 对出于男棺。

短鞞靴 布质，1 对。出于男棺。

鞋 布质，1 对。出于女棺。

(二)枕头 1 件。用麻布包裹麻草制成，出于男棺。

(三)布袋 3 件。其中 1 件用于装女棺木梳，长方形，麻布质，白色，长 36、宽 21 厘米，一端有袋，深 13.5 厘米；1 件为白色麻布质小袋，口小，用绳套栓，袋身近圆形，高 6、宽 7.5 厘米，内装有纸，出于女棺；另 1 件为灰色麻布制成，口小而底大，口用绳套栓。有补丁，高 13、宽 16 厘米，内有纸包裹 4 枚牙齿，出于男棺。

(四)梳、篋

梳 4 件。木质。女棺出 2 件，脊部略弧，两侧对称，1 件长身较窄，有 62 齿，长 11.8、最宽 3.8、脊厚 0.9 厘米，另 1 件，身较宽大，有 38 齿，长 15.4、宽 7、脊厚 1.6 厘米。男棺出 2 件，脊部斜弧形，两侧不对称，1 件较宽，有 43 齿，长 17.7、最宽 7.2、脊厚 1.82 厘米，另 1 件，身稍窄，有 64 齿，长 11.6、最宽 4.2、脊厚 0.9 厘米。

篋 1 件。竹质。平面为圆角长方形，两个长边有齿，篋齿细密，长 11.4、宽 5、脊厚 1.3 厘米。

(五)束发饰

束发冠 1 件。用纸制作，纸上用墨草书一个“福”字，器半球体，器表用竹丝缠绕，先是前后竖行编织，再为环绕式编织，顶部脊处及前面有木雕片装饰，两侧各有一枚木簪从外向内插入。

●考古发现与研究●

束发器 1件。箕形。顶端平，上有一棱形铜柱，然后用绳盘缠，缠后用5枚竹簪插栓。

竹簪 5件。其中4件配成2对，1对为圆锥体，一端雕成花瓣形，其下为齿状腰鼓形，有弦纹数周，簪尖渐细，长10.8厘米；另1对体扁，一端上有4个六瓣花形贴饰，多脱落，边为齿形，另一端渐收成簪尖，长11.5厘米；还有1件为柳叶形，一端雕有兽面形，向另一端渐收成尖，长11.6厘米。

(六)纸折叠扇 1件。又名聚骨扇。扇面米黄色，18竹骨，下有栓孔。扇面宽53.5厘米，扇骨长37厘米。

(七)石碑1方。在距离墓穴不远处发现。长方形，上端略作圆角，碑上铭刻“万历甲寅冬吉旦 明 绎波萧公 新村李氏墓 子有声立”。该处不见有其他墓穴，又据墓之形制及随葬品情况分析，判断此碑属于该墓的可能性最大。

三、初步认识

1、关于墓主人。该墓出土遗物中，只有一个“福”字，未能提供更多的有关墓主人的文字资料，倘若墓碑无误，则男性墓主人姓萧名绎波，卒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即公元1614年，距今为383年。其子为萧有声。据观察，男性墓主人年龄很大，在60-70岁之间，女性墓主人年龄很小，在20岁以下，年龄相差悬殊，至少可以认为不是原配夫妻，或以为是填房，小妾之类。又从女尸没有首饰类装饰品随葬，头上扎双髻等情况分析，似乎是丫环更为合理。明代曾有买婢女以陪葬之风。因此，此女性很有可能是男性墓主人的陪葬者，即碑铭上的李氏，新村是大埔湖寮镇的一个小村，李氏可能就是新村人。

2、男性墓主人身上所穿衣裙，多有补丁和破洞，上有烟熏之洞，腰间所系布袋，亦有补丁和破绽，说明均系生前使用之物，头上所用饰物，不见金银铜玉之器，而仅用竹木类簪子，反映墓主人生前不是大富之家。但墓圪用女陪葬，更非贫寒之家所为。由此推测，男性墓主人可能是一个家境一般之人，其子只有一个，其时他的妻子可能尚未去世，故而用婢女陪葬。

3、1976年在潮州桃坑清理一座明正德三年刘易庵夫妇合葬墓，男女尸均系包裹后系结11道。而大埔这座明墓，男尸不见包裹系结，仅女尸包裹系结7道，表明装敛方式有所不同。该墓随葬的扇子，保存尚好。过去大埔明万历十年黄宸夫妇墓随葬描金折叠扇一把，相邻的潮州刘易庵墓亦出有扇子，估计这是当地较为流行的一种习俗，梳子则是明代最为常见的随葬品。

大埔这座明墓随葬品不很丰富，是明代不重厚葬的写照。该墓所出纸扇、簪子、衣服及其埋葬、装敛方式，对探讨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民俗等状况，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在此墓清理之前，大埔曾发生损毁古墓的事件。据说墓内有随葬品及干尸。但事后文物部门只收集到一把木梳，这件事震动了梅州市和大埔县文物管理部门。这次发现古墓后，工程部门能立即报告并停工等候处理，使古墓得到及时清理，一批文物得到保护，这是值得赞许的。发掘工作得到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双溪电厂移民办公室按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提供了古墓发掘费。

(作者单位：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刘金宏

—

当今世界，博物馆都有可能陷入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经费不足可以说是主要原因，也是博物馆普遍面临的问题。从市场经济的国家看，除极少数“精神生产”由国家承担外，绝大多数都必须在市场机制中自求生存和发展。日本全国只有5个博物馆是国家“包”起来的，统一前的“联邦德国”更少，只有1个。像世界最大博物馆之一的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虽有董事会强劲的经济资助，但每年8000万美元的经费中，仍有三分之二得靠自己经营“创收”^①。从我国当前形势看，这个问题更突出。因为，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都很不平衡。农民一直是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没有多少文化的城市普通市民在文化消费心态方面与一般农民差不多。所有这些，与当前我国从计划

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实际相呼应，加上一段时间内存在于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确导向弱化倾向，就使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和突出。因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博物馆，就和其它高雅文化艺术一样，陷入了困境，面临着社会转型期从无序到有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安和不景气双重挑战。同时，也碰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面临着现实政治和市场两种需求共同刺激所带来的大发展。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视博物馆为教育机构。在博物馆界，这种思潮更为强烈，专家们已经确信，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出现和强化是其进入现代发展形态的标志。在日本，人们认为博物馆是以进行科学教育为目标的社会教育手段，并且是具有能在馆内外广泛开展活动条件的社会教育

●博物馆研究●

机构中的一种专门机构，进行社会教育工作对博物馆来说，可以说是它的中心工作②。在美国，人们视博物馆为学习中心，“多种智能理论”正在博物馆学习中得到应用，当前在美国博物馆界掀起了视博物馆为教育机构的强烈思潮③。在我国，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三性二务论”确立以来，人们就一直视博物馆为收藏保存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和社会教育机构三者的有机统一体。可见，不管什么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亦不管是出于何种考虑，是基本宗旨，还是生存需要，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强化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并把科学教育作为博物馆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这种形势下，探讨博物馆的教育问题就很有现实意义。本文只就博物馆教育能否使博物馆走出困境的问题向各位同行请教，希望批评指正。

二

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共同分析一下，目前博物馆所提供的教育究竟怎么样。事实上，在目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博物馆教育。一种是科学的博物馆教育，一种是不科学的博物馆教育。这两种教育在每个博物馆几乎都有所表现，只是具体程度不同罢了。

不科学的博物馆教育，是以假定“观众都是一样的受教育者”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博物馆给人的教育是笼统而抽象的。它就象“水果”一样，只是概括性的抽象词儿，是不能拿来吃，也没有什么味道的不中用的东西。这种粗放的“水果型”教育，缺乏科学精神。它使观众处于被动状态，让观

众没有选择余地，它不管观众是否喜欢，是否高兴，是否满意，是否需要，是否能接受，都毫不例外地视之为“一样的受教育者”，它无视观众客观上存在的各种差异，也不把他们当成博物馆参观学习的主体。总之，不科学的博物馆教育，既不能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客观公正、全面正确地对待观众的实际情况，又不能用科学方法“因人施教”，诱使人们产生对博物馆教育的兴趣和需要。同时，还使博物馆得天独厚的“因人施教”条件(能让实物展品及其所组合的艺术形象本身“说话”)发挥不了应有作用。所有这些特点就规定了不科学的博物馆教育是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前途的失败教育。目前，这种教育在博物馆的主要表现有：1、大多数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固定说明，如文物展品的说明文字水平，事实上都是将观众视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这显然与观众文化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不符，对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弟兄和少年儿童来说，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不科学的表现。2、有些地方的博物馆，过多地采用行政方式发通知要求人们到博物馆参观学习，这虽然能使博物馆热闹一会，但却使大多数参观者流于形式，指明完成紧急任务似的走马观花了事。久而久之，就给人造成错觉，以为博物馆所能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性的教育。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其效果可想而知。它与我国博物馆不仅要服从政治导向，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要重视市场导向，为人民服务的“三性二务论”原则要求大相径庭，因而是科学的一种表现。3、不少博物馆解说词的写作也假定观众都具有

中等文化水平。更有甚者，在实际讲解接待中搞“一刀切”服务，不管谁来参观，都以一套几乎一字不差的解说词“相待”。这无疑与“因材施教，因人施讲”的原则背道而驰，因此，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表现。事实上，到过全国各地一些博物馆参观学习的人就会注意到，不少博物馆从馆舍设施到陈列展览(博物馆教育的基本教材和阵地)再到讲解接待服务，都存在不科学或不够科学或违反科学原则或缺乏科学精神的各种现象。这可以说是目前博物馆教育的最大欠缺，亦是今后博物馆教育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与上述情形正好相反，科学的博物馆教育承认这样的事实，对博物馆而言，观众不仅是“一样的受教育者”，还是“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换言之，科学的博物馆教育承认观众的“双重身份”，认为他们既是博物馆的教育对象，又是博物馆的参观学习主体，而且比较强调观众的主体身份。因为，事实上，不管观众是否到博物馆来，他们都有自己的认知感受方式和学习方法。从我们做所的观众调查可知，人们大都希望博物馆尊重他们在天性与习惯方面的特别之处。正象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观众普遍希望博物馆尽量考虑每个人的兴趣、个性特点、身体完残情况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表明，每个人的智能实际上都有着不同的集合构成。博物馆资深的讲解员更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观众实际上是属于不同智能类型的人。他们中有些人对语言性的讲述较敏感，有些则对音乐性的节奏较敏感，有些对数据表格敏感，有些对逻辑推理敏感……即使是同一类型的观众，也有人比较“拔尖”，有人比较“良

好”，有人比较“一般”。这些知识，尤其是从大量接触形形色色的观众中得来的实际知识，都是博物馆科学教育所需要的。因为，科学的博物馆教育，是从观众实际情况出发的实事求是教育。这种教育，科学地瞄准目标观众，尽量关心体察每个观众的具体情况，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它就象可口的“苹果”、“香蕉”、“雪梨”、“荔枝”、“桔子”、“葡萄”……那样，不仅“吃”了能顶用，而且因为色香味俱全而常常令人胃口大开。总之，科学的博物馆教育，不仅认定观众到博物馆来掌握知识，形成道德观念，进行审美活动都是一个主动探索领会的过程，而且在具体方法上讲究启发诱导，“因人施教”。因此，能够充分调动人们在博物馆参观学习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博物馆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性，能够满足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对博物馆教育的要求。

目前，科学的博物馆教育主要有列表现：1、有些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在内容上不仅充分体现博物馆本身的科研成果，而且还尽量反映或应用现代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同时，在展示方式上大胆创新，追求声、光、电相结合的多样化表现手段与最新科技成果应用相统一的风格。不仅使陈列展览具有可看性，满足观众的视觉感受需要，而且使陈列展览具有可操作性，满足观众动手操作的体验欲。例如美国就正在一些博物馆应用“多种智能理论”，它们开辟了能满足不同智能类型观众需要的多个“窗口”，给观众提供多方面的启发诱导和多种认识了解途径，使他们既能按自己感兴趣的方式获得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又可以多角度、全方位地

●博物馆研究●

了解博物馆为他们提供的同一展览或同一展品的所有已知信息。类似的做法，在我国一些日益现代化的博物馆中也可开始尝试。例如：

“广东省社会发展成就展览”，除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注意营造视觉中心外，在表现手段上也较为先进，除通过图片、文字、实物、模型展示外，主要采用电脑多媒体技术，输入近千张精选图片和大量文字数据，建立起《广东省社会发展资料库》。通过九台电脑的红外可触摸屏，观众既可自由选看自己感兴趣的图片资料，又可全面了解广东社会发展成就。2、不少博物馆在讲解接待服务中实践“因人施教”原则，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博物馆教育人才，其中最优秀的人物，不仅能操多种话语，而且能使博物馆教育象“随风潜入夜”的春雨，自然润入观众的心田。3、国内许多较著名的博物馆，都从本馆本地区实际出发，主动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将博物馆教育从馆内延伸到馆外，真正体现了我国博物馆面向社会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例如：送展下乡，送展到老、少、边、穷地区，送展到学校、部队、工厂企业等。或者组成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宣讲小分队，深入学校，与学校课程紧密配合，使学生们在得到学校正规的基础教育的同时，有幸得到博物馆为他们提供的系统的、分阶段的、科学的社会教育滋养，真正体现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全社会)对青少年成长的关心和爱护。这些做法，事实上都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少年学生朋友的热烈欢迎，因此，不仅可以说是博物馆科学教育的一种表现，而且可以说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归根起来，科学的博物馆教育之特点是，不仅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能够客观全面地看问题，而且充满科学精神，能用科学方法教育人。其具体表现是，千方百计，在博物馆内外全面彻底地实践“因人施教”的原则。这些特点规定，科学的博物馆教育必将具有光明的前途和广阔的市场，因为“因人施教”原则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已为中国自孔夫子以来的教育实践所证明。

三

通过上述分析对照，我们可以明白，不科学的博物馆教育，不仅不能使博物馆走出困境，反而会使博物馆的困境越陷越深，以至难于自拔。因为，不科学的博物馆教育，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缺乏科学精神，不能用科学方法诱使人们产生对博物馆教育的兴趣和需要。同样清楚的是，由于科学的博物馆不仅能满足现实政治需要和市场需要(社会需要)，而且是博物馆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只要我们今后能够做到不仅在博物馆内全方位地体现“因人施教”原则的科学精神，而且从国情实际出发，主动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使科学的博物馆教育真正面向社会，就一定能够使博物馆走出困境，迎来博物馆科学教育事业的春天。

(作者单位：广东省博物馆)

注释：

①、《羊城晚报》1996.8.24第十版，〈“文化人”创收〉。

②、《博物馆概论》[日]伊藤寿朗、森田恒之主编，吉林省博物馆学会译，P321。

③、《中国博物馆通讯》1996(6)P5，〈“多种智能理论”在博物馆学习中的应用〉。

“库房日志”在藏品管理中的作用

黄虹 张雪莲

文物藏品是国家宝贵的文化财产,是博物馆业务工作赖以开展的物质基础。对文物藏品进行科学的保护和管理,是我们每一位保管人员的天职,要妥善地做好藏品的保护管理工作,不但要求库房管理人员要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较高的业务素质,还必须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这是有秩序地、顺利地完成工作的保证。藏品管理制度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建立“库房日志”是日常管理的必要程序,也是管理规范化不可或缺的一环。下面,就“库房日志”在藏品管理中的作用,根据地方博物馆的特性和我们的工作体会,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地方博物馆的库房管理工作,由于各种因素的局限,从藏品数量、具体人员分工、专业技术力量,乃至保管设施等方面都难与国家级、省级和大市博物馆相提并论。在时间分配方面,管理人员除了日常的库房工作外,还要参加文物征集、地方史调查、陈列制作等文博业务,不能保证每天都有时间到库房进行常规工作,而且,藏品管理工作复杂繁琐,既要进行文物管理、鉴定、编目、建档、拍照和提用,还要做好文物防火、防盗、防虫等工作,而人的记忆又是有限的,当几项工作交叉进行时,就容易会“顾此失彼”,记了这项却又忘了那项,造成一时的混乱。因此,“库房日志”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每次进入库房工作,按要求应将当天工作情况或遗留问题,以及温度、湿度、进库人员名单等各项以日志的方式,一作详细记录。这样,便能及时反映库房工作情况,有助于藏品管理有序,少出差错和不出差错。具体而言,“库房日志”在藏品管理中的作用大体有如下几点。

1、掌握温湿度的变化,调控藏品保护环境。

文物库房的温湿度,直接影响着藏品的寿命,尤

其对于纺织品及纸质类和竹木类藏品来说更为重要。我馆文物库房地势较低,通风条件不够理想,湿度长期偏高。通过“库房日志”对温湿度的记录,我们总结出库内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从而采取相应措施。针对每年湿度偏高的季节,用抽湿机排湿,用硅胶在小范围内吸湿,尽量将湿度降至合乎藏品环境的要求,有效地减少藏品长虫、长霉的机会。而当夏季气温偏高时,则采用抽风机使库内空气流通降温,从一定程度上对藏品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2、利于总结工作,掌握藏品运作状态。

由于“库房日志”反映了库房工作的项目和完成情况,也就便于归纳、统计,总结每个月、每个季度及全年的工作情况。如建立档案多少、文物拍照多少、提供展览多少、修复装裱多少、征集进库多少、提取研究多少等,通过“库房日志”便可一览无遗,甚至是书画柜何时投放防虫药,那一柜书画何时已吹晾等,都可通过“库房日志”的记录,让管理人员做到心中有数。既是对阶段性工作成果的反映,也为日后工作的研究和改进提供了借鉴的依据。

3、有利于安全工作措施的落实

文物库房是收藏国家科学文化遗产的地方,要确保其安全而不能有半点马虎。因此,防火、防盗工作至关重要。每天,我们都定期将馆内分管电器和消防工作的有关人员请到库房进行电路和灭火器材检查。通过“库房日志”的记录,可以反映出何时经检查、维修和有无其它异常情况,以及具体的施工人员名单,将责任落实到个人,还从时间上提示检查时间,一旦发生事故,核查起来也是有据可依。

4、起到“备忘”的作用。

由于地方馆的特性,库房管理人员较少,而兼任

市场经济与讲解员职业道德建设

张建雄

本文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讲解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特点、内容以及如何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作一个粗浅的探讨,以期对讲解队伍的建设有稍许帮助。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讲解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生急剧而深刻变革的时代,市场经济广泛地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引起人们价值道德观念的强烈震荡,许多固有的道德规范丧失了往昔的灵验,传统的道德标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新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体统尚未形成确立,造成部分人理想信念的迷惘失落,某些领域的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受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滋生蔓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仍然有许多讲解员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不过,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在讲解队伍中的影响也不少,具体表现在:缺乏对职业的荣誉感、责任心,工作不求进取、得过且过、敷衍了事、互相推诿,以闲聊、嗑瓜子来打发时光;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斤斤计较,争名逐利,纪律松懈,有的甚至弄虚作假等等。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

不加以纠正,将严重危害博物馆讲解队伍建设和博物馆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因此,加强讲解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在当前显得十分必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博物馆是精神文明的载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橱窗。而讲解员直接担负起博物馆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任,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讲解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讲解员职业道德的好坏,不仅直接反映讲解队伍的职业素质、道德水平和精神状态,而且直接关系到博物馆乃至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程度。因此,每个博物馆都必须重视讲解员的职业道德,把加强讲解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作为本单位精神文明建设的切入点、突破口。通过职业道德建设,增强讲解员职业道德意识,用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约束讲解员的行为,纠正不正之风,促进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博物馆的开展。

其次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讲解员是博物馆联系观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博物馆,

的其它工作又较多,因此,进库的时间有时就会相隔比较长。记得过去有一次,一批进库文物的编目,拍照工作只进行了一半,因为另一项工作需要突击完成而中途搁置,待此项工作完成后,前阶段工作做到那里却忘了。又如:七号、九号箱的绘画未装裱的需要裱,已装裱但有折裂蛀洞或缺天地杆的需修复重裱,由于修复后体积增大,箱子无法容纳原来的数量,只好将部分绘画暂存另一箱,待从阳江订造新箱回来后,因为时间太长,一时已忘记这批画存放在哪里,不但浪费时间去查找,而且造成工作被动,险出差错。自从建立“库房日志”后,上述情况便没有再发生,一旦忘记,只要翻查“库房日志”,便可一目了然。

“库房日志”虽然并非一件复杂的工作,或者可以讲,从整个管理运作过程中,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环节,然而,严密的管理制度,紧凑的管理工作程序,是藏品管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近几年的工作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库房日志”工作不容忽视,只有踏踏实实并持之以恒地做好这项工作,努力完成藏品库房日常管理的每个程序,才能真正做到“保管妥善,编目详明,查检方便”,使藏品管理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轨道,从而更好地发挥藏品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作用。

(作者单位:佛山市博物馆)

与观众直接打交道的是处于业务活动第一线的讲解员。讲解员的业务水平、精神面貌都会给每个参观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讲解员不会挑剔观众、应付观众,只会积极主动、热情周到地为观众服务,赢得观众的赞誉。讲解员的优质服务,不仅能充分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的职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能树立博物馆的社会形象,吸引更多的观众,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许多博物馆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将讲解员作为博物馆的“门面”。事实上,讲解员的优质服务本身就是相当好的宣传广告,受到优质服务的观众也会将这一信息传递给社会,成为博物馆流动的广告宣传者。大凡观众人数多的博物馆都比较重视讲解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等。

再次是讲解员自身素质提高的需要。以前,讲解员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留声机”,只能照本宣科,背诵讲解词。这一方面是社会的传统偏见,另一方面又是讲解员自身素质不高所致。现在,虽有改观,但不尽人意。讲解员要改变形象,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自尊、自重、自强、自励”,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用创造性的劳动感染观众,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而自身素质的全面提高,必须以强化职业道德为有效手段,通过职业道德建设,提高讲解员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在职业道德建设中,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观众是作为博物馆精神产品的消费者来参观的,文化需求的层次越来越高。没有一支高素质的讲解队伍,很难满足其需求。而高素质讲解队伍的建立,又必须以加强讲解员职业道德建设,培养讲解员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为可靠途径。

二、讲解员职业道德的特点

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形成并必须遵守的带有职业特点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一般道德原则在各自职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讲解员的职业道德是在群众教育工作的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素质、道德品质的总和,是调节讲解员

与观众、讲解员与博物馆其它工作人员、讲解员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考察社会转型时期的讲解员职业道德特点,主要有四:

——阶级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受社会存在决定的。“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影响的社会里,道德(讲解员的职业道德也不例外)就不能不受到阶级关系和反映阶级利益的经济关系的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讲解员的职业道德也就不能不从一定的侧面反映这个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而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讲解员职业道德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工作目标是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服务对象是来自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即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同党的文博事业融为一体,以集体利益和党的文博事业为重。

——时代性。道德是历史的产物,每个时代都有其各自的道德。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关系的性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社会的具体要求不同,因而每个时期的道德不得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讲解员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有了很大的增强,其价值观念和职业态度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敬业爱岗的内涵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纯被动地“服从”逐渐转变为开拓创新;道德观念由传统的重义轻利渐趋向义利统一;“等客上门”的服务方式逐渐转化为主动积极的优质服务;填鸭式的单一讲解逐渐被丰富多彩的活动载体所替代。

——自主性。职业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来自人们内心的要求。职业道德对从业人员的行为约束,不依靠行政手段,也不依靠经济制裁,而是通过外在的社会舆论督促和内在的良心来实现。职业道德不同于法律条例,也有别于规章制度。法律条例和规章制度带有强制性,人们只能被动地遵守,而职业道德则以自主性为基础,由人们自觉地执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解员的职业道德的自主性表现得特别突出。由于讲解员在讲解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使得她(他)有条件凭个人的好恶来选择听讲观众,根据心情和爱好来控制

讲解内容的深浅,掌握讲解时间的长短。目前,许多博物馆大都只注重讲解员的量化管理,如规定讲解场次,而对讲解员质量过问较少,没有形成一个评判讲解效果的统一标准,以质定奖的机制还没有建立,再加上讲解员创造的不是“物”,而是精神产品,似乎有点“虚”,不象陈列部的成果以实物形式来显示。这就要求加强讲解员职业道德的自律意识,发挥职业道德自我监督、自我控制的功能。

——示范性。任何一种职业都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因而,伴随各种分工的职业化而产生的职业道德均具有示范性。讲解员的职业道德也不例外。讲解员每天都与观众直接接触,既为观众服务,又向观众宣传教育。可以说,讲解工作是博物馆的窗口行业。讲解员职业行为,对观众的影响有如滴滴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对博物馆同仁也有一定程度感染力,起着启发、激励、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三、讲解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内容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许多不同的职业相继出现。而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不尽相同,因此,不同的行业有各自不同的职业道德准则和规范。讲解员从事的是宣传教育工作,也有与之相应的职业道德要求。市场经济的实施和推进,又给讲解员的职业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综合起来,讲解员职业道德建设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敬业。

文物是国家的瑰宝,是人类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遗存,是反映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历史见证。而讲解员就是要发挥文物的宣传教育作用,充当观众与文物之间的桥梁,使观众通过文物,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可以说讲解员是博物馆的教师,她(他)对观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其工作高尚而有意义,责任十分重大。因此,从讲解员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来说,讲解员应该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荣誉感和尊严感,增强

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自觉为社会服务,为观众服务。

在社会中,每个人既是服务主体,又是服务客体。只有全社会成员对自己正当的职业有执著的敬业精神,才能创造出和谐、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才能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否则,就会造成社会“服务链”的断裂,影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循环服务。讲解员是社会的一分子,讲解工作也是社会分工所需,是社会的一个服务行业。因此,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即为人民服务的角度来看,讲解员选择讲解工作这份职业,就是对社会的庄严承诺,就要对社会尽一份责任。讲解员只有对自己的职业有崇敬感、自豪感,才能产生巨大的内在动力,才能把这种情感转化为物质力量,转化为自觉行为,才能把本职工作搞好。

——乐业。

乐业就是指从业人员热爱自己的职业,乐意在本职岗位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讲解员的乐业具体表现在:

(1)献身社会教育的事业心。事业心是一种坚定的职业信念,是讲解员进取向上的动力之源。讲解员的事业心就是坚信自己从事的宣教工作是崇高的事业,应该全身心地投入,自觉地把传道授业解惑当作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和神圣的天职。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种种对讲解工作的不理解,认为只是简单的重复的机械劳动;有无讲解员,对博物馆影响不大。要消除不理解,讲解员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提高服务水准,提高讲解工作的社会效益。而讲解员的所有努力,又都建立在热爱讲解工作,对讲解工作有执著追求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讲解工作是一项创造性的精神生产,它融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讲解员只有树立起献身社会教育的事业心,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才能得到领导的重视、观众的称赞,才能成为博物馆事业的栋梁之材。

(2)满腔热忱的观众情。观众是讲解员施讲的对象。没有观众,讲解员如同教师没有学生,无法开展工作,无法完成育人任务。因此,讲解员必须树立起一切为观众着想、一切为观众服务的意识,努力争取观众,为观众提供优质

服务,让观众乘心而来,满意而去,把他全心全意为观众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讲解员对待观众的态度应该是热情礼貌、服务周到,对来馆参观的观众,不论层次高低、年龄大小,都应平等相待,热情招呼、导引和讲解;对观众的咨询,不论繁琐,都应有问必答、热心主动、认真负责。严禁对观众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生硬粗鲁。

(3)秉公遵纪、爱护文物。文物是历史的注脚、文化的精粹,内含丰富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具有书本知识不能替代的形象性、直观性,对观众有强烈的吸引力,是讲解员进行宣传教育的好教材。讲解员应该珍惜文物、爱护文物,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文物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决不收藏、买卖文物,并同破坏、盗窃文物的行业作坚决斗争。

——勤业。

敬业乐业是讲解员搞好本职工作的首要条件,但仅凭激情,仍然不够,还需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工作。勤业,要求讲解员做到:

(1)勤奋好学、博中有专。讲解员向观众传播知识和信息的过程,就是以陈列品为依据,通过语言艺术、讲解技能来提炼、加工、再创造的过程。这就要求讲解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讲解员只能充当“传音筒”,其宣传教育的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每个讲解员必须借助书籍,通过观众、专家、同仁,掌握有关博物馆学、社会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以及文物等方面的知识,了解学术动态和最新学术成果,不断提高知识层次,拓展知识面,更新知识内容,做到博中有专、博专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讲解过程中应付自如、灵活机动。

(2)钻研业务、因人施讲。讲解员直接服务的对象是观众,而博物馆的观众千变万化,既有团体观众,又有零散观众;既有青少年,也有中老年人;既有工人、农民,也有学生、干部,还有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和外国客人。观众参观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或旅游观光、或消遣娱乐、或获取知识、接受教育。为满足观众的需求,提高讲解效果,讲解员应该了解观众的兴趣爱好、文化层次、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和心理

特征,根据具体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施讲,做到有的放矢,随机应变,讲解能长能短、能深能浅,力戒不看对象,不问情况,讲解词和讲解方法千篇一律。

(3)实事求是、治学严谨。博物馆教育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其特色是真实可靠,这就需要博物馆教育的实施者——讲解员具有实事求是、治学严谨的科学态度。无论是讲解词的编写,还是陈列内容的介绍,抑或解答观众的提问,都必须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撰写讲解词,力求文字准确、观点鲜明;讲解陈列内容,力戒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回答观众提问,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勿不懂装懂。

(4)取长补短、团结协作。讲解员之间由于学历、资历、兴趣爱好、知识结构不尽相同,其思想水平、业务水平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讲解员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不耻相师,谦虚上进,共同提高,切忌以己之所长比人之所短,拔高自己,压低别人,更不能孤芳自赏,目中无人。只有这样,才能在讲解队伍中形成思想上互相关心,业务上互相学习,工作中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照顾,团结友爱和谐的良好风气,才能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精业。

如果说勤业是实现职业最基本价值的保证,那么精业就是实现职业最高效益的价值追求。讲解员要顺应市场经济潮流,追求自己的职业最高效益,就必须精业,不断地开拓、进取、创新。

(1)拓展宣教覆盖面。在搞好阵地讲解的同时,讲解员要走出馆门,深入社会,到工厂、农村、学校、军营,变“等客上门”为组织观众到馆参观,变观众来馆受教育为送展览上门,扩大社会教育面,提高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辐射力。

(2)探索宣教新方式。博物馆教育是通过为观众自我学习提供服务而实现的,观众是学习认识的主体。因此,讲解员应避免勉以高高在上的施教者的姿态出现,改变单一讲解方式,以趣味性、娱乐性和参与性强的活动为载体,寓教于乐。如举办报告会、文物讲座,组织博物

馆之友和夏冬令营,开展征文、摄影、历史、文物知识竞赛,以歌、舞、小品等文艺形式反映陈列内容等。

(3)开展科研,成为宣教专家。探讨宣教工作的思路和方法,研究陈列展品和观众是搞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基础。只有探索博物馆教育的客观规律,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才能为实践提供指导,才能把宣教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丁关根去年在河北、陕西博物馆视察时,就曾提出:“讲解人员也要搞研究,成为专业人才,不要受年龄限制,应讲求高知识水平、高文化层次。”

四、如何加强讲解员职业道德建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来提高讲解员的职业道德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应更多地遵循教育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推进。

1、立足思想教育,正面引导。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博物馆领导应抓好讲解员的理论学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人、武装人,用同行业和社会上的先进典型事迹引导人,使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组织讲解员学习《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使其认识到宣教工作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的作用,从而产生一种光荣感、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引导讲解员认识职业道德建设的意义,使其意识到敬业爱岗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份。当然,对讲解员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要尽量淡化施教意识,通过各种活动如举办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民主生活会、学习讨论会、文体竞赛和现场参观学习等,来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做到三个结合:思想教育与讲解员的业务工作相结合,使之融入岗位业务培训中;职业道德教育与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相结合,发挥整体效应;先进性的要求与广泛性的要求相结合,既不能用先进性取代广泛性,也不能用广泛性淹没先进性。同时,大力弘扬正气,发挥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讲解员的内心信念和评价作用,以唤起职业良心,启发讲解员的自觉性。

2、建立竞争激励机制。

在市场经济下,加强讲解员的职业道德建设,要把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引入职业道德建设中去,建立起能自发调节职业道德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将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引入职业道德管理中,就是要对严守职业道德的讲解员信任、奖励和重用,对职业道德意识差的讲解员要批评、教育;严重者,则取消从事宣教工作的资格,以此鞭策每一个讲解员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一丝不苟地遵守本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消除不论职业道德如何,一样担任讲解员和享有各种实惠等不合理现象。把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引入讲解员的待遇中,就要求做到谁付出的越多、贡献越大,谁的收获就越多越大,使讲解员在体会劳动艰辛的同时,充分享受劳动带来的利益和荣誉、充实和甜蜜,以此来激发讲解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3、制订约束监督制度。

加强讲解员的职业道德,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在当前所倡导的职业道德原则还没有完全成为讲解员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时,仅靠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制订《讲解员守则》、《讲解员职业道德准则》,把讲解员的职业道德要求体现在具体行为规范之中,使之言行有遵循,管理有依据,考核有标准。约束监督制度的建立,有助于讲解员按照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去行动,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增强职业道德的自觉性,达到“慎独”境界。

4、发挥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

群工部的领导干部是宣教工作的火车头。如果领导干部能躬行践履,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就会起榜样和表率作用。如果大事小事都吩咐其它人干,自己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指手画脚,就会引起其它讲解员的反感,产生抵触情绪,这样既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开展工作。实际上,作为最基层的领导干部,不能只是宏观管理,而应该身体力行,要求其它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其它人遵守的,自己必须首先遵守,不能搞特殊,要接受群众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它讲解员“见贤思齐”,才能造就一个学先进、赶先进的局面,才能使自觉遵守职业道德的行为蔚然成风。

(作者单位:鸦片战争博物馆)

关山月美术馆思考

卢禹光

关山月美术馆是南中国开了健在名人博物馆的先例,意义不言而喻,深圳市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可见其中。关老对广州美术馆长期给予扶掖、支持。出于对关老的感情,我非常关心关山月美术馆的建设和发展。

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关山月美术馆如何生存和发展?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首先要建立董事会。据国外发达国家博物馆做法,除馆领导班子外,都另外设立董事会。关山月美术馆董事会应由馆领导、深圳市政府特别是计划、财政部门官员以及对关老美术馆的捐助者(理事由捐助资金多少而定,美国洛城美术馆180万美元才能当董事会理事)、美术界的权威,乃至热心的党政人物组成。董事会的建立是关山月美术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二,设立关山月美术馆基金。馆建起来了,没有经济支柱将无法生存下去。政府目前只能作基本投入,维持正常的人头费开支,那末,基金的建立是必需的。关山月美术馆除正常工作外,主要精力应放在基金的筹措、赞助上。应争取政府对基金投入和支持,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多渠道筹集资金,并将基金管理起来。

第三,建立公共关系部及推广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关系,越来越显得重要。关山月美术馆的对外交流、形象宣传、广告、出版及各方赞助、支持等都归纳于这两个部门,美术馆生存发展要依靠这两个部门的卓有成效工作,希望关山月美术馆能重视及注意到。

第四,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国外发达国家博物馆的经验是馆长只管抓“钱”,即抓馆的生存,其主要职能是争取政府拨款,接见募捐者,开拓基金的发展;副馆长一般称助理馆长,只负责各部门的经济开支和日常运作;教育、收藏、陈列、研究、出版、交流、行政、管理等等权力下放到中层,各部门主任便可决定收藏什么、陈列什么、研究什么。这种博物馆管理体制行之有效,我认为是有其规律和道理的。市场经济的规律迫使博

物馆把生存摆在首位,而博物馆首脑的第一任务也在于为了生存、发展。生存与发展都要“钱”。

第五,更新观念,正确处理博物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各陈列、研究、推广、收藏、出版等部门都应在博物馆工作中始终以教育为第一位,同时,考虑经济效益,作全面认识及实践。各部门既要独立发展,又要相互协作,共同推进事业的发展。美术馆会员制的建立对美术馆的发展有极大帮助,但要有资金支持,各种讲座、参观、写生、制作,甚至研讨、餐会、旅游等都需要经费开支。除会员费外,大都需自筹。推广部就要筹集经费来支持这项活动。因此,需要有自行筹集、独立收支、谋求发展的权力,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外国发达国家美术馆把收藏、展览、陈列、研究、推广等权力放于中层,也是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需要。

以上是根据世界博物馆发展的情况而对关山月美术馆所作的一些思考。对美术馆,过去人们大多谈的是收藏如何重要,陈列如何前卫,研究如何深入,交流如何广阔等等,而首要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与体制问题却少有人关注。我的几点意见,仅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博物馆同仁的兴趣与思考。关山月馆开馆在即,它无法偏离我国正走向市场经济的轨道,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将使人们处于主动。

一个馆与一个人的生存一样,靠阳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靠营养(政府投入、自身筹措),靠运动(各项工作良性循环),才可强壮。领导班子如人的主脑,什么意识主导这个馆的营运,将影响着它成功与失败,发展与迂回。

关山月美术馆立足于开放改革的试点深圳,市场经济接触最早,思想观念较为超前,城市发展极其快速,相信它的建立与发展必定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经验与范例,预祝关山月美术馆日后辉煌。

(作者单位:广州市美术馆)

略论“麻姑壶”的定名问题

黄伟中

广东省潮州市博物馆有一件藏品，藏品登记簿定名为“宋百窑村青釉麻姑进酒像”。1981年，由广东省博物馆编写的《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将其改名为“北宋潮州笔架山窑影青瓷佛像”。1985年，广东省博和香港冯平山博物馆联合出版的《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一书中又给它定名为“北宋潮州笔架山窑青白釉菩萨像”。这样，一件藏品三个名，其中两次改名均未阐述理由。

“潮州笔架山窑”俗称“百窑村”。经科学发掘，确定为北宋窑址。“佛像”和“菩萨像”的问题较好理解，因为狭义的佛像是指佛陀的像，广义的佛像是指佛教的像，除了佛陀之外，还包括菩萨和各种护法天神、明王、罗汉以及佛弟子等等的像，因此，两者并无矛盾。但佛像（菩萨像）与麻姑像不同，麻姑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仙，是道教人物，跟佛（菩萨）不是一家人。那么，青白釉佛像，影青菩萨像与青釉麻姑进酒像三个定名孰正孰误呢？

就此问题，我略抒管见，以就教于识者。

我认为，这件藏品既不是佛像，菩萨像，也不是麻姑像，而是一把以麻姑进酒像为造形的酒壶，只不过是壶的口、盖、流、把残缺罢了，应定名为“北宋潮州笔架山窑残青白釉麻姑进酒壶”。

此壶残高25厘米。以模印成形为主，辅以雕塑装饰。以麻姑进酒像为壶体，整器比例准确。麻姑仪态端庄，戴莲瓣形冠，头顶挖一圆孔作壶口，壶口残，失盖。脸丰满微方，前额间和双耳边各贴一朵梅花为饰。头束一发带，发带上缀梅花数朵，双耳挂圆条状耳饰。颈饰瓔珞一串。躯体丰腴饱满，穿方领内衣，外着长衣，长衣浅刻错落有致的梅花朵为纹饰，刀法简练流畅。衣服褶皱用深阴刻表现，走势自然，刀

法有力，极富北宋人物绘画衣纹描划的韵味。麻姑蹲坐姿，右膝着地，臀部坐在右脚跟上，左膝蹲着，脚穿翘尖鞋，长衣及地，履尖半露。右手笼在袖中，托一莲瓣形温碗于胸前，长袖环垂。左手按住温碗，外壁刻莲瓣纹和棱格纹的温碗中置配套的注子。注子溜肩，肩上的侧安流，流似莲瓣为饰，已残，流通注腹。流对面一侧安把，把残，注口也残，只剩残颈一段，颈与注腹没挖通，注口当为假口。麻姑身后自领下贴一衣带自然下垂，至腰际系结，领下及腰际遗留近长方形的断口各一，应是原安扁条状弧形壶把的残痕。壶平底无釉，胎色灰白，胎质坚致细密。麻姑眉、眼、唇及头发露胎，呈火石红色，余通体施釉，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有很强的玉质感，开冰裂纹片。

值得注意的是，该藏品原来有壶口，壶流，壶把，显然是一把壶而不是一尊像。我曾做过实验，将清水从麻姑头顶圆孔倒入，再把麻姑前倾，水即从麻姑手中的注子的注流中流出。倘若将残口、流、把修复，壶的功能将会体现得十分完美。是壶而不是像已无疑。该壶口、流、把几处残口，经过人工砥磨，几近平整光滑，若不注意，容易疏忽，显然是曾有人蓄意将这把残缺的麻姑壶修改为麻姑像，也就是把实用器修改为陈设品。此人是缺乏文物知识的群众或是投机取巧的古董商。

前面已指出麻姑手捧温碗注子。温碗注子是流行于宋代的成套酒具，瓷窑普遍烧制，使用时注子盛酒，置温碗内，温碗中倒入热水，即可温酒。而麻姑的形象是总离不开酒，因为民间传说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麻姑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为王母祝寿，故民俗祝女寿者多赠送麻姑像。不论是绘画、木雕、泥塑、玉雕、刺绣还是瓷制的麻姑像，都不会没有酒，一

从出土文物谈广东唐宋时期

青釉瓷的演变

任卫和

我国是瓷器生产的发源地，瓷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份。瓷业生产发展到唐宋时期已达高峰，许多著名的窑址遍布南北各地。其中驰誉古今，闻名中外的青瓷窑口就有越窑、婺州窑、岳州窑和汝窑、钧窑、耀州窑、龙泉窑等。它们所烧造的青瓷产品倍受国内外人士的珍视。谈到青瓷窑口，应首推浙江的越窑，它是唐代南方青瓷窑的代表。此窑生产的

青瓷器，其佳品被称之为“秘色瓷”。越窑烧造青瓷的经验和技术，对当时青瓷生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唐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中唐时的茶圣陆羽也曾在《茶经》中写道：“越窑类玉”，“越窑类冰”。这些赞美之词，都明显给了越窑青瓷极高的评价。

壶、一瓶、或一缸，提着，捧着，或驾舟载着，称“麻姑进酒”或称“麻姑献寿”。可以想像，祝女寿者送上这把壶，女寿主喝着用此壶斟出的象征“麻姑为王母祝寿特地酿的灵芝寿酒”，飘飘然自拟西王母，心里别提有多美！北宋潮州笔架山窑烧制出这构思巧妙，造形别致，寓意深长的麻姑进酒壶，窑工们的聪明才智，实堪称一流，其艺术与实用完美结合的创作技巧，令人赞叹不已。

酒具麻姑可用，佛、菩萨却不能用，因为佛教的戒律不允许。佛教的“五戒”、“十戒”中，均戒酒。佛教戒酒，佛、菩萨不可能手拿酒具。温碗、注子是酒具，手拿着温碗、注子的不可能是佛、菩萨。道理也就这样明摆着。

目前已发现的北宋笔架山窑麻姑进酒壶，并不只以上介绍的这一个。潮州市博物馆1975年采集于县第一招待所工地，帐册上原称“白瓷麻姑进酒像”，广东省博物馆《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图版贰拾陆改称“白

釉瓷抱壶女人像”的那一件，依我看也是一把麻姑进酒壶，只是釉色、规格、档次不同而已，也应予正名。还有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图版贰拾中的“黄釉奏乐女像”、“黄釉抱乐器人像残件”、《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一书中图十一之2“西洋人像头残件”、日本福冈县博多遗址出土、福冈宗像部收藏的人像残件，虽未见实物，但从照片上对比分析，均也有可能是北宋潮州笔架山窑残麻姑进酒像或残麻姑进酒壶，都可能存在重新定名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以人像为壶，不独潮州窑有。已知1963年北京顺义县辽代净光塔塔基出土白釉童子颂经壶；1976年辽宁乌兰套海半拉石槽乡出土辽代白釉人身鱼龙壶。北宋与辽同期，南北同样烧制人像壶当是时尚、市场需要和南北窑艺交流的产物。

（作者单位：潮州博物馆）

广东的瓷业生产,发展至唐代,境内大小窑址已是星罗棋布,各窑址盛行烧造青瓷。但此时烧造的青瓷,绝大部份质量较为粗糙,不很注重器物的花纹装饰,只追求能烧造出釉色如玉般的青釉瓷产品。而宋代的广东,瓷业生产则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以烧制青釉瓷为主要产品外,还烧造出“影青瓷”、黑釉瓷等釉色丰富、纹饰精美、造型多样的产品。这一时期的青瓷,其生产工艺水平远远超过了唐代。具体的发展演变过程表现在:窑炉整体结构的技术改进;科学地掌握窑炉火候与还原氧气的控制;窑具的合理使用及青瓷产品器形、纹饰的设计和釉料、胎土的精心提炼等方面。现就这些具体问题,作点滴粗浅的探讨。

瓷器业的发展演变,直接受到窑炉构造的影响,因此,窑炉结构的改造极其重要。为此,古代制瓷工匠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使其能够缩短烧窑时间,科学地控制烧窑温度,加快瓷器产品在窑内的瓷化程度,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产瓷效率。以往的发掘资料表明,唐代广东的馒头窑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时,馒头窑的整体结构有了很大的改进。唐以前的馒头窑,其内部结构是火堂小,平底式,窑室为前窄后宽,窑内抽力小,因此造成了窑炉尾部瓷器产品的生烧现象。唐代的馒头窑,内部结构则大不相同,它火堂较大,窑室为前宽后窄,底部呈斜坡式,坡度一般在 33 至 35 度左右,火堂前端开设小火门。窑炉内部结构的这些改进,增强了窑内抽力,使窑室内的前后温差缩小,消除了生烧现象,保证了产品的质量。这类馒头窑除梅县水车窑最典型外,在潮州、佛山、增城、南海、三水、新会、郁南、廉江、遂溪及封开等均有发现。但从上述窑址出土的青瓷器观察,其火候未能达到 1300℃,最高火候只有 1100℃ 左右,实际上这种青瓷还只能称之为釉陶。历史发展到宋代,广东的社会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因而对瓷器的需求量和外销量与日俱增。为了适应这一需要,窑工们开始对窑炉实行全面的改造,建造出了新型的窑炉——龙

窑。曾广亿先生在《关于宋代窑炉造型》一文中,曾对龙窑的整体构造及其优越的功能作了详尽的论述。文中写道:“龙窑系长条形斜坡式,依山势而建,一般都系建窑时先在山坡上挖一条长条形斜坡深沟,窑基和窑身用长方砖砌筑,然后两侧填泥加固。全窑长度一般在 30 米上下,也有 60 多米,个别还有 100 米上下的,其规模之大,在古代的窑炉结构上是极为罕见的。其结构以潮州笔架山已发掘的九座龙窑为例:窑炉总倾斜度为 14 至 18 度,从残窑基观察,窑床一般分为 3 至 15 段左右,分火门、火堂、窑床、窑门、后壁、烟道等部份。窑门设在窑室侧面,系装坯和出窑时使用的,烧窑时则用砖临时封闭,极为科学。从窑的结构及窑内出土器物观察,龙窑的优点是烧窑时升温较快,降温也较快,能烧还原气氛,适于焙烧坯胎较厚的大件器物,也适于焙烧坯胎薄的小件器物,也适于焙烧粘度小的石灰釉瓷器。一般来说,龙窑烧的瓷器釉色晶莹,透明度高,抗压力强。”曾先生还特别强调地指出:“宋代广东普遍出现了烧窑时观察窑温的‘测温标’,这对烧瓷掌握窑温和瓷化程度与控制还原气氛有很大帮助。”当时窑烧成瓷的温度,一般约在 1250℃ 至 1300℃ 之间。上述的文字资料表明,宋代的广东龙窑不仅规模庞大,而且结构的设计也非常科学。从当时普遍使用“测温标”观察窑温的事实来看,广东的制瓷工匠们已能够在 1250℃ 至 1300℃ 左右的窑温下,熟练地掌握窑内还原气氛的变化规律,并对窑炉内部的温度实行科学的调控,从而使器物在窑内最终完全瓷化。由于此时期创造并掌握了先进的制瓷技术,绝大多数青釉瓷产品,釉色润泽,品质上乘。从龙窑中出土的青釉瓷产品可见一斑。

窑炉的不断改革,无疑给青瓷生产的发展演变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而窑具的合理应用,则为青瓷产品的质量给予保证。广东从唐代起,就开始在窑炉中采用一种圆筒形平底匣钵来装烧青瓷器,这种匣钵见于梅县水车窑和潮州窑内可以说,唐代利用匣钵这种窑具装烧技术,还只是处在初创阶段。至于梅县水车窑和潮州窑出土的瓷器产品,完整的青瓷器,其

器型烧造规整,线条流畅优美,器表洁净光亮。从这些采用匣钵装烧的青瓷成品质量上看,广东的个别窑炉,当时在克服制瓷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烟尘污染,器物变形和相互粘结等技术难题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宋代更合理地使用匣钵装烧青瓷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代的广东,采用匣钵装烧青瓷的窑炉数量激增,匣钵窑具的设计更为科学合理。据已报道的发掘资料表明,北宋潮州、惠州、广州、阳江、韶关、南雄、封开等处的窑址,都出土了一种专门装烧碗、盘、碟、盏类的圆身釜底匣钵,装烧青瓷种类明显比唐代增多,产量显著提高。同时还发现了带盖的匣钵。这种带盖匣钵的使用,能更有效地保护窑内青瓷产品的精美造型,使釉面更加光亮纯净。窑具的不断更新,充分地体现出当时广东制瓷工匠的精湛技艺和聪明才智。

广东唐宋时期窑炉,窑具技术的不断改革和创新,在大大促进了青釉瓷生产的同时,提高了产品质量。当时青釉瓷产品无论是在器形方面,还是在花纹装饰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考古资料表明,各地窑址出土的唐代广东青釉瓷产品的种类已相当丰富。以梅县水车窑出土的晚唐实物为例,在此窑及墓葬发掘整理出来的青瓷产品就有罐、壶、碗、碟、盆、炉、砚等,这些产品的造型简朴大方,一般素面无纹饰,其风格显然是继承了唐代早、中期青瓷器物纯朴雅致的特色。晚唐时期的梅县水车窑产品,在器形上比之唐代早、中期已有所发展和变化,如碗、碟作葵瓣口,外壁都压有竖凹线,内壁则起凸棱;炉器的足作兽蹄状;青瓷砚盘侈口,砚心凸起,几乎与盘沿平行,盘沿与砚心间有一周贮水凹槽,盘座为大圈足,足外撇,镂十二个圆孔等,都是唐代早、中期窑址出土器物中未曾见过的。这类新器形的设计,反映了广东唐代晚期瓷器业已经从单纯的实用观点朝着美观实用的方向发展。唐代广东的青瓷器饼形足较为多见,宋代则以圈足为最。而晚唐水车窑的罐、壶为饼形足或矮圈足;碗、碟为玉璧足或矮圈足。器物底部的变化,也反映了我国瓷器在唐代晚期由饼形足发展到玉璧足,

再发展到圈足,以至北宋以后瓷器采用圈足这一发展过程。晚唐时,广东梅县水车窑的碗、碟一般为敞口或瓣口,圆唇。罐壶的器身修长,颈短,直口圆唇、收腹。其中壶的流特别短。广东窑址出土的宋代碗、碟,除有敞口、瓣口外,还有敛口、侈口、侈口折边、凸唇、卷唇、折唇等。其中瓣口碗已由唐代仅有的四瓣口发展为六、八、九、十瓣口。至于罐、壶类产品,器身多数较矮小,但颈部变长,鼓腹多见,其中壶的流变得很长而且有弧度。同时罐壶的口沿有直口、盘口和喇叭之分。瓜棱壶是宋代广东常见的器物,潮州笔架山窑址内有大批出土,广州西村窑和惠州窑也有烧制。炉器和兽蹄足此时已极少见到,而被方形或半圆形足所取代。当时还大量烧制青瓷莲花炉,这种炉器潮州笔架山窑出土较多。显然,唐宋青瓷器器形的演变,不但在造型设计方面具有艺术感染力,而且在广东窑口出土的唐宋青瓷产品中,其纹饰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则更加引人注目。虽然广东唐代的青瓷产品绝大部份为素面,只追求釉色“如冰似玉”的效果,不重纹饰,但从晚唐梅县水车窑出土的产品中,也能看到一些压有竖凹线的葵瓣碗、碟,瓜棱壶及兽蹄炉、镂孔砚等简单的装饰艺术。其中葵瓣碗、瓜棱壶和兽蹄足炉的装饰风格与浙江越窑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到了宋代,青瓷产品的装饰艺术突破了唐代青瓷生产工艺的传统规范,出现了刻划、印花、点彩等多种多样的装饰技法,从而将广东的青瓷生产工艺水平提升到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统一的最高境界。现在再选择部份能够反映青瓷器纹饰发展变化特点的窑品,如广州西村窑、惠州窑、廉江窑和潮州窑来作简要的阐释。

广州西村窑、惠州窑和廉江窑出土的器物都以刻划、印花为主要装饰方法,其中广州西村窑与廉江窑,还采用点彩的表现手法对青瓷器物进行装饰。广州西村窑的印花青瓷碗、碟类器物,一般都在碗内或碟内印有二至三朵缠枝菊花,外壁则刻划弧线纹或斜行菊瓣纹。其纹饰图案布局匀称,生动活泼。而青瓷盆,则只在内底心处印一至三朵折枝菊花,花瓣层叠有序,极富立体感。刻划纹饰应用广泛,一般碗、

●文物鉴赏●

盘、碟、瓶、壶、盏、盆、炉等器物上都采用这种装饰艺术。花纹种类繁多,既有菊瓣、莲花、折枝牡丹、缠枝牡丹,也有蕉叶、卷草篔纹组合纹等。在这些器物中,除碗内外壁都刻划纹饰外,其他器物要么在器内刻划纹饰;要么在器外刻划纹饰。在这类刻划纹饰中,以牡丹花卉最为精致。如在青釉盘内底刻划折枝牡丹一朵,内壁刻划缠枝牡丹六朵,枝叶纷披,布局均匀。碗、碟类刻划的牡丹,花型的正反仰覆,讲求对称美。广州西村窑和廉江窑的点彩装饰手法基本相同。一般多用于青釉瓷器物,如碗、碟、杯、壶、罐、孟、盘等的边沿或器物的肩部,极具观赏价值。

惠州窑出土的印花瓷器颇为多见,刻划纹饰次之。那些碗、碟等青釉瓷器物,特别是青釉菊花碗,碗内中心印有菊花一朵,内壁则印有六朵缠枝菊花,外壁不刻划纹饰。此种装饰法与广州西村窑略有不同,却与耀州窑纹饰装饰方法相似。刻划纹饰,以青釉牡丹花卉碗的装饰较复杂,其碗内心刻双线水波纹,内壁刻缠枝牡丹四朵相互对称,并在空隙处刻枝叶衬起,外壁刻菊瓣一周,纹饰内外呼应,恰到好处。

廉江窑出土的青瓷器物以罐、瓶、盆、壶较多,这类器物的外壁皆印有雷纹,表示吉祥的“卍”字纹也有发现。刻划纹饰以青釉碗、碟居多,一般是在青瓷碗、碟内刻划一朵简单的团菊,创意清雅脱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碗类器物的内底中心处,常见刻有“福、寿、因、记、干”等文字装饰,这种文字装饰在其他窑址内出土的器物上少见。

潮州城东的笔架山窑址,是广东发掘规模较大的窑址之一,出土器物以青白瓷为主,青釉瓷产品数量很有限。青釉碗碟、盘等器物的内壁底,一般都刻划弦纹、花草纹或莲瓣纹;外壁底则刻划斜线纹或弦纹一周。而牡丹纹和蟠龙纹,则成为刻划在青釉盆内壁的常见装饰,牡丹图案布局严谨,柔媚可人;那姿态矫健的蟠龙则形象逼真而勇猛。

总体说来,以上各窑址出土的青瓷器,采用印花、刻划纹饰的工艺技术最为普遍。它们

创作的共同艺术特点是,印花纹饰图案凹凸明了,显现出清晰明快之感。尤其是刻划纹饰图案,其花纹技巧精熟,刀法利落,所表现的纹饰生气勃勃,活泼可爱。广东唐宋青釉瓷器纹饰的不断发展演变,为后世制瓷业的蓬勃发展开创了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

广东唐宋时期,各地窑址的匠师们,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积极吸收省外窑炉、窑具使用的先进技术,并按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窑炉、窑具实行全面的技术改造,因而极大地推动了制瓷业的发展,同时,他们还大胆地模仿外来瓷器产品优美的造型和装饰艺术,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结果促进了本地区制瓷业工艺水平的迅速提高。随着广东唐宋制瓷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青瓷产品的釉色与胎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唐代,广东窑址所生产的青釉瓷,釉色多数为青中泛黄,即青黄釉。青釉瓷呈色的深浅,与釉料中含氧化铁元素的多寡有很大的关系。然而,由于唐代馒头窑窑温较低和窑工们未能熟练地掌握还原气氛的烧造技术,同时加上釉料提炼不精,这些也是导致青釉瓷产品釉色不纯的原因。故唐代窑炉烧造的青釉瓷产品多为青黄釉。唐代的青瓷产品一般施釉较厚。稍薄一些的,釉色呈青黄色,釉汁愈厚,则釉色愈深。这样又在青黄釉的基础上,生产出了酱褐釉、酱黄釉和酱黑釉三种釉色瓷。这种以增加施釉次数使釉色发生变化的操作技巧,说明了当时的窑工,已经能够在低窑温的状态下,运用施釉技术来控制釉色的深浅程度。此技术手段比起唐以前的陶瓷施釉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从唐代窑址出土的青釉瓷产品胎质来观察,胎体厚重,胎土普遍淘洗不精,加之当时窑炉的焙烧火候不高,因而,胎质较粗松,硬度不高,气孔较大,吸水性强,胎色可分为灰白、灰色和白色三种,但白胎少见。另外,从部分窑址发现的大量瓷土堆积来看,可以说,唐代广东的窑场,已经开始使用瓷土这种原料来烧制青瓷产品了。瓷土的开发利用,表明广东唐代的制瓷业,在胎土选用方面亦有了长足进步。

广东瓷业生产发展至宋代,在釉料的科学

作为政治家的赵佗——兼谈史学评论的误区

吴凌云

提要：这是一篇历史人物的评论。我们的历史评论很容易步入两个误区：一种是无视客观环境而进行有目的但不切实际的政治评论，几乎是拿现代政治标准去要挟古人，视点太低；一种是采取圆滑的折衷主义，确立多种评论论点，但视野太窄，而且加了许多保护层。我们的评论，要走出这两个误区，然后确立作为政治家的赵佗所具备的素养以及分析他在当时当地情况下与汉王朝外交策略与手段。结论是：赵佗不愧是汉代割据一方的优秀的政治家。

一、走出历史评论的误区

无论怎么说，赵佗算得上是叱咤风云的

历史人物，否则也就引不起千百年来对他喋喋不休的争论；而且对于他的评论于人世肯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否则这喋喋不休争议的意义又何在？封建时代的历学家们且不去说它，在当代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赵佗的立国使我国地图呈现出一个不和谐的结构，原来已是‘政由一家’的岭表与中原，出现了赵越与刘汉两个并存对峙的政权，重新回到书使不通的老路上去”^①，基本上对赵佗予以否定；另一种在积极肯定赵佗的同时，又站在宏观的历史学角度，说明

调配和胎土的技术处理方面，均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各项技术指标都远胜唐代。从已发掘出土的器物来考察，釉色有青釉、青褐釉、青白釉、白釉、黄褐釉、绿釉等。而青釉则是广东宋窑中最常见的一种釉色，这种釉色以氧化铁为主要着色元素，以氧化钙为主要助熔剂。它在氧化焰里烧成黄色，经过还原焰才成为青色，可见，还原焰对青釉瓷的烧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烧制青釉瓷的生产过程中，窑炉温度的高低，也会对青釉瓷的呈色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窑温只有达到 1250℃ 以上的时候，才能将釉料烧成青色。此外，釉料的提炼是否精当，同样也会影响青瓷器釉色的呈色。从当时各窑址出土器物的青釉瓷釉色纯度来看，可知宋代广东的窑工们能熟练地掌握上述各项制瓷技艺。因此，其青瓷产品，釉面厚薄均匀，釉色淡雅清纯，光洁如玉。宋代制瓷工艺水平的发展进步，在瓷土的科学处理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宋代已经普遍使用瓷土原料来烧制青瓷产品，窑工们对瓷土均经过严格的提炼和淘洗，最大限度地减少瓷土中的杂质含量。故此时生产的青瓷器物，其胎质特别纯净细密，胎色多

为灰色或白胎。此外，由于宋代的青釉瓷，是在龙窑内的高温 and 还原焰中焙烧而成的，因而它不仅釉色光彩夺目，而且胎体的瓷化程度高，硬度极坚，叩击时常常可以听到“当，当”的金属声，可见，宋代青瓷产品瓷化程度之高，是唐代青瓷器物远不能相比的。

总而言之，广东唐宋时期的青瓷制造业，由于进行了一条列的技术改革和工艺革新，从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一方面，通过对窑炉整体结构和窑具的改造，进而提高了其火候和还原气氛的控制术，使青瓷产品质量得到保证，产量大增，另一方面，窑工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勇于吸收省外各名窑先进的制瓷工艺，对青瓷器物的造型、纹饰及胎土、釉料进行大胆探索和研究，使青瓷产品的器形和纹饰更为丰富多彩，胎土和釉料的调配技术趋于精熟，制瓷工艺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而促进广东青瓷业的蓬勃发展，其产品的声望日益提高，使其更富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而且有大批青瓷产品远销海外。广东青瓷生产产业的发展，为中国青瓷业独步世界，扬名中外作出了贡献。

(作者单位：省博物馆)

●名人述评●

赵佗的割据不利于中央集权，“同时，为了巩固南越政权，他在国内拥有众多的军队，沉重的军事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加深了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②。

这两种意见都走向了误区。赵佗是以一个秦末汉初纷争时代割据一方的政治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我们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才可能走近他，对当年的这位政治领袖展示一个真实的概貌；也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才可能真正揭露南越国在汉帝国版图所确立的位置；也只有这样，这个历史人物才不戴有道德家饰以的彩料和圆滑者提供的虚幻的神像。

第一种立论以今人要求古人，以自己的天下大同的平和主义哲学要求别人，而视周围环境不顾，视历史环境不顾，只能算是不切实际的阁楼之议。今人尚无世界一统的宏远眼光，更不能要求赵佗有千年后中国一统的眼光；今人尚有国家利益观念、民族观念，又怎么能要求古人不应有地区利益观念、区域界限观念？这一类意见甚至还认为赵佗是个搞分裂的人物，是破坏统一，进一步说是阴谋野心家。这不是客观的人物评论，历史人物在这里成为自扎的用来挡箭的稻草人，更确切地说，这只能算是一个道德家的评论。用道德来评论政治，那政治家真是体无完肤了——不应要求政治家是道德家，事实也不可能是。赵佗不是，汉高祖、汉武帝也不是——项羽以传统的道德要求自己而和刘邦抗争——还算不上是政治家，只能算是力士。政治和道德的结合，是成功政治的一个秘诀。也正说明了政治家不是道德家。古来的君主经常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进行统治，就是把中国人的道德应用到政治上。约定成俗的道德在政治家看来只是手段和工具，决不是目的。汉文帝在赐赵佗书中首先强调：“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以强调自己是正宗，也说明这一点。

我们决不可忘掉的是，历史决不是伦理道德故事。赵佗不是道德家，更不是道德领袖，拿自己的中庸去抨击赵佗的野心，那叫无视历史存在，就象责怪老虎为什么不是山羊一样。其实温顺是一种道德，勇猛又何尝不是一种道德？司马迁、班固作为伟大的史学家就在于他们以客观的史学态度而不是正统道德家的态度记下了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见秦始皇时的“彼可取而代之”、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陈平的“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③的一类壮语。之所以有这样的语言被记录下来，也正是这些语言能反映出这些人物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这些只言片语正是历史学家描写人物的点睛之笔。

只有政治家才用道德要求别的政治家，使之“名不正”，而且这种政治家更善于以道德君子来伪饰自己。所以许多证论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是有目的政治评论而非客观的历史人物评论，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这些历史学家的视点太低，必然视野太窄。大国中心论、民族本位论、道德中心论占据了他们的思维。

另一种观点的实质是史学评论上的折衷主义。不是他们受到圆滑的处世哲学的影响，认为：对于历史人物来说，于微观能见其伟大，于宏观见其渺小，再好的人物都有时代的局限，再卑微的人物说不定正代表着伟大的劳动人民。他们以所谓忠厚长者的态度来评论历史人物，先说此公不错，顺带说还有缺陷，仿佛他是成长中的少年还大有可为之处。甚至拿这种方法作为历史人物评论的定格。他们站得高，看得却不远，这种方法的缺陷是视点过多，视野却不宽，往往是多家意见的综合，所以许多评论不能切中要害，以这种逻辑推出的是天下乌鸦会吃虫、天下乌鸦一般黑了。如果说《三国演义》对历史人物的态度近迂、近伪的话，折衷主义者则是近奴、近伪了。他们习惯摆出某一

期历史学家的宽容，但这种宽容总让人觉得言不由衷，算是一种客套的宽容，这宽容于历史于人物也太可怕了。它让我们觉得历史人物是多面的僵尸。它让历史和历史人物走向虚无，中国的历史评论必须摆脱这个窠臼，走向积极、主观的方法论的道路上来。从更宽广的历史角度去考察，历史人物利用边缘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政治学的方法)，把时间空间的视野真正扩大，也只有这样，才能由特殊走向一般，找出历史人物的共性，才可能做到对历史人物真正的历史的宽容，历史评论才可能走近客观。列宁也说过“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范围之内”④。诸如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等人物及事件的评论，必须尽可能走近他们，并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从这些人物的自身分析起(生物学的方法)，才可能对诸多人物和事情做出圆满的、靠近现实的解释。

赵佗是个政治家，政治家有雄心、有谋略，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统治的区域，而这一切最终的目的是政治家自身需要有成就感，需要“自我实现”⑤，否则他将悲哀，他将空虚，但他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著名的政治家尼克松认为“伟大的领袖都具有超出自我的宏伟目标。他们做高官并非想出人头地，而是想干惊天动地的事业，英国的邱吉尔、法国的戴高乐……都为自己的祖国做过杰出的贡献……他们没有一个是把从政作为目标，而只是把它作为途径和手段。”⑥

二、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具备的素质

中国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礼治，荀子、韩非子的法治以至愚民政策等都是为统治者提供方略的，也可以反向看出这些思想家各自所要求的统治者的素质，但这些更多地偏向于道德素质，确切地说是世俗的道德素质和道德说教。与此相类似，古罗马的道

德家西塞罗在《论道德义务》中确立了鲜明的道德形象的君主(政治家)——智慧、公正、勇敢和节制，坚守信念、诚心待人、宽宏大量、慷慨大方——其实这些都是尧舜禹时代的中国理想家们的形象——在西塞罗看来，这些美德既是政治家实行统治的手段，也是政治统治的目的。

的确，这是人文主义的理想君主，但西塞罗只看到各种成功政治家罗列起来的美好形象的综合，只看到他们的表面，或者由他们的表面而看到的理想。其评论视点是从民众射向领袖。而与其同时的马基雅维里则反向提出他的观点，认为这些品质其实是一种伪善。他认为成功的政治家不需要这些美德，更不需要道德行事，因为道德是非理性的⑦。而且只要实现目标，他“必须去获取那邪恶的势力”，并且懂得依环境的指示，“什么时候使用它，什么时候不使用它”⑧。所以，他要顺应时事的变迁，“知时势，通权变”，“违背真理、违背博爱、违背人道、违背宗教”⑨，当然，也就经常地利用真理、利用博爱、利用人道、利用宗教——这跟老子的“大德不德”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位大胆的思想家在《君主论》中，甚至还将欺诈的艺术、邪恶等列入成功政治家的品格之中。“欺诈的艺术是成功的关键，伪善的实践不仅对于君主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需要的时候也能毫无困难地维持下去”⑩。

法国人亨利·法约尔(1841—1925)是一位优秀的管理人才，也是一位优秀的管理理论家，他认为一个优秀的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包括：

- (1)体力：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反映灵敏
- (2)智力：强调思想活泼、不拘泥于传统观念、适应性强
- (3)品德：有干劲、坚定、机智、有主动性、自尊
- (4)经验⑪

●名人述评●

本世纪60年代的吉赛利提出领导者先天具备的特征应该是：

- (1)先天具备的创造和开拓的个性
- (2)指挥能力
- (3)自信心
- (4)受爱戴和亲近
- (5)决断能力
- (6)成熟度
- (7)才能、才华
- (8)男性

管理者不一定是政治家，但出色的政治家一定是个成功的管理者，综合以上诸家的学说，我想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应具备的个性特点是：

(1)身体健康。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容易有顽强的意志力，更没有办大事的气概，甚至没有健康的思维。毛泽东是很好的例子，他的“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两百年”正说明这一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一方面忽略太多，但须知，凡伟大的政治家都具有强健的体魄，否则将危及其政治（如当代叶利钦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2)勇敢、自信、有雄心。

(3)有谋略、善权变。

(4)顺应时事变迁，不为世俗道德所束缚。这是第(3)点的具体运用，时事的变迁都成为实现人生目标的手段，道德亦然，“大丈夫能屈能伸”，正说明此。

(5)宁可自己失败，也不靠别人而取胜，强调自我奋斗，强调自己的无可替代，对于政治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戴高乐是很典型的例子^⑫。以这五点对照赵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个性鲜明的政治家了。

三、赵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出色政治家

赵佗是位优秀的管理者，在他统治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推动了岭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南越国时期是岭南建设开发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如果没有赵佗，是很难想象这发展的进程和速度的。这些取得了史学家们一致的认同。赵佗具备政治家所需的品质和特性：

(1)身体健康。赵佗是历史上少有的长寿

之主，据推算他活了102岁左右^⑬。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开国之君大都身体健康，而赵佗算得上佼佼者了。有人还总结出，他有自己的长寿之道，如生活有规律、不好女色、不听靡靡之音、勤于政事（70多岁仍然统治南越国的军队）、性格开朗等等^⑭。一个人身居高位而能摆脱世俗的诸多诱惑，没有大志和自制力是办不到的。必要时他还会倚老卖老，以此作为政治资本，反映他盘踞一方的自信与自豪。他在给文帝的信中写道：“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⑮”反映了他对中原大王朝且退且避的权变术。南越国以后几位统治者就逊色多了，文王赵昧就体弱多病，只活了40~50岁左右^⑯。

(2)勇敢、自信、有雄心。这在史料的记载中反映相当多，如他对陆贾说出的豪言壮语“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⑰，与刘邦、项羽见秦始皇时的豪言何等相似，他的政治抱负和个人雄心也由此可见一斑。他在给汉文帝的信中为自己称帝辩护的理由是“……西瓯……南面称王；东有闽越……亦称王；西北有长沙……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⑱。一个“聊”字，精彩之极。赵佗“顾左右而言他”，有点推卸责任的味道，由此可看出他的雄心和勇敢。他北击长沙，东击闽越，对中原使者“魑结箕踞”^⑲，摆出“蛮夷大长老夫”的姿态，而不是着中原的传统服装，按中原的礼仪见使者。这不是一般的勇敢自信，也决不是班固所理解的傲慢，而是一个超出传统方式，把传统道德放在一边的勇敢（须知蛮夷是汉人对周边民族的贬称，而赵佗的立国称帝是毫无理由的——中原人，先帝时称臣，父老在中原——此时的他心目中无父无君，道德上应该受到诛伐）。赵佗以“蛮夷”将自己的区域与中原相区分，他的称帝立国理论才有立足之点，也只有以此为立足点，他才可能将自己和汉王朝并驾齐驱。这是赵佗的高招，也正是政治家所必备的。顺便一提的

是，时世造英雄，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有刘邦这样的创世英雄，就有了赵佗这样的割据英雄。这也是南越国当时作为一个王国存在的原因。

(3)赵佗在外交上顺应时势变迁表现出来的谋略和权变，足以说明他是一个不可多得战略政治家。《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和《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对南越国与汉王朝两次外交情况的描述非常精彩，刚好两次主角都是赵佗和陆贾。

第一次，以赵佗的外交胜利而告终。公元前196年(汉高祖11年)，刘邦在“为中国劳苦，故释佗不诛”^①(其实非不诛也，国力决定了他不能或不敢诛)，于是派陆贾为使者，立赵佗为南越王。赵佗傲慢有加，“魁结箕踞见贾”，以示自己与中原汉王朝的不同，也暗示自己已盘踞一方，与汉王朝处于平等地位，且深得百越各部的支持。而陆贾则不愧为出色的外交家，看出赵佗的用意所在，采用了攻心为上的战术，说：“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从道德礼仪的角度触及赵佗的痛处，在立论上让赵佗处于被动地位。陆贾还从战略的眼光指出南越国及赵佗自身的忧患所在。陆贾说的也正是赵佗所真正担心的，陆贾说到了点子上。棋逢对手，所以赵佗马上“蹶然起坐，谢贾曰……”——赵佗演戏！——二人接着论英雄，一番外交辞令之后，赵佗昂然大笑，“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央中国，何遽不若汉！”在这段话里，赵佗把自己继续与汉王朝并论，而且向汉使者暗示，他只想独霸岭南，且不想得罪汉王朝。政治家的赵佗的确能够审时度势，确立自己的明智的战略，而不是与汉王朝进行硬的对抗。这种战略对南越国的存在和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否则，南越国是不可能存在近100年的。

为什么说这一次外交上以赵佗胜利而告终的呢？因在此之后，赵佗窃帝号如故，而且

进攻周边地区。且从上面的言辞看，赵佗对汉朝毫不心服，陆贾的攻心为上战术没有达到目的，赵佗真正欣赏的不是汉王朝，而是作为外交家的陆贾的眼光和口才。陆贾认为南越国“譬如汉一郡”是相当失策的，他的立论不对，言外之意他还承认了汉越是并立的两个政权，不同的是规模而已。而且陆贾出使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令称臣奉汉约”，一个“令”字，未免有大国强辞之嫌。

许多学者异口同声地扬陆贾，认为陆贾很成功，功劳很大^②。其实是不对的，与其赞扬陆贾的口才，不如赞扬赵佗这个地方的战略眼光。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陆贾如此，赵佗也知此。陆贾的苦心言辞只换来赵佗对他个人的欣赏——“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陆贾的话只是开拓了赵佗的视野，赵佗认为，汉王朝千里迢迢给他送来的只是一个可交谈的政治知己，太具有幽默意味了。不过这也正揭示了外交的实质，“外交家反映了这个国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和为实现这些要求所作的努力”^③。外交为内政服务，所以外交成就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内政成就^④。这一次赵佗的外交胜利是与南越国长期稳定和汉王朝立国之初国力不强分不开的。

第二次，汉文帝余威振千里之外，他是一个不怒而威的大国天子。客观的形势，决定了赵佗的外交政治策略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的确能审时度势，争取主动，知进知退。如果认为赵佗是政治上的狂夫俗子，那是大错特错了。他的立国战略是，守住一方土地和利益，而政治上则可以成为汉王朝的附庸(只是表面上、名义上的，但他的领地内他是不允许有刘姓诸侯王的)。汉文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休养生息”政策使汉王朝日益强大，他的《赐赵佗书》被当作古今政治公文的典范。陆贾这一次出使与赵佗没有外交争锋，而汉文帝的书信“无天子之威，有常人之情”^⑤，立论公正而格调高

●名人述评●

远，有大国君主的风度，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无需陆贾先生的诸多言辞。

赵佗在回信中，展示了他老练的政治家的本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滑头，他对汉王朝的屈服是国力决定了的，非主观意愿，回信从政治意义上讲也毫不比汉文帝逊色。赵佗在信中以“蛮夷大长老”开头，又多次卖弄“老夫”字样，大有倚老卖老之势；汉高祖赐他为南越王，他欣然接受，正是他立国战略的体现；而吕后利用经济制裁的策略对待南越国，挖了越家祖坟，无形中把南越国作为与汉王朝对峙平等的帝国，所以赵佗是不得已自立为帝——何等巧妙！赵佗进攻长沙国，其目的一方面是掠夺财富，另一方面是转嫁他与中央帝国的矛盾。长沙国在赵佗的回信中成了替死的冤鬼，“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此“窃”字活灵活现。他进一步为自己辩护，周边国家都称王，我赵佗不屑与他们为伍，无论是资历、雄心和才华都不屑也，“老人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信中还进行了巧妙的外交示威，“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但毕竟心余悸，他的实力不能与汉王朝抗衡，所以自己设梯子顺便而下——外交上的权变！——“然北面而事汉！……”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赵佗在位期间的粤汉关系，虽然几经大起大落，但总体没有战乱，没有战争，双方都进行着持续稳定的交往，促进了交流和南越国内多民族的统一与发展。在这点上赵佗是功不可没的。这一切与赵佗确立的战略方针以及他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胆略是分不开的，而且与他的良好的外交素质及所把握的尺度分不开的。总体上的友好往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赵佗个人的胆识是南越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页，至于汉武帝的平定南越，是有他的战略眼光的②⑤，如果说汉文帝是文治的话，武帝就是武

功了，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作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作法，如此才形成复杂、多变而且灿烂的历史。说赵佗庞大的军队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压迫，那也同样地是无视历史环境。赵佗如果没有军队，又何来南越国，何来他在岭南优秀的管治，又何来岭南经济的发展？如果汉武帝也将受到同样的指责的话，那几乎是没有强盛的汉王朝了，那么，许多人物将成为虚无，更无所谓史论了。“谢谢宽容”可以把我们引进一个新的历史方法论的空间去。

(作者单位：南越王墓博物馆)

参考文献：

- ①何维鼎《论西安前期的形势及岭南的回归》，《学术论文集 1979—1982 年历史学上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
- ②张蓉芳·黄森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P388
- ③《汉书·张陈王周传》P2039
- ④《列宁全集》第二卷：P857
- ⑤马斯洛《动机与人》，1986 年
- ⑥理查德·尼古松《从颠峰到低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P116—117
- ⑦⑧⑨⑩《马基雅维里》P78、79、81、89
- ⑪法约尔《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
- ⑫布赖思·克罗译著《戴高乐传》，商务印书馆，1995 年，P504
- ⑬《南越王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1 年，P324
- ⑭黄三《赵佗长寿之谜》，《南越王》宣传辑刊第一辑，南越王墓博物馆编
- ⑮⑯《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P3852
- ⑰⑱《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P2112
- ⑲⑳《战后英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P1
- ㉑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文化大学出版社印行，1982 年，P1700
- ㉒周乾深《陆贾研究》，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
- ㉓《汉书》，P3848
- ㉔谢楚发《绝妙好文》，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 年
- ㉕《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P487
- ㉖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

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缅怀革命英烈李硕勋

何锦洲

李硕勋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早期青年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我军卓越军事指挥员、中共浙江、江苏、广东省委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忠诚战士。他是四川省高县庆符镇人，1903年2月23日出生。青少年时代，他在庆符、宜宾、成都等地读书，1921年在四川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任四川学联会出版部主任，与阳翰笙等5人发起建立四川青年团，是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翌年冬，他在北京弘达学院学习。1924年，他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时，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翌年6月，他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会长，成为全国学运领袖。1926年7月，他在广州主持召开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与代表们制订和通过了总会一年来会务总报告、统一学生运动、拥护国民政府并赞助北伐等9个决议案，推动了广东以至全国青年学生运动的迅猛发展。同年8月，他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书长，经常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杨贤江、沈雁冰（矛盾）等一起商议工作，为促进首次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而努力。他们通过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揭发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对外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把我国资源出卖给帝国主义的卑鄙行径；对内残酷镇压我国人民的种种罪行。硕勋等同志参加的国民会议运动，揭发了北洋军阀的反动面目，提高了上海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扩大了革命宣传，促进了革命事业向前发展。10月6日，淞沪警察厅执行奉系军阀之命，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为赤化张目，从严审究”为无理藉口，到西门永裕里83号搜查，逮捕了该部工作人员梅电雕、秦邦宪等32人。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李硕勋、沈雁冰等营救，他们先后获释放。

这一年10月，硕勋同志根据上级指示，到武汉，先后担任中共武昌县委书记兼中共武昌

地委组织部长、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同年底，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随后率部到河南省参加北伐，征讨奉系军阀，攻占上蔡等地，后与师长李汉魂率领所属部队回师驻防武汉，保卫国民政府。1927年8月1日，他率领所属部队参加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旋即南下广东。在大埔县三河坝战役中，在朱德同志指挥下，师长周士第和硕勋同志带领第二十五师部队英勇抗击敌人，展开三天三夜的激战，歼灭了大批敌人。后因敌众我寡，他们转移到江西、广东边区开展战斗。同年10月，根据部队党组织和朱德同志指示，他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这支南昌起义军在赣粤战斗状况和请示今后行动方针。汇报后，党中央分配他在上海工作，1928年4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并在杭州开展白区斗争和指导农村开展革命斗争，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浙江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9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2月，他任中央军委委员（后勤学院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的组织演变情况》，《军史资料》，1996年第1期）兼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组建红十四军、红十五军、红十七军，并指挥三个军开展农村游击战。10月，他任中共江南省委（领导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省市）军委书记，指导三省一市进行地下斗争和开展游击战争。1931年1月，中共江南省委改组为中共江苏省委。他仍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

由于华南革命工作的紧急需要，李硕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1年5月20日夜在上海乘轮船，准备赴香港。当晚，他的夫人赵君陶偕未满三周岁的儿子与老同事阳翰笙

●名人述评●

到船上送别。5月21日凌晨4时,他乘坐的轮船开航,不久遇大雾,临时停航,至夜10时,继续开航。5月24日夜7时,他到达香港,因胃病恶化,到南华药房找到共产党员柯麟医生,找药治病。经过一番寒暄后,他对柯麟说:他是奉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到香港,拟赴转战于粤赣边区的红七军,任政委。随后,他出外遇到革命同志林布,同到香港海滩洗海水浴,浴后即到茶楼,边品尝茗茶,边谈论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怎样开展革命工作等问题。

到香港后,李硕勋立即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并与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中共两广省委机关设在香港。李硕勋与中共两广省委书记蔡和森、宣传部长章汉夫、组织部负责人杨捷芳、常委徐德、邓拔奇,共青团两广省委书记凯丰等,研究和确定在香港这个特殊环境下开展革命工作的具体措施。随后,他通过省委介绍,获悉同年春夏间,省委机关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反动武装多次破坏,不少同志被捕。为此,中共两广省委写报告给党中央,请加派干部到广东工作,特别要求留李硕勋在省委工作。5月底,他以素为笔名,写信给党中央说:“函谅达,我去留如何,速复电,即遵行。”

6月10日,蔡和森在香港参加海员干部会议,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押到广州,后英勇牺牲。领导广州、广西的两广省委,更加迫切需要领导干部。这时,章汉夫先后继任中共两广省委代理书记、书记兼宣传部长。中共两广省委再写报告给党中央,要求派领导干部到省委工作。鉴于两广急需领导干部,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李硕勋为中共两广省委军委书记。他立即与章汉夫、省委组织部长潘洪波、省委代军委书记袁策夷等商议开展各项工作。

李硕勋经过调查后,向省委汇报。在省委领导下,前一阶段,两广武装斗争是取得伟大成绩的。在广东的东江,建立了东江革命根据地和东江苏维埃政府,以陈魁亚为委员长、古大存、陈耀潮为副委员长,还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以古大存为军长,颜汉章为政委,有红

军5000多人,在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河源、博罗、潮阳、普宁、惠来、潮安、澄海、饶平、大埔、揭阳、丰顺、五华、和平、梅县、兴宁、龙川、平远等20多个县开展武装斗争。根据地拥有50多万人口。各区乡有赤卫队员1.6万人。尽管后来斗争遇到挫折,红军减员,但斗争烽火未停。今后,东江革命根据地要继续发展,将来力争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粤北军事斗争也有发展。粤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南雄油山等地,有工农红军活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都曾带领红军在粤北、赣南、东江一带战斗。粤北红军将来要向南发展,与东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大片,进一步扩大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的琼崖(海南),是中国第二个大岛。在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领导下,琼崖已建立琼崖苏维埃政府,以符明经为委员长,还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以王文宇为师长,人数已发展到2000多人,且在澄迈、定安、琼东、乐会、万宁、陵水等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母瑞山革命根据地人口曾发展到100万人。琼崖孤岛武装斗争今后仍要继续向山丘、丘陵、平原地区发展,力争革命根据地在困难曲折中壮大。在广西,邓小平、张云逸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右江、左江革命根据地,张云逸任第七军军长,邓小平任政委,俞作豫任第八军军长,邓小平兼政委,李明瑞任红七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红军发展到7000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是我国比较大的一块根据地。后来,张云逸、邓小平带领红七军等部队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但,广西红军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仍带领部队在右江等地坚持斗争。中共右江特委书记陈洪涛、委员韦拔群、黄明春、陆浩仁、李绍楚等均带领游击队开展战斗,并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由陈洪涛任主席。这时,第二十一师又到恩隆等地活动,以陈洪涛为师党委书记,以韦拔群、黄明春为党委,黄晖、陆浩仁、滕国栋、陈国团、黄书祥为委员。他们后迁右江党、政、军机关到东兰县西山办军政训练班,培训汉、壮等各族干部,今后拟坚持武装斗争。省委同意李硕勋对武装斗争的分析。

随后,经省委同意,李硕勋派人员到东江指导武装斗争。稍后,省委和章汉夫、李硕勋等派陈道生到东兰,传达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整顿红军,将第二十一师改编为独立第三师,以韦拔群为师长,陈洪涛为政委。这时,李硕勋还获悉,广西特委先后由文沛、何誓达、吴茂祥为书记、詹恒祥任代理书记、雷经天为负责人,后广西特委改为郁江特委,以詹恒祥为书记。李硕勋指出,两广红军要遥遥呼应,互相支持,以扩大华南革命根据地。

李硕勋在香港,住在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道中共香港市委秘书长潘同志家中。在此期间,他还常与中共香港市委书记郑仁波、党中央驻香港交通站负责人李少石、中共两广省委军委干事廖独航等研究工作,还到皇后大道西、北角、中环、尖沙咀、羲王台、旺角、沙田等机关传达省委指示,力求把每项工作做好。有时,他专门与袁策夷、廖独航等军事干部研究东江、粤北、琼崖、广西等地的军事斗争情况,肯定成绩,指出存在问题,确定下一步怎样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现有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队伍,进行土地革命。

不久,袁策夷因到别的地区担任新的更重要的工作,李硕勋、章汉夫、潘洪波、郑仁波、廖独航等热烈欢送他离开香港。在小型会议上,李硕勋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袁策夷前段工作的卓著成绩,在移交工作时的很好合作共事,衷心祝愿他到新岗位取得更大的胜利,并希望今后能再合作共事或重逢。袁策夷也作了十分友好的告别辞,祝贺李硕勋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取得特别显著的业绩,也望后有期。话毕,两人握手分别。

为扩大机关和深入了解香港情况,李硕勋探访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干事、当时任岭南中学教员林增华,共叙昔日情谊,畅谈别后多年工作、学习、生活状况,并互相勉励,今后认真搞好工作,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他还提出:两广革命同志往来较多,今后拟以林老师家中为活动据点之一。林表示欣然同意,因为过去都是革命同志,可到家中屋厅开会,比较安全。

那时,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

来认为,李硕勋一个人在香港从事工作不方便,容易引起别人怀疑,决定派中共中央妇委秘书赵君陶到香港任中共两广省委军委秘书,协助李硕勋工作,使他们夫妻团聚,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6月底,赵君陶偕儿子由上海乘轮船赴香港。7月1日,李硕勋与柯麟到香港码头见到赵君陶和儿子,兴奋地说:幸好你早来,如果迟来,我已到琼崖去了,因为省委已决定我赴海口,策划扩大琼崖军事斗争。这时,他与赵君陶及儿子都住在九龙中共两广省委军委机关。这个机关,过去只有廖独航住在那里,是在一间商店内,以商店作门面。廖独航住在楼上。李硕勋一家住在楼下。店主是廖独航的叔父,在铺面做些小买卖,经营食品、日杂品销售。李硕勋告诉赵君陶,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环境特殊。国民党反动派叛徒、特务勾结香港反动势力,逮捕革命同志押到广州杀害或坐牢。今年春,由于省委妇委江惠芳和省委交通员莫叔宝被捕叛变,使省委一些机关、中央驻香港特科个别机关、香港市委下属机关相继被破坏,省委领导人卢永炽、省委宣传部长林道文、省委组织部长陈舜仪、杨剑英等50多人先后被捕。林道文是在坚尼地道与夫人杨梅芳一同被捕,后被押到广州杀害。陈舜仪与夫人周淑琴一起被捕。陈舜仪后被拘至广州,受尽严刑酷打而牺牲。所以,我们在香港工作,特别要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叛徒,出外活动要特别小心。

随后,李硕勋带赵君陶到章汉夫、潘洪波、郑仁波、李少石、柯麟等住地和轩尼诗道、铜锣湾、中环、尖沙咀、油麻地、旺角、沙田等机关,同工作人员认识,方便联络,开展工作。星期天假日,李硕勋带赵君陶及儿子到太平山、浅水湾、皇后大道、维多利亚港、红磡湾、羲王台、宋王台、九龙公园、佐敦公园、荃湾、元朗、大埔等地参观,增广见闻,看祖国南疆海岛、半岛美丽风光。

8月,按省委决定,李硕勋拟赴海南岛开展新的革命斗争。出发前,他在九龙警署附近的一个机关召集省委军委干部和有关人员开会。他说,在这个地方开会,有香港印度籍、华籍警察保护,国民党反动派不敢绑架拘捕我

●名人述评●

们到广州，比较安全。他部署了东江、粤北、广西等地的军事斗争，并说明他即将赴海南召开游击队负责人会议，在天涯海角的宝岛扩大武装斗争。随后，他到柯麟处辞别。柯麟认为，李硕勋不会讲广州话，更听不懂海南话，派这样一个好同志到陌生地搞秘密工作，开展武装斗争，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李硕勋党性强，组织观念强，听从组织分配，本人也希望到祖国南方的椰林大岛从事游击战，以夺取部分地区的革命胜利，婉词感谢战友的关怀，决心赴琼。他买到船票后，柯麟及其夫人陈志英送别。他们认为，此去天海茫茫，是凶是吉，大家都惴惴不安，很难卜算，只得以好言安慰李硕勋，希望他沿途和到达目的地后，千万要处处留意。

离香港前，李硕勋向李少石辞别，感谢他对自己一家人的住宿安排，并希望他仍多关心照顾妻儿。他还说，鸦片战争失败后，腐败的清皇朝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使香港被英国占领。将来我国军事力量强大了，也要通过各种途径，将香港收回。这就称为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过程，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个愿望能实现。到时，我们在香港活动就容易得多了。

李硕勋于8月中旬初，乘轮船赴琼前，赵君陶与儿子到香港码头送行。彼此互道珍重，依依辞别。这时，赵君陶已怀孕，但恐怕李硕勋担心，没有告诉他。因此，李硕勋只知有一个儿子，还不知道有遗腹女。赵君陶多次叮嘱李硕勋沿途要格外小心，到海南后迅速写信告知地址和去向，并希望他参加军事会议，指导扩大游击战争后早日返香港。轮船启航时，她挥手依依分别，只希望他早日凯旋归来，重聚天伦之乐，孰料从此一别，竟成永诀。

李硕勋到琼崖首府海口，住在得胜沙路中民旅店，按秘密地址，与琼崖党政军负责人联系，主持召开琼崖军事干部会议。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话，又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作掩护，而两广军阀的密探与香港的密探、叛徒是勾结

的。他只身赴琼是很危险的。但是，他不逃避这种艰险，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毅然到达琼岛，迅速开展革命斗争。8月13日夜，正当他紧张工作时，由于叛徒戴德贵出卖，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狱中，敌人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法，劝他投降。他对党始终忠贞不二，誓不降敌，自知即将就义，于是写下感人至深的遗书给赵君陶说：“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你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计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

敌人再审李硕勋。他铁骨铮铮，忠贞不屈。敌人残酷打他，使他鲜血直流，两条腿骨被打断，体无完肤，也得不到党的机密，于是将他关在琼山县政府监狱。9月5日，由于他腿骨已断不能走路，反动派用竹箩抬他到海口东较场，即琼山府城刑场。他大义凛然，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

李硕勋就义3天后，反动派枪决戴德贵。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解放后，为纪念革命先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为李硕勋烈士遗书题跋：“李陶（李硕勋）四川庆符人，中国大革命时的共产党员，曾参加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进兵东江，后奉党命，调广东工作，赴琼崖策划游击战争，不幸为反革命当局捕杀。硕勋同志临死不屈，从容就义，是人民的坚强战士、党的优秀党员。他对革命的功绩，永垂不朽！朱德于北京，1950年11月11日。”

1950年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将军题词：“义举南昌，战赣粤闽，分途找党，话别天心。白区工作，奋不顾身。牢狱不屈，遗书义深。公等鲜血，解放人民。忠心浩气，永耀不泯。遗志未竟，吾辈仔肩。革命必胜，公可安眠。”

1951年1月2日，副总理郭沫若题跋：“五星红旗是无数志士的鲜血所染成的。硕勋同志的血也在里面炫耀着。捧读遗书，从容就义，慷慨临刑的精神活跃于纸上，使千百代后

市舶管理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

——从宋代广州泉州的海外贸易谈起

王国梅

在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广州、泉州是两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宋元两代，这两大港的地位曾发生过有趣的变化。中外史家，海峡两岸学者对此作过很多的论述，也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触发其变化的原因。然而对于市舶管理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笔者认为有进一步阐述和总结之必要，以便为今日沿海城市发展对外贸易，繁荣经济和加强海关监督管理所借鉴。

广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与海外通商，秦汉时期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埠和海外

贸易大港。到了唐朝，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广州成了“珍货辐辏”^①、“环宝山积”^②的全国最大贸易港埠。唐政府在这里设置市舶使，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设置官员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之始。

泉州的海上交通最初记载见于南朝^③，海外贸易在唐代开始活跃，出现了“市井十洲人”，“还珠入贡频”^④的初步繁荣，并与广州、交州、扬州同为唐时我国四大贸易港口^⑤。唐朝廷在泉州“设参军事四，掌出使导赞”^⑥。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规定

人见之，亦当肃然生敬。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是训育革命后进的不朽教材。”

1962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撰写了《悼念李硕勋烈士》诗：“锦城初识羨英华，有志男儿爱国家。北伐从军趋武汉，南征转战别流沙。几行墨迹明心迹，万顷涛花涌血花。遗骨琼州何处觅，喜看红日照天涯。”1980年清明节，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题词：“烈士精神万古青，后继奋进中华兴。李硕勋烈士永垂不朽！”

1983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聂荣臻元帅题词：“李硕勋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记革命先烈，倍增革命感情”。1986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题词：“李硕勋烈士永垂不朽”。

198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

震为海口建立的纪念亭题名：“李硕勋烈士纪念亭。”

198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题词：“李硕勋将军。”

1989年9月，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长、中顾委委员刘田夫题词：“李硕勋将军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1993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怀为纪念李硕勋题词：“浩气长存。”

199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题词：“伟业千秋存，英名万古留。”

1993年9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题词：“李硕勋烈士革命精神永存。”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州、泉州等地官吏对来华蕃商宜，“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币、进奉献，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⑦。

唐朝灭亡，五代十国继起，我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广州为南汉刘氏政权中枢，依旧是一个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割据福建的闽王王审知也竭力“招徕蛮夷商贾，敛不加暴”，并置“榷货务”予以管理^⑧。到了陈洪进统治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已有了长足进步。

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更加发达，广州仍为我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二月灭南汉后，同年六月即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⑨。这是封建王朝设置市舶机构之始，比唐时设使又进了一步。

为了发展海外贸易，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特派内侍八人带着敕书、金帛，分四路到南洋一带招蕃商前来通市。对于前往海外诸蕃贸易的本国商人，则由市舶司发给官券予以放行。淳化年(991年)太宗“诏广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⑩。

政府为了鼓励市舶司官员积极“招诱”外商，对有功的市舶纲首补官进爵。绍兴六年(1136年)知州连南失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还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者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⑪。广州市舶司因管理市舶得当，招徕蕃商有方，得到朝廷嘉奖和推升的有：马亮“招来海商”，使广州“珍货大集”，“遣中使赐宴以劳之”^⑫；广州知府兼转运市舶使杨克让“诏升殿慰劳，面赐金紫”^⑬；广州市舶司的周穉“三年清以镜”，升任右文殿修撰^⑭；庐陵人萧汝谐，在庆历年间，监领广州市舶，一年之中赋税增百万，荐升台谏；平陆人华中师，杭州人李蘧，泉州人陈颖在任广州市舶使时因有政绩，受到朝廷的奖励和升迁。泉州蕃纲首蔡景芳因“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授承信

郎。宋朝廷把官员对市舶管理政绩作为考察提升的依据，对发展宋代的海外贸易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北宋政府还通过“蕃长”，招谕蕃商，对招徕舶商有成绩者，予以补官。淳化四年(993年)，大食国舶商蒲希密就是得到广州蕃长的寄书招谕，前来广州贸易^⑮。大食勿巡国进奉使辛押陀罗在任广州蕃长时，因招徕舶商很有成绩，本人生意也做得很大，“家资数百万缗”，北宋政府封他为“怀化将军”。熙宁五年(1072年)辛押陀罗归国时，宋神宗特赐以“白马”、“鞍髻”^⑯。长期在广州居住的阿拉伯商人蒲晋、蒲琚，绍兴年间分别授忠训郎和补承信郎^⑰。泉州大食商人蒲罗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委是勤劳，理当优异。诏蒲罗辛特补承信郎”^⑱。

宋朝庭重视保护外商利益，拯救遭难船舶，负责海事的善后处理。船舶遇风出现海事时，市舶司官员和地方官有责任投援，帮助船舶出险。如果船舶的主人失踪或溺死，市舶司要把货物清点造册，妥为保管，以待其亲属前来认领，严防盗窃或昌领。

宋代广州有大量外商，广州有蕃坊之设。蕃坊设蕃长一人，由外商充任，具体管理蕃坊事务。泉州的蕃客或“蕃商杂处民间”或“列居郡城南”，形成外国人居住的蕃人巷。市舶司对外商贸有监督和管理之责；蕃商犯法，市舶司参与审判和定罪；外商对审判不服，市舶司有受理申诉之责；蕃商死亡，市舶司要代为保管其财产，并按法律处理财产；侨居蕃坊的外商，欲往他处贸易，需经市舶司批准，发给“公凭”，方可成行；市舶司还负有参加挑选和推荐蕃长之责；兴办学校，教育蕃人子弟，“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南清建蕃学”^⑲。

广州市舶司为适应日益增多的船舶停靠，特地设立市舶亭。蕃船抵港后，有“阅货之宴”；临行时“提举市舶大犒设蕃商”^⑳，“郡国有司，临水送之”。绍兴十四年(1144年)泉州市舶司被批准“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蕃

舶之际”，“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②，市舶司官员、地方官员和蕃官参加。

广州和泉州市舶司每年主持夏冬两次祈风典礼，夏季泉州通常为四月，广州为五、六月，冬季为十、十一或十二月。参加祈风典礼的有地方长官和市舶司官员。泉州九日山保留有10方祈风石刻，是研究宋代祈风制度的珍贵资料。

市舶司设置来远驿接待外国使臣。泉州市舶司政和五年(1115年)中设置来远驿，“并足定犒设馈送则例及以置使臣一员监市舶务门”，逐步完善市舶司管理办法，以接待日益增多的“慕化贡奉诸蕃国人等到来”^②。

市舶司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采取鼓励外商来华经营，保护外商利益的措施，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宋朝廷对市舶司官员的选拔采取慎重的态度。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规定：“广州勾当市舶司使臣”“委三司使、副使、判官或本路转运使奏廉干者充选。”^②天禧四年(1020年)又规定：兼任市舶判官的“广州通判，于京朝官中选累有人奏举者具各取旨”，“候得替日，如不亏递年课额，特与改官，优加任使，其市舶使臣亦候得替，依押香药纲使臣例，迁转亲民任使”^④。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宋高宗对泉州市舶官的委任很重视，认为：“提举市舶官委奇(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⑤。市舶官员是掌管市舶司海外贸易的官员，他们的清廉或贪赃枉法直接影响到海外贸易的发展。

熙宁七年(1074年)七月，宋神宗“诏广东路把举司劾广州市易务勾当公事吕邈，以拟入市舶司拘栏蕃商物故也”。其时，市易务虎视眈眈，大有并吞市舶司之意，导致海商不至，“广州市舶亏岁课二十万缗”，广州海外贸易一度中衰。北宋政府采取措施，知州程师孟主持增建广州西域以保护商业区的安全，朝廷还排除市易务的干扰，“诏广州市舶司依旧存留，更不并归市易务”^⑦，保证市舶司的独立职权。广州海外贸易继续发展，其贸易额在国内诸港中仍独占鳌头。熙宁十年(1077年)，“明、杭、广州市舶司博到乳香计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

斤，其中明州收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六百三十九斤，广州则由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⑧。

泉州市舶司官员挟权营私，勒索蕃商，如嘉泰三年(1023年)，福建提举市舶曹格“借法济贫，格移易乳香，被放罢”^⑨；嘉定六(1213年)提举福建市舶赵不熄，“多抽蕃舶”被“降一官”^⑩。加之福建连年水涝，闽广长期海寇为患，州郡负担过大，市舶管理受到干扰。至嘉定年间(1208年—1224年)来泉“蕃舶惧苛征，至者岁不三、四”^⑪。泉州巷一度中衰，海外贸易受到很大影响。

嘉定及绍定年间，名卿大儒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征猷阁待制身份，先后两次任泉州太守。他针对“征榷太苛而蛮琛罕至，涝伤相继而农田寡收”及海寇猖厥而航道受阻的情况，提出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整顿海防，精炼水兵，敕飭吏治，重振市舶的主张。他与市舶提举赵崇度，同心合力，立下“严以律己，廉足示威”的决心，“同心划洗前弊，罢和卖，禁重征”^⑫。在他们的努力下，泉州的海外贸易又走上繁荣发展之道，“逾年舶至三倍”，“遂岁增三十六艘”。

建炎年间，通判兼市舶提举林孝渊“接收舶货，吏循例取脑(龙脑)一厘以纳”，孝渊厉声斥曰：“公则官物，私则商货，何例之有？”遂“斥反舶库”。胡大正“开禧中金判泉州，为政清廉”，“郡为番商之会，每舶至，检视者得利不资，大正秋毫无所取”^⑬。

地方官员和市舶官吏能“居宦清白”，“秋毫无所取”，又能“划洗前弊”，执行市舶管理法规，海外贸易就能得到发展。

宋代根据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总结以前市舶司管理的经验，元丰三年(1080年)正式修定“广州市舶条(法)”并“委官推行”。市舶条例的内容主要是：船舶出入港、商人出海贸易，必须持公凭，载明货物名称、数量、船员名单和所去地方，否则以违犯条例论处，货、船全部没收。到港口后由市舶司官员根据公凭逐项检查，谓之“编栏”。“阅实”确定无违禁物品后进行“抽解”，细色抽一分，粗色抽三分。凡属禁榷物货尽行收购，“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

之”，余者“任其货卖”。违法者，根据性质和程度轻重，从“徒一年，领州编管”，“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到“鲸面配海岛”，直至“处死”等。关于违反铜钱、铜出口的禁令，也有详细奖罚条文。这一市舶条例，是全国市舶司都要遵守的市舶法，对广州、泉州等港口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综观宋代广州、泉州等港口海外贸易发展的历史，其由盛而衰或由衰而盛的原因，除与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安定与否、统治者的重视程度有关外，还与其时的市舶管理状况有直接的关系，统治者的重视、扶植与否往往体现在市舶管理制度上，如市舶机构的设置，官员的奖惩、遴选、抽分、禁榷等具体管理方法的制定等。北宋时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统治者高度重视和市舶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导致了广州海外贸易的空前繁盛和泉州市舶的逐步繁荣。宋室南移后，情况有了变化。泉州由于占了地利，又得到宋王朝的积极支持，因而迅速崛起，但广州却在市舶管理制度出现弊端，采取措施不如泉州积极有效，终于迅速被泉州港超越。可见，市舶管理对海外贸易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对一个港口的兴衰变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空前繁盛，远非封建社会可比。中央、国务院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和灵活措施，接着又决定进一步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和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经济开放区，使闽、粤两省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及科技文化交往得到迅速的发展。

广州在这种新形势下，其历史悠久的对外贸易得到了空前大发展。泉州在纳入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经济开放区的发展体系后，也逐步展现其昔日的风姿。作为国家出入境的管理机关——海关，其地位和作用之重要正日益显示出来。海关工作人员应在“公正廉洁，文明把关”^{②④}的职业道德准则规范下，深化“为祖国把关，为国家争光，对人民负责”之意识^{②⑤}，认真研究市舶管理制度

和海关历史，结合海关的工作改革，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加强海关监督管理，促进对外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⑥}贡献自己的力量。可以相信，海关在以“促进为主”的方针指导下，在中央、省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必定能发挥其特有的优势，重视其昔日的风采，焕发出新的青春。

(作者单位：广东省博物馆)

注释：

- ① 《旧唐书》177 卷卢钧传
- ② 《旧唐书》卷 98 卢怀慎传
- ③ 《续高僧传》卷 1 拘那罗陀传
- ④ 《全唐诗》卷 208 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
- ⑤ 桑原鹭藏《蒲寿庚考》
- ⑥ 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
- ⑦ 《全唐文》卷 25 《唐文宗太和八年上谕》
- ⑧ 《新五代史》卷 68 闽世家
- ⑨ 《宋史》卷 258 潘美传
- ⑩ 《宋史》卷 490 大食传
- ⑪ 《宋史》卷 185 食货志
- ⑫ 《宋史》卷 298 马亮传
- ⑬ 《广东通志》卷 237 宦绩录
- ⑭ 《广东通志》卷 238 宦绩录
- ⑮ 《宋史》卷 490 大食传
- ⑯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 ⑰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
- ⑱ 《宋会要辑稿》职官 44
- ⑲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 2
- ⑳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3
- ㉑ 《宋会要辑稿》职官之 44
- ㉒㉓㉔ 《宋会要辑稿》职官 44
- ㉕ 《宋史》卷 167
- ㉖㉗ 同㉒
- ㉘ 《粤海关志》卷 3 前代事实
- ㉙ 《宋会要辑稿》职官 74
- ㉚ 《宋会要辑稿》职官 75
- ㉛ 《宋史》卷 427 真德秀传
- ㉜ 同㉛
- ㉝ 《泉州府志》名宦
- ㉞ 《全国海关关长会议文件》(1987 年)，戴杰《加强海关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改革、服务四化》
- ㉟ 同㉞
- 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1987 年第一章总则)

我们乘车在美国东北部滨海城市波士顿游览。带领我们游览的朋友对我说：“请你往前看，马上就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个古迹。”

我向前望去，道路两边都是不十分高的楼房（波士顿的楼房一般不高，只四五层），路旁是刚被扫雪车扫下来的雪，白晶晶也十分干净，却看不到我想象中的古迹，例如古老的建筑、石碑之类。

“在什么地方？我看不到。”

“请你往前方马路上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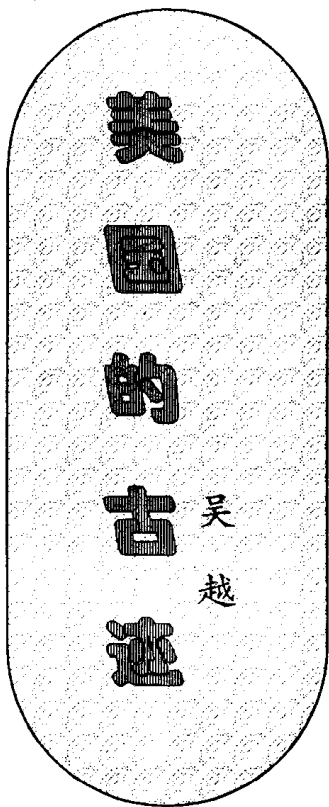
“什么，马路上空荡荡的。”

“你看到沿着马路旁边用红漆涂起来的红线吗？”“看到了。”“这就是古迹，沿着红线是从小教堂到康考特的路。1775年4月，有一个小教堂的打钟人保罗维里，从小教堂一直跑到康考特，去向独立革命军报信，说英军要进攻康考特的军火库。为了纪念这对波士顿独立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市政府特意在这条路上画了红线，让人瞻仰。”“瞻仰这红线？”“也可以这样说吧，反正，这是游览波士顿的重要项目，每个导游通过这条线可以向你讲一个钟头关于波士顿独立的故事。”“原来如此。”

美国是在1776年独立的，在此之前，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主要在现在美国的东北部。1770年英法战争以后，英国为了填补财政赤字，加重了向这块殖民地的居民征税，遭到了人们的激烈反抗。1770年3月，英军在州议会前开枪打死了三个波士顿人，激起人民组成独立革命军，起来驱逐英军。因而，同波士顿独立革命军活动有关的地方和器物，今天都成了美国的历史古迹。在那三个波士顿人就义的地方建起了纪念碑，在革命军开过会的地方建成纪念馆，在革命人物生活过的地方都设置了相应的纪念物。

我们参观过一艘和英军打过仗的战船，叫“五月花号”。这是一艘约四五十米长的双桅木船，原来已经损坏得躯壳不存了。因为复原古迹的需要，人们找来了一些据说是船上的木板，便按记忆把它“复原”起来。我们到船上参观时，船上悬挂的是只有十五颗星的星条旗（那时美国只有十五个州）。看了这面新造的旗，由于它少了许多星星，倒也是古意盎然的。

美国东北部从波士顿到费城一带可以说是“革命圣地”，为了“复原”这一带的古迹，美国人费了不少功夫。我们在费城参观了美国有名的两个古迹，独立厅



和“自由钟”。独立厅是一个保留得相当好的二三百年的古老建筑，它前身是个小教堂，约莫有十米高，面积可能不超过1000平方米，里面是会堂，顶上有个小钟楼。美国独立前一年，酝酿和组织独立活动的美国大陆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不久，华盛顿在这里就任独立军的陆军总司令，随后在这里通过美国独立宣言。过了十年，又在这里通过美国第一部宪法，美国第一、二任总统，就在这里就职。参观独立厅，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也是创业维艰。“自由钟”就是庆祝美国独立时，在独立厅钟楼上敲过的钟。这口钟铸造的质量不怎么的，当时一敲就裂了。现在陈列在独立厅不远处的“自由钟”是经过多方寻找才找回来的。除了波士顿和费城，华盛顿可能是美国古迹最多的地方了。这里的古迹和上述两地的不同，大都是事后建起来的纪念碑、纪念堂、纪念馆、陈列馆，由这些建筑物展览美国以至全世界的古迹、古董。华盛顿纪念碑像支

巨大的铅笔倒立在华盛顿市中心，高555英尺，在碑内乘电梯上塔顶，可以眺望整个华盛顿市。纪念碑的南面是杰弗逊纪念堂，像凉亭似地立在湖边，从外面可以隐约望见里面杰弗逊雕像，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美国民主党的创办人之一。纪念碑的西面是林肯纪念堂，是一座约十米高的平顶的建筑，里面有林肯雕像，他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办人之一。在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纪念碑之下，让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创始人各据一方，颇具匠心。这三大纪念碑（堂）之外，就是十几个大的国立展览馆，如历史馆、自然馆、艺术馆、航天馆等等。据说都是世上有名的，今年元旦我们到华盛顿旅游时，在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闹别扭，阻挠通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以致国务院没有钱给看守这些展馆的公务员发工资，所有展馆都闭门谢客。我们只好望馆兴叹，失去了参观的机会。据了解，这里展出的中国古董，并不亚于我们国内的大展览馆。

美国东北部古迹较多，西部古迹极少，但西部人挺会“以古引财”，没古迹也会“造”出来，或买回来。在旧金山，最著名的古迹恐怕要算“渔头码头”了。据说这里是当年最早来到西海岸的西班牙人登陆的地方，现在已经是旧金山的旅游胜地。我们到这里参观时却怎样也看不见当年“渔人码头”的样子，见到的是许多百货商场、地摊，吃海鲜的菜馆和大排档。码头上飘逸

●国外文博●

着三藩市蟹(有人叫“巨无霸”,一只蟹有一、二磅重,价钱比广州还便宜)的味道。唯一有“古迹”味的是码头附近有一群从太平洋上游来的海狮,约有一、二百只,伏在码头前面的岩石上休息,不时伸长脖子成群嚎叫起来,有点像一、二百驾车响起高音喇叭,十分热闹。据说,当年印第安人在这里渔猎的时候,就有海狮在码头岩石上嚎叫了。现在这些海狮也受到保护。到渔人码头看海狮嚎叫,是旧金山一景。

美国西部的最大的古迹,却是“伦敦桥”。它原来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古迹,而是伦敦泰晤士河上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桥。是一个富商从伦敦把它买回来的。这是一座完整的石拱桥,长 949 英尺,建于 1826 年。1968 年伦敦因市政建设需要,把这座石桥向全世界拍卖。美国富商马可用相当 246 万美元的价格把它买到手,又花 700 多万美元把它从伦敦运回来,安装在阿历桑那州的哈瓦苏湖上。这哈瓦苏湖是一个由于科

罗拉多河的水利工程截流而出现的新的湖泊。其中一段湖泊把一条公路淹没了,马可乐就在这一带湖边买了一大片土地建一个度假村,让石桥跨湖凌空把公路连接起来。这“伦敦桥”经过传媒的渲染,马上成为旅游热点。马可乐在湖边建的度假村,从此生意兴隆,长旺不衰。人们也就把这个地方叫“伦敦桥”,原来的土名反而被遗忘了。这座桥可以说是西部人买古迹“造”古迹办旅游的典型表现。

许多外国人(包括英国人)也来“伦敦桥”旅游,我在桥上遥望那热闹的马可乐趣度假村时,正好有两个伦敦人站在我旁边。他们看见那“汽车和人一样多”的度假村,有点吃惊的样子,其中一个把头晃了两晃,对另一个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他讲的具体意思是什么?没有明说,但也尽在不言中了

(摘自 1996 年 8 月 5 日广州日报)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视察深圳文物工作

5月31日至6月2日,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在深开会期间视察了深圳文物工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市文化局副局长董小明同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吴曾德同志汇报了深圳市近年来文物工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6月1日,张文彬局长在市区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位于大鹏镇的大鹏古城和位于龙岗镇罗瑞合村的客家大围屋鹤湖新居。

大鹏古城是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的“大鹏守御千户所城”。明清两代,大鹏古城一直是我国南部海防的重要军事营垒。在明代抗击倭寇、海盗及在鸦片战争期间抗击英军入侵的斗争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1989年大鹏古城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又被深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深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已经成立了“大鹏古城博物馆”,以进一步加强对古城的保护、研究和对外开放工作。

位于龙岗镇罗瑞合村的客家大围屋鹤湖新居为清初由兴宁迁来的罗氏家族三代人历经数十年所建,成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它规模庞大,气势磅礴,占地面积两万余平方米,是惠、东、宝三地最大的客家民居建筑群落,为客家建筑艺术的结晶。现已辟为客家民俗博物馆。

视察中,张文彬局长详细察看了大鹏古城和鹤湖新居的各个部分,询问了两处文物的保护情况和两个博物馆的筹建进展情况。对市、区、镇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文物工作表示赞赏,并充分肯定了成立大鹏古城博物馆和龙岗镇客家民俗博物馆的作用及意义。视察中,张文彬局长还挥毫为大鹏古城博物馆题词:“沿海古城,大鹏为最”;为龙岗镇客家民俗博物馆题词:“保护客家瑰宝,弘扬民族精神”;张局长还勉励市、区、镇各级政府继续做好大鹏三大府第的保护工作,重视大鹏古城和鹤湖新居博物馆的建设,共同做好全市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

(深鹏鹤)

连平县博物馆新馆落成

1997年6月26日,连平县博物馆举行“连平改革开放成就展览”暨连平县博物馆开馆仪式。来自省文化厅、河源市文化局、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及河源市属各博物馆的馆长等共40多人参加了该仪式。县委陈云书记、县政府赖兆璜县长为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幕。

连平博物馆位于县城公园内,建筑面积620平方米,1996年冬竣工。该馆由地方政府无偿划拨用地,县政府拨出专款近40万元,省文化厅资助15万元建成。“七一”期间,连平县委办、宣传部、文化局、博物馆联合在新馆举办了旨在扩大宣传当地丰富资源优势,完善投资环境,优惠投资政策,展示当地改革开放以来“两个”文明建设成就,对广大干部职工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大型图片、实物陈列展览。县委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镇、各单位组织观看。开展到今,参观人员络绎不绝。

(胡小江)

展览不断 回归情深

香港回归,普天同庆。广东省博物馆结合社会需求,发挥自身优势,广泛联络,大胆开拓,通过举办展览等实际活动,弘扬时代主旋律,烘托回归大气氛。

自六月份以来,在广东省博物馆内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的展览接连不断,共有5个之多,可谓好戏连台。有由省老干书画协会、省文化厅等单位主办的《广东省党政军老干部书画展》(6月5日至11日)、由省文联、省博物馆等单位主办的《纪念鲁迅在港七十周年书画展》(6月8日至14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员会主办的《香港回归书画展》(7月10日至13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广州市新闻出版局、省博物馆等单位承办的《香港繁荣发展的根本》图片展(6月20日至7月20日)和由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迎香港回归书画展》(7月23日至27日)。其中,《香

港繁荣发展的根本》图片展政治性最强,影响力最大。该展览以“一国两制”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宣传香港经济成就为中心,反映了香港同胞对香港繁荣发展所作的伟大贡献,展望了香港回归祖国后继续繁荣稳定的明天。展览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包括380多幅图片,并设多媒体电脑有奖问答。展览展出的一个月时间里共迎来各界观众10万余人次。七月一日前后,广州地区一些群众专程来馆,除参观《香港繁荣发展的根本》,还特地瞻仰邓小平同志巨幅照片,以此表达对伟人的怀念和对香港回归的喜悦之情。参观广东省博物馆,成为广州市人民喜迎香港回归的重要活动。

此外,从6月上旬开始,由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巡回图片展》在省蕉岭、河源、龙川等市县展出,观众反应热烈,参观人数达5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粤馆办)

春献羊城——广州青年 英杰事迹展

为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75周年和广州“地下学联”成立50周年,由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和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主办,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承办的《青春献羊城——广州青年英杰事迹展》于5月27日上午9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越秀南路89号)隆重开幕。市委副书记李善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庆申、市委宣传常务副部长崔瑞驹,老同志黄蕊华、司徒梅芳及青少年代表300多人出席开幕式。展览为期5个月,到10月底结束。

该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峥嵘岁月;火红的年代;英杰事迹激励我们前进。通过500多幅图片和300多件文物,详细地展示了75年来广州地区各个历史时期44位青年英杰的感人事迹。其中主要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的萧楚女;曾策划和领导省港大罢工的周文雍、陈铁军烈士;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伍竹迪;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获得者容国团;

高州市博物馆相继举办“三教育”展览和 “97 香港回归祖国”展览

今年上半年，高州市博物馆相继举办了中共党史教育、爱国主义与国情教育、乡情教育等“三教育”展览和题为《一国两制，百年梦圆》的香港回归祖国展览。

“三教育”展览中的党史、爱国主义和国情教育部分以图片为主，扼要而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革命斗争、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程，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介绍了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乡情教育部分则以出土文物为主，展示了高州地方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还介绍了高州近现代的革命斗争史和经济建设成就。“三教育”展览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题材。

《一国两制，百年梦圆——97 香港回归

祖国展览》通过大量的图片，展示了香港与祖国大陆五千年的血脉联系、近代以来香港的抗英斗争以及中国政府为收复香港主权所作出的努力，宣扬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介绍了中英就香港问题所进行的艰难谈判，展望了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美好前景。

展览纳入市委宣传部对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中小學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政治形势教育的活动计划，由宣传部发文组织集体参观。“三教育”展览从3月份开始至5月底结束，共接待了观众4万人次。香港回归展览从6月1日开始，至今亦已接待观众从近万人次，目前仍在继续展出中。这两个展览都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和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群众的好评。

为了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在博物馆展览结束后，我们将上述两个展览送到各乡镇及中小学进行巡回展览。

(陈冬青)

80年代以生命谱写一曲雷锋之歌的安珂烈士；见义勇为的爱民模范刘志艳；灭罪刑警杜庭斌；在激光和光谱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周建英等。

该展览以宣传先进人物的高尚情操与优秀品质为宗旨，内容丰富翔实，形式活泼多样，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此外，该展览是团市委、市青运史研究委员会举行的“广州青年英杰知多少”系列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和“97 成人宣誓日”、“羊城之夏”等活动紧密结合。团市委、市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及市教委已联合发文至各级团组织和市属大、中、小学，要求团员、青年、学生前往参观。

(朱晓秋)

罗定市举办 庆回归百碟藏品展

由罗定市文化局主管的罗定市鉴藏家协会于6月底正式成立。6月28日至7月5日，罗定市文化局与罗定市鉴藏家协会联合主办了《庆回归百碟藏品展》的文物展览，共展出罗定市博物馆与21位收藏家收藏的瓷碟、漆碟153件，木雕古玩67件。同时将上海、南京、黑龙江、海南、内蒙、山东、山西、江苏以及广东等地的收藏团体与收藏家发来的贺电、贺信和题赠书画一并展出，观众十分踊跃。这次展览以瓷碟为主，主题突出，在社会反响很大，反映了罗定市收藏事业的兴盛景象，表达了文物爱好者与收藏家们喜庆香港回归祖国的兴奋之情！

(罗博)

梅州市举办文物考古培训班

9月9日至24日，梅州市文化局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梅州进行商代遗址发掘之机，与之联合举办了为期16天的文物考古培训班。这次办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既学习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基本理论知识，又安排了遗址和墓葬的现场发掘实践，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次办班的学员来自梅州市各县(市)的博物馆，共有12人。大都为年轻的副馆长。在该班的结束总结会议上，省考古所的老师对参加培训的学员给予了高度

的评价，认为他们既吃苦耐劳，又虚心好学，从而圆满地完成了办班学习任务。梅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古小平及梅州市副市长、梅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何万真，以及梅州市文化局的领导在办班期间亲临现场慰问。在总结会上，学员们畅谈了各自的感受，认为在学习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今后一定要将它们运用到工作中去，为梅州文物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陈新权)

杨钟健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学术年 会在京举行

为纪念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优秀科学家杨钟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古生物学会古脊椎动物分会举办的“杨钟健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学术年会”于1997年6月1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著名科学家贾兰坡、杨钟健先生的生前好友等近二百人出席了会议。我省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学者张镇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邱立诚(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参加了会议。

杨钟健(1897.6.1~1979.1.15)，字克强，陕西华县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在北京大学期间，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毕业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1927年获哲学博士。1928年回国后从事地质、古生物、古人类及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于1927年出版，标志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诞生。1928年，杨钟健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成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后又先后担任地质调查所北京分所所长、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和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主任。1947年至1948年间，杨钟健先生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是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第一任局长，其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1961年改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在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研究生涯中，他发表学术论著达670余篇(册)。他的科学人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两种堆积，四个起源”。两种堆积，即是红土(白垩系)、黄土(第四纪)；四个起源，即是鱼类起源、爬行类起源、哺乳动物起源、人(包括灵长类)的起源。杨钟健先生的学术生涯，与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的研究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一个成功的优秀科学家和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在这次会议上，刘东生院士的《成功的科学家——杨钟健先生》、董枝明教授的《杨钟健先生与中国恐龙》、赵资奎教授的《关于恐龙绝灭研究问题的趋向——来自K/T辩论的启示》、李超荣副研究员的《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的发明及其意义》、黄慰文教授的《中国旧石器进展与问题》等学术报告，受到了与会者深切的关注。张镇洪教授也在会上作了《广东英德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学术报告，介绍了1996年在英德云岭牛栏洞与宝晶宫两处洞穴地点发现的旧石器，引起了与会者很大的兴趣。

会议选举了第四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理事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叶捷当选为理事会主席。下一次学术年会将在云南省昆明举行。

(力成)

李鹏总理

给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的贺信

欣闻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在江西南昌召开，我谨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勤奋工作在革命文物工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国是一个有着光辉革命历史的国家。丰富的革命文物，凝聚着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革命精神，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重视革命文物保护，充分运用革命文物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新时期的革命文物工作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运用文物展示爱国志士和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激励全国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革命文物工作者要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创造性地做好本职工作，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鹏

1997年8月1日

高度重视 加强管理 充分利用 努力开创革命文物工作的新局面

——在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铁映

同志们：

在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于南昌召开之际，我代表国务院对会议表示祝贺，向长期从事革命文物工作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革命文物事业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支持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全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已有 300 余座，各级革命文物保护单位近 8000 处，革命烈士陵园纪念性设施等 7000 余个，仅文博系统就收藏有革命文物 40 余万件。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河北西柏坡、广东虎门等地的一大批革命纪念地和革命纪念建筑，得到了妥善的保护维修。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南京雨花台、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等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纪念馆的建设，取得显著的成绩。《红岩魂》、《近代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展览》、《洗雪百年国耻，喜庆香港回归》等陈列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革命文物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有些地方和部门对新形势下革命文物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不足；革命文物保护管理的体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形势变化，革命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存在

不少薄弱环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革命文物工作的任务繁重，深化改革的工作艰巨。

一、充分认识革命文物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地位

我国是一个有着光辉革命历史和富于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全国的革命文物，是我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革命斗争的历史遗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最可珍视的革命历史遗产。

革命文物深刻的内涵，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热爱祖国、抵御外侮、捍卫独立、维护统一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追求真理、无私奉献、勇于牺牲、战斗不止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励精图治、奋发向上的艰苦奋斗精神，一个半世纪以来遗存的革命文物凝聚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生存、奋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革命文物有着直观、形象、真实可信的形式特点；有着与党和人民血肉相连、情感相系的巨大精神优势；有着鲜明的思想性、时代性和群众性，革命文物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过去，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

●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材料选登●

命和建设时期,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大庆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革命精神,曾经鼓舞和激励整整几代人以巨大的热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宏伟事业努力奋斗。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运用革命文物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真正做到长期保护,长期利用,惠及子孙,为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激励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加强保护

最近,江泽民同志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题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史育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振兴祖国”,李鹏同志为平津纪念馆题词:“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激发爱国爱党热情”。革命文物的利用就是要坚持“以史育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深入持久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人民群众需要好的精神食粮。问题在于我们能否用最好的方式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展览。革命文物展览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推出精品展览,立意要新,品位要高,内容要真实感人,陈列展览手段要新颖生动,包括运用高科技的手段。我们的一些大馆,要起龙头作用,发挥自己的藏品优势、人才优势、馆舍优势,不断推出文物精品展览。

革命文物工作是一项极富特色的群众教育工作。要努力优化环境氛围,面向观众,特别是面向青少年,为他们提供热情周到、优质高效的服务。要努力与教育部门、共青团和社会团体建立长期的联系,办好各种类型的教育基地,有计划地大中小学生游览瞻仰和参观学习,与学校的教学内容密切结合起来。这要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的重要内容。实行

收费的单位,对中小学师生有组织的参观活动要实行免费,对普通高校师生有组织的参观活动,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免费或半价优惠,努力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对机关、部队、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开展党团活动举办的有组织参观也要实行优惠。

对革命文物要积极征集、整理史籍,逐步建设,充分利用。发挥革命文物的作用,要“有物、有事、有据、有址”。“有物”就是要有文物可看,无物可看就缺乏说服力。对革命文物的征集要有紧迫感,征集也是保护,也是一种抢救。我们这一代人不能造成我们曾经亲身经历过的许多历史事件和我们熟悉的革命历史人物的文物空白。“有事”、“有据”就是要有真实的史实和可靠的依据,这就要加强对革命文物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有址”就是要先把那些已经濒临毁坏的革命文物保护起来,然后逐步加以建设。对已“无物可看”的地方,要竖立纪念标志,供人们凭吊追思。要做好革命文物普查工作,制定保护规划。我们不少著名的烈士陵园,也要建设陈列馆、室,展示烈士们的英雄业绩。

要抓好保护革命文物的法律建设。对中共一大会议会址、“八七会议”会址、南昌起义纪念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遵义会议会址、延安革命纪念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等,这样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和革命纪念建筑要制定专项法规,依法加以保护。

革命文物主要依靠国家保护,这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基本国情决定的。但我国极为丰富的革命文物,仅靠国家保护是不够的,还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对革命文物形成国家保护为主并动员全社会参与保护的新体制提供了历史机遇。要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努力探索建立新体制

四、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领导

保护和利用革命文物首先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把革命文物保护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工作日程,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政府兴办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等公益性事业单位,应切实给予经费保证。革命文物多在财政比较困难的老少边穷地区,对这些地区革命文物的保护要加大投入,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和财政支持。

革命文物工作是一项全社会的工作,要统筹安排、协调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各级宣传、教育、民族、文化、文物、财政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团体,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推动革命文物工作的发展。

各级党委、政府要在近期内抓好一批保护、建设、改革、展示的试点单位,注意总结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及时推广示范。要务实求实,切实抓出成效。

同志们,党的十五大即将胜利召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进入一个更加灿烂的辉煌灿烂的发展阶段,革命文物工作将面临更好的机遇,肩负更重大的任务。全国革命文物工作者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机遇,改革进取,开拓革命文物工作的新局面。

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

的思路和举措。我多次强调,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文物工作特别是革命文物工作面临的新情况。1995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结束后,我专程去延安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延安革命纪念地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为了达到“长期保护”和“长期利用”的目的,决定建立延安革命纪念地保护基金,这个基金主要由社会捐助组成。总之,一切有利于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弘扬利用的形式和方法,都可以进行积极的探索和试验。

三、建设“专职、兼职、志愿者”三结合的革命文物工作队伍

加强队伍的建设是革命文物工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支队伍应当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专职人员,包括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另一部分是兼职人员,第三部分是社会志愿人员。兼职人员和志愿人员可以有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这些老同志亲身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对党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请他们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斗争,会使我们举办的陈列展览更加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兼职、志愿人员也可以是在职或退休的教师、干部、近现代史研究人员和理论工作者。他们的参与可以大大提高革命文物群众工作、宣传讲解和研究工作的水平。同时,要广泛地吸收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参与组织观众和讲解工作,使革命文物工作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真正变为全社会的事业。

革命文物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思想性很强的工作,我希望从事革命文物工作的同志们,要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我国近现代历史和我们党的历史。要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提高队伍的素质 and 职业道德水平,通过馆校结合,提高业务水平,勤奋工作,奉献社会。

增强使命感 弘扬主旋律 努力开创革命文物工作新局面

——在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国家文物局局长 张文彬

同志们：

正值全国人民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在“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召开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亲自倡议和关怀下，在文化部党组指导下召开的，是全国文物战线的同志们第一次全面商讨革命文物工作大计的盛会。李鹏总理对会议发来的贺信和李铁映同志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做好革命文物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我谨代表国家文物局，向一贯重视、支持革命文物工作的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表示崇高的敬意，向辛勤耕耘在革命文物工作园地的广大干部职工致以亲切的问候。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总结交流近几年来革命文物的工作经验，研究新时期革命文物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讨论审议《中国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事业“九五”

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和《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部署当前和今后的革命文物工作，开创革命文物工作的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五大召开。

一、革命文物工作的历史回顾

革命文物包括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革命斗争的遗址、遗物和纪念性建筑物、著名人物故居等，是我国文物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革命文物作为革命历史的实物见证，饱含着党和人民的真挚情感，真实、生动地记述了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经过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最终解放这一漫长曲折而又可歌可泣的光辉历程，对于纪念和宣传无数爱国志士、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坚强斗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党和政府一贯重视革命文物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对革命文物工作历来十分重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

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对革命文物工作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作出过许多重要指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革命文物工作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新形势下的革命文物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进一步指明了革命文物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方向。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开始在瑞金、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着手筹建革命博物馆，开展革命文物史料的征集和展出，用于宣传革命者的奋斗业绩，向广大红色战士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和革命传统教育。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此后不久，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一批烈士陵园、革命纪念室、纪念碑等纪念设施。1950年3月，中央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同时指示“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如条件具备时，亦可筹设地方革命博物馆，或在原有博物馆内筹设革命文物陈列室”；同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征集革命文物令》，并派遣慰问团赴老区慰问人民群众，征集革命文物史料，取得了丰硕成果。

此后四十多年来，各级人民政府又相断对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大批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核定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一系列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犹如一幅幅波澜壮阔

的历史画卷，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历程。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是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奠定基础、形成规模的阶段。统计资料显示，1951年全国革命馆仅有3所，1957年增加到23所，约占当年全国博物馆总数(72所)的32%，基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门类；在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180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达33处；到1964年，依托于有关革命旧址而建立的革命纪念馆总数增加到64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贯彻党中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文物工作重新出现了生机勃勃、健康发展的新局面。特别是最近几年，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更加重视发挥革命文物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用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使之成为“四有”公民。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致函李铁映等同志，作出对青少年学生开展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重要指示。今年5月26日，江总书记专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二期工程竣工题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史育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振兴祖国。”日前刚刚开馆的平津战役纪念馆，其建设方案和陈列内容也是经中央研究后报请江总书记亲自审定的。李鹏总理十分重视革命纪念地的保护和建设，对延安革命根据地、虎门炮台旧址的保护以及国际友谊博物馆的建设等重点项

●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材料选登●

目，或作出重要批示，或亲临现场指导。就在我们这次会议召开前夕，李鹏总理于7月18日参观贵州息烽集中营旧址革命纪念馆，对当地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做好保护、管理工作，进一步弘扬革命先烈的斗争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同志在视察中国革命博物馆时，对革命博物馆的性质、任务也作了明确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在几次会议讲话中都高度评价了革命文物的价值和作用，反复强调加强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曾召集中央和陕西省有关部门的同志赴延安现场办公，协调解决有关延安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对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以及虎门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等的文物保护和长远发展问题，作了深入考察，发表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所有这些，都为我们作好革命文物工作指明了方向，鼓舞了斗志，必将对我们继续开创革命文物工作的新局面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截至1996年底，各地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中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到13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34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000余处；全国文物系统管理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约300所，馆藏革命文物40多万件。这些革命纪念地和纪念馆，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一个革命史迹网络，比较系统地展示和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以保护促弘扬，革命文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文物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国革命文物工作者高

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和原则，按照两次西安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艰苦创业，切实加强和改进了革命文物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自1992年起，中央财政安排的文物保护直拨经费在每年原有五千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到年均一亿三千万，地方各级财政也大幅度地增加了文物保护专项投入。全国文物部门开展了建国以来规模空前的文物维修保护工作，其中虎门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会址、延安、西柏坡等一大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纪念地得到妥善的抢救维修，濒于危险的状况有了很大缓解；中国革命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广东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纪念馆有效地改善了展厅、库房和安全报警等基础设施，大力加强了文物保护的基础工作。截至1997年上半年，我局组织的馆藏一级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对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279个文博单位的馆藏一级革命文物进行了巡回鉴定，共确认国家一级文物4035件。

——全国各级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发挥文物优势，修改基本陈列，举办富有教育意义的巡回展览，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当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近代中国》陈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配合二期工程改陈的《抗日战争史》陈

列，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生平》陈列，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红岩魂》展览，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金陵祭》展览，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的《洗雪百年国耻 喜庆香港回归》和《国旗在我心中》大型展览等，无不以高品位的思想教育内容、高质量的展陈设计制作、全方位的宣传服务工作，感染和吸引了大批青少年学生和各界观众，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和巨大的教育作用。

——各地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大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发挥教育基地作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依托于有关革命旧址，制定基地建设规划，与当地宣传、教育部门和共青团组织建立经常联系，配合重大历史纪念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采取优待参观、培训义务讲解员、送展上门、举办冬夏令营、有奖征文、知识竞赛等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积极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学生和人民群众通过纪念馆的实物课堂受到了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生动教育。在我局 1993 年至 1996 年连续四年评比表彰的 100 处全国文物系统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革命纪念馆就有 44 处。此外，仅全国文物系统管理的革命旧址、纪念馆就有五、六十家单位分别被中宣部列入“全国 100 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和被国家教委、文化部等六部委公布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总之，革命文物工作在党和政府的一贯重视和支持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两个文明建设

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成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取得的，是文化部党组支持的结果；是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重视革命文物工作、切实加强领导的结果；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的结果；也是全国革命文物工作者长期努力，不畏艰辛，团结奋斗的结果。

二、新时期革命文物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革命文物工作是整个文物工作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群众性和时代性，工作中需要更加注意树立大局意识，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当前，要充分认识和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革命文物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局

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发展经济、加快物质文明建设步伐的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次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决不能以削弱乃至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且把政府兴办的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和国家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确定其为公益性事业单位，由各级政府提供经费保证。《决议》是指导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

●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材料选登●

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包括革命文物工作在内的我国文博事业指明了原则、任务和方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从事革命文物工作的全体同志，不仅要加强学习，认清形势，把握大局，用《决议》统一思想，而且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充分认识和把握革命文物所蕴含的特殊历史价值和巨大的精神力量，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保护好革命文物，以强烈的现实使命感宣传好革命文物，把服从和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大政，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贯穿于新时期革命文物工作的始终，使中华民族百多年斗争历史凝聚成的革命传统深入人心，代代相传，激励人们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而努力奋斗。

（二）革命文物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各族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反动派的压迫，进行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最终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这场斗争时间之漫长，经历之艰辛，牺牲之巨大，均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给我们留下了异常丰富而又感人至深的革命文物。

相比而言，革命文物与一般历史文物在属性和社会功能既有同一性，又有一定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同为传统的凝聚和物化，都能起到启迪后人的作用；二者的主要差别表现在：革命文物较之历史文物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闪烁着时代气息和感情色彩”，更容易被当代人听得到，看得见，摸得着，因而在实物教育中具备了更加生动直观、形象鲜明和感人至深的突出功

效。

在一些革命旧址、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展览中，观众通过历史留下的实物见证仿佛可以透过历史的风尘，看到侵略者焚烧圆明圆的火光，看到在帝国主义炮口下腐败的清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所签订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救民于水火之中，拯世于民族危难之时，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中国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

也是在革命史陈列中，一批批青少年学生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爱国志士、革命先烈的照片和遗物，似乎是在刻意铭记前辈的英名、形象和业绩；一些早年投身革命，经受过出生入死斗争考验的老同志，看到自己所熟悉的战友们的事迹，亲眼目睹沾染着斑斑血迹的烈士遗物，禁不住潸然泪下，甚至失声痛哭，仿佛又回到了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不朽名句到谭嗣同的“去留肝胆、气傲刀丛”；从辛亥革命前邹容的《革命军》到黄花冈起义林觉民的《诀妻书》；从孙中山的“百折不回、上下求索”到李大钊的“从容就义、慷慨赴死”；从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到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清贫》；从叶挺的《囚歌》“可把牢底坐穿，也不从狗洞里爬出”到江竹筠“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坚贞不渝的大无畏精神；从井冈山到全国解放……有多少人从中感受到凛然的民族大义和浩然正气，获得巨大的精神感召，又有多少人的灵魂受到了震撼、激励和鞭挞，心灵得到了净化。观众正是通过这些革命文物，立体地、形象地、多角度地感受到近一百年来中国在苦难中发

生的深刻变化，以及为挽救祖国沉沦和民族危亡而顽强斗争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威武不屈的革命气概，从而深刻认识到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革命文物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要求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思想敏锐性和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真情实感，切实保护好、利用好各类革命遗址、纪念建筑和馆藏革命文物，通过陈列展示，不遗余力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少年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基本国情的教育，进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教育，进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教育，进行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的教育，为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世代相传，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代社会主义新人，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正确认识革命文物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在肯定革命文物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事业的发展，同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要求，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还不适应，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长期以来，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影响和制约了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事业的发展。

——革命旧址维修保护工作长期滞后，“四有”（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

档案、有保护机构）基础工作亟待加强。一方面是革命旧址的抢救维修经费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有限的经费投入得不到科学、合理的使用

——革命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特别是同人民群众渴望致富的矛盾突出，导致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革命旧址、纪念地的环境风貌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和破坏。

——革命文物的普查、征集工作困难重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典型文物，长期未能得到有计划有目的的征集与保护，毁坏和流失比较严重。

——由于历史原因，革命纪念馆的内容布局和地区分布多在老、少、边、穷地区，因而与经济发达地区差距明显，不少革命纪念馆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基础设施陈旧。

——革命文物藏品鉴定、研究和陈列方面后继乏人，革命文物工作专业队伍的整体数量和政治、业务素质有待提高。

同志们，上述困难和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革命文物工作的开展，但我们坚信，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只要我们按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加强管理，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就可以对业已存在的问题区别情况，逐步加以解决，使全国革命文物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加快前进步伐，取得更大的成绩。

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革命文物工作的重点任务

当前革命文物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要紧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引下，继续搞好爱国主

●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材料选登●

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培养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品德；继续抓好国情教育，发扬团结奋进，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精神。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革命文物工作有以下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地)的陈列展览，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史育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振兴祖国”，把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作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以主题鲜明，形式新颖，富有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的高品位的陈列展览去教育和感染观众，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党爱国热情。

我局已把实施陈列展览精品工程作为今后的一项重点工作，制订了有关实施办法。希望各地文物部门和革命纪念馆，紧紧围绕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国务院《通知》所提出的基本任务和要求，组织开展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突出体现各自特点的革命历史纪念活动和陈列展览，为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二）认真做好《中国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事业“九五”计划纲要》的实施工作

去年底至今年上半年，我局在开展调查研究和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国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事业“九五”计划纲要》。这份《纲要》较为客观地估计了我国革命文物工作的基本状况，提出了“九五”期间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从现在算起，距离“九五”期末还有三年多时间。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纲

要》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工作十分艰巨。各省、市、自治区文物部门，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落实计划和措施，为实现革命文物工作“九五”计划而努力。

（三）落实“五纳入”，进一步加强革命文物的抢救保护工作

针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整个文物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李铁映同志多次强调，要把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遵循文物工作自身规律、国家保护为主并动员全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新体制。今年3月30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这方面的工作要求。尽管“五纳入”的核心是强调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文物保护守土有责，但不能真正把“五纳入”落到实处，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各级文物部门的工作能否真正到位。

第一，要落实国务院《通知》中关于各级政府对本辖区文物保护守土有责的要求，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使革命文物所在地的各级政府认识到自身应担负的保护责任，切实加强领导，尤其要使当地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自觉地把文物保护工作作为自己的任期目标和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

第二，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参与保护革命文物。加强保护革命文物重大意义的宣传，争取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要注意建立和完善群众性保护组织，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保护革命旧址过程中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实际困

难和问题，要设法给予必要的政策性补偿，尽可能减轻他们的负担。此外，还可以设法与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以及目前健在的革命老同志或已故老同志们的亲属、子女建立密切联系，请他们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党中央旧址，中央军委旧址，财政金融、邮电通讯、后勤、民政、卫生、教育等部门的旧址进行对口支援，帮助文物部门做好保护工作。譬如，新华社等单位就拨专款维修保护了瑞金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并将其作为本部门干部职工的教育基地，这些做法和经验很值得借鉴。

第三，加强革命文物保护的立法和执法。对大型革命旧址群要制定专项保护法规和长远保护规划，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公布实施；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刚刚公布不久的第四批国保单位的革命旧址、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要尽快完善“四有”工作；对有可能给革命旧址及环境风貌造成破坏和影响的建设项目，必须严格禁止兴建；对已经造成破坏和影响的，要依法追究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领导的责任，并坚决予以拆除。

第四，根据当前革命文物保护的实际情况，对革命文物的征集和维修、保护在经费上要给予一定倾斜，切实增加资金投入。我局在今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项补助的项目、资金安排中，将适度增加对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的投入。在地方的文物保护经费中，也要加大对革命文物的投入。

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对革命文物保护经费投放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指导，避免不必要的盲目投入和资金浪费。为了确保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项经费中有关革命文物保护的奖金得到科学、合理的使用，我局将要求各地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以省为单位，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革命旧址、纪念建筑物制定保护规划，列报项目，经我局综合平衡，确定重点。凡由我局确定的重点项目，均将作实地勘查和严格的维修保护方案评审。采取一次性大修补助的办法给予经费支持。大修后的项目5—10年内中央财政一般不再安排维修补助经费，日常维护和小修小补费用，主要由地方自行解决。

(四)继续做好革命文物征集、保护、管理基础工作

弄清文物的历史沿革和内涵价值，对其进行规范有序的管理，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基本条件。当前在革命文物保护基础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和完善革命纪念地的“四有”工作。最近铁映同志强调革命纪念地要“有物、有事、有据、有址”，对革命文物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和标准。请各地文物部门进一步抓紧本辖区革命纪念地两个“四有”工作的部署和落实，我局将对部分省区国保单位和重要省保单位革命纪念地的两个“四有”工作情况进行抽查。

第二，继续做好馆藏革命文物的清库、登记、建档工作。我局1989年印发《关于馆藏文物清库、登记、建档工作的意见》和1993年开展全国一级革命文物(近现代历史文物)鉴定确认工作以来，各地文物部门和革命纪念馆对此项工作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在清仓查库、摸清家底的基础上，抓紧开展了藏品的登帐、编目和鉴定、建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暴露了不少管理中的问题，特别是不少单位的藏品，原始情节、流传经历等背景材料不甚清楚，导致文物价值

●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材料选登●

难以确定；还有的单位文物帐册、卡片、档案的填写很不规范，给研究和利用带来了困难。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抓紧抓好革命文物藏品的鉴定、建档工作。我局将力争“九五”末期或稍长一段时间内编制完成《全国一级革命文物藏品总目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也要抓紧本辖区二、三级革命文物藏品的鉴定确认工作，并加强电脑化管理，切实提高管理水平。

第三，大力加强对珍贵革命文物史料的调查、征集工作，特别要针对以往征集、保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增强思想重视程度和经费投入力度，加强对社会上散存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重要标志物和重要资料的征集。对反映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方面实物、文献的征集、保护、研究和宣传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五）搞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提高宣传服务水平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原则。国务院《通知》要求“确定一批有重大影响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地），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逐步建成基础设施完备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各地革命纪念馆在贯彻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的成绩和经验，把搞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作为新时期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着力点，以改革的精神探索新形势下教育基地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力争做到其地教育

内容、形式和效果的和谐统一，积极推进和深化与各级教育部门、群众团体的工作联系，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吸引观众。被公布为教育基地的革命纪念馆（地），要对学校师生有组织的参观活动免费开放，对机关、部队、厂矿、学校等举办党团活动给予参观优惠，对残疾人和离休老干部实行免费接待。基地开放中要特别重视充实展陈内容，优化环境氛围，抓好讲解宣传，提高服务水平。我局将努力争取财政部和国家计委的同意，设立并逐步增加专项资金，用于改善教育基地的基础和展陈条件；编辑出版介绍全国重点革命纪念馆（地）的普及性读物；今年10月份还将举行全国文物系统博物馆、纪念馆优秀讲解员参加的讲解比赛，希望各地文物部门精心组织，认真选拔，赛出成绩，赛出水平。

（六）加强革命文物工作队伍建设，提高革命文物工作水平

根据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国务院《通知》的精神，结合文博战线的实际，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同志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强调要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的文博队伍，得到了全体文博工作者的一致赞同。

长期以来，全国广大革命文物工作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工作队伍；许多同志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满腔热情，忠于职守，不计名利，勤奋工作，为保护革命文物，弘扬革命传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也在侵蚀着我们的队伍。包括革命纪念馆在内的少数文博单位出现了为追求极端个人名利和享乐主义，违法乱纪，贪污

腐化,盗卖文物和国有资产等案件,的确令人痛心,发人深省。此外,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意志衰退、责任心差的情况,也屡屡表现在少数文博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之中。

“教育者首先要教育自己”。我们从事革命文物工作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位同志,都担负着继承、弘扬党和人民光荣传统的神圣使命,工作的性质和责任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立足本职,率先垂范,把革命文物保护好、利用好,更好地教育群众,鼓舞群众。

首先,要抓好队伍的理论学习,提高政治思想素质。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干部职工。要联系实际,进行党纪、政纪、法纪和职业道德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现阶段要突出抓好职业道德教育,对照我局印发的《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规范行为,提高素养,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重托的革命文物工作者。

其次,要加强队伍的业务建设。革命文物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宣传思想工作。做好这项工作,要求我们除了要拥有一定的文博专业和近现代史、党史知识之外,还必须深刻认识、把握党和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具备较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我局和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要通过举办不定期的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业务培训班,帮助一些一线工作的同志学习提高管理知识和政策理论水平,并在实践中加以锻炼,培养造就一支德才兼备、堪当重任的革命文物工作专业队伍。

第三,要转变工作作风,树立服务意识。革命纪念馆是文博战线作为精神文明建

设窗口行业的排头兵,其服务对象往往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十分广泛的群众性。我们要在社会教育活动中转变以往等客上门式的传统作法,制定服务公约,完善规章制度,事事处处为观众着想,向社会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带头树立起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的良好形象。

最近,铁映同志再次强调加强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要求们建立一支由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共同组成的革命文物工作队伍。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铁映同志重要指示的精神,积极加以贯彻落实。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建设专、兼、志的革命文物工作队伍,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入进行的必然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的路,用改革的方式,才能有效克服和解决当前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地)在经费、编制和事业发展方面存在的困难,才能更广泛地吸引广大干部群众参加革命文物的工作和保护,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革命文物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同志们,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全党全社会关心、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切实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化领域工作的新局面正在逐步形成。我们相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积极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的广泛交流和认真探讨,以及会后的狠抓落实、勤奋工作,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献上一份厚礼,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在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董保华

同志们：

经过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各项议程。这次会议全面研究了革命文物工作。李鹏总理在百忙中发来了贺信，李铁映同志发表了书面讲话，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革命文物工作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是对全国革命文物工作者的极大鼓舞和鞭策。江西、广东、湖南、四川等省政府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出席会议，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听取了文化部副部长李源潮同志的讲话，听取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同志的工作报告，讨论审议了《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意见》、《中国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事业“九五”计划纲要》两个文件的征求意见稿，总结交流了各地革命文物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并将实地参观考察南昌、瑞金、井冈山等重要革命旧址和纪念地的工作，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在各地文物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开创新时期全国文物工作新局面的进程中召开的，会议及时客观地分析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革命文物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研究了措施，必将对当前和今后的革命文物工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现在的紧迫任务是，如何以这次会议为起点，把会议形成的工作思路和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把全国革命文物工作推上新台阶。下面我就会议的主要收获归纳如下几点：

一、统一了认识

与会代表认为，江泽民总书记给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题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史育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振兴祖国”，李鹏总理给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的贺信，李铁映同志发表的书面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新时期革命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代表们经过学习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对革命文物重要价值的认识，增强了在新形势下做好革命文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革命文物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的载体。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革命文物都曾以其直观形象、真实感人的突出特点和异常鲜明的思想性、时代性和群众性，教育、鼓舞广大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为民族解放和祖国繁荣富强英勇奋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人民群众更加需要无往不胜的强大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时代赋予革命文物工作新的主题，使革命文物具有更加丰富的教育内容，更加广泛的教育对象。新的历史时期，革命文物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坚持不懈地“以史育人”，激发广大群众以巨大的热情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尽管有些地方和部门对革命文物工作的重大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中也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我们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关怀，有地方各级党委的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有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有业已取得的成绩，只要我们各级文物部门和全体革命文物工作者，认真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新时期革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认识自身工作的价值和

优势,根据时代的需要,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加强保护,一定能够把革命文物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二、明确了职责和任务

通过对李鹏总理贺信和铁映同志书面讲话的学习,代表们进一步明确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职责和任务。

首先,革命文物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革命文物工作既要发挥宣传教育的作用,更要担负起继承传统和发扬光大革命传统的历史使命。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不是一时一事的权益之计,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要长期保护,长期利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切实加强领导,认真落实“五纳入”,把革命文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真正摆上位置,把革命文物工作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综合协调,加强领导。代表们认为,革命文物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关键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实践证明,无论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还是老少边穷地区,只要当地党委和政府重视,只要文物部门尽职尽责,那里的革命文物工作就能够取得较大的成效。

第二,是各级文物部门的责任。全国革命文物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保护革命文物、弘革命传统的神圣职责。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人人为服务的方向,坚持“以史育人”,继续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和原则。

要充分发挥革命文物独特的教育功能,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以主题鲜明、生动感人,具有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的陈列展览去打动观众,鼓舞观众。革命文物的陈列展览,一是立意要新,品位要高,要始终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主旋律;二是要强调历史真实性,做到“有物可看,有事可说,有据可查”,也就是李铁映同志提出的“有物、有事、有据、有址”,给人以身临

其境、感同身受的深刻印象;三是要讲究表现形式和环境氛围,精心设计,精心制作,充分运用高科技手段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提高展示内容的可视性,营造优美、清新的参观环境,以境寓情。

要按照李铁映同志关于建设专、兼、志的革命文物工作队伍的要求,把加强队伍建设作为革命文物工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建设好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的革命文物工作队伍,提高革命文物工作水平。革命文物是中华民族珍贵历史遗产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革命文物工作也要重视理论建设,重视对自身工作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同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探讨。革命文物工作者要加强政治学习和职业道德修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提高专业水平,特别是尊重历史事实,在革命文物保护维修和展示宣传工作中坚持“不改变原状”的原则,把革命文物保护好,利用好,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是社会各界的责任。各级宣传、教育、民政、文化、旅游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负有相互支持配合,组织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充分利用革命文物,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职责。要搞好革命文物工作,必须紧紧依靠党委和政府,紧紧依靠各有关部门,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从上到下,方方面面协调工作,不懈努力,形成合力,造就共建共创的新的工作格局。

代表们纷纷表示,我们各级文物部门,一定要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过程中,认真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重视和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指示精神,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争取各级领导的支持,按照张文彬局长工作报告和《中国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事业“九五”计划纲要》所

●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材料选登●

部署的各项任务,结合实际,抓紧制订规划,研究措施,通过认真扎实的工作,取得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理解、关心和支持,为解决革命文物工作面临的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次会议以后,我局将根据会议确定的工作思路,研究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也希望各地文物部门结合本地本单位的实际,认真研究,务实求实,拿出几项切实有效的落实措施,真正取得工作实效。

三、理清了进一步搞好革命文物工作的思路

这次会议认真讨论了《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意见》的代拟稿和《中国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事业“九五”计划”纲要》两个文件的征求意见稿。代表们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我局将抓紧组织文件修改,在报请批准后尽快印发各地。

会议还广泛交流了各地文物部门、革命纪念馆(地)加强革命文物保护,运用革命文物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典型经验和好的做法。如江西省加强革命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突出重点,讲究实效,维修一处,利用一处;河北省由各级党委宣传部牵头,文物部门和有关部门协同工作,统筹安排,加大投入,切实改善革命旧址等教育基地的基础设施和展示条件;瑞金、延安、西柏坡、孙中山故居等革命纪念地,一手抓保护,一手抓弘扬,克服困难,勇于创新,不断提高工作水平;中国革命博物馆、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单位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推出精品展览,提高宣传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甘肃哈达铺红军机关旧址纪念馆馆长韩尔明、南京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馆长周校水、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刘斌珍等同志。为革命文物事业甘于吃苦、自觉奉献的拼搏精神……非常值得各地文物部门和全体革命文物工作者学习。

希望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各有关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地),根据会议提出的工作和思路 and 办法,吸收、借鉴兄弟单位的做法和经验,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制订革命文物事业的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切实采取措

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为革命文物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同志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和中央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我们必须运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革命文物工作面临的新问题。这次会议,不少代表提出了改革的思路和措施。例如国家教委的代表提出,要把革命文物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教学改革,更广泛地组织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参与组织观众和讲解宣传工作,并准备认真研究部署,抓好落实工作。又如,南京市采取了文物部门选择部分重点教育基地,举办展览,提供接待服务,教育部门组织中小學生免费参观学习,党委、政府宏观指导,并对有关文博单位给予适当经费补偿的方式,既解决了对中小學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使教育活动落到实处,又缓解了有关文博单位实际存在的经费困难问题。再如,广东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出资购买附近民居,经过整修,举办清末民俗风情展览,既维护了故居本身的环境风貌,又取得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了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各地可以结合实际,选择一、二个具备条件的单位进行改革试点,通过积极稳妥的试点工作,认真探索总结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总之,一切有利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方式和方法,都可以进行积极的试验和探索。

同志们,1997年是不寻常的一年,香港已在举世瞩目中顺利回归祖国,党的十五大即将胜利召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也将跨入新的历史阶段。时代将为革命文物事业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相信这次会议之后,全国革命文物工作者一定能把会议精神落到实处,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全面提高工作水平,为即将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民族振兴大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与会全体同志,向给予我们这次会议大力支持的江西省委、省政府,南昌市委、市政府,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为会议作了大量工作的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局,南昌滨江宾馆和各有关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七年八月五日